

《聯合文學》

風中蘆葦

陳芳明散文集 1



b20888600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398433

風中蘆葦

聯合文叢
149



● 陳芳明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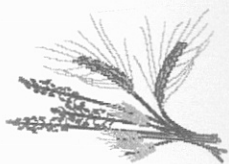
2398433

風中飄舞

◎ 陳其南 / 編

3308133

目次



詩的未完成（新序） 007
失去國籍的地圖（舊版序） 012

第一輯

啟航

河想 021
天路歷程 024
傍晚的叩訪 027
落一片葉又一片葉 029
路過大山屯 032
飛幡 035
楓葉青青 038
秋渡華盛頓湖 042

第二輯

遠航

- 為了忘卻的紀念 0 4 9
流浪的吉他 0 5 5
磐石與鏡 0 6 2
穿過歷史與文學的長廊 0 7 0
路過波士頓 0 9 6
忽然谷 1 0 0
雪融 1 0 4
深夜的嘉南平原 1 0 9
向晚的華爾騰湖 1 1 3
我所不知道的謝里法 1 2 1
給秀喜姑媽的一封信 1 2 9

第三輯

回航

- 從落空到落實 1 3 5
受傷的蘆葦 1 3 8
寧可是一個歌手 1 4 4
曠野裡的墓碑 1 5 2
遠行的玫瑰 1 6 2
交錯 1 6 8
轉折 1 7 7
一片冰心在玉壺 1 8 6
傷痕書 1 9 2
鮭魚還鄉 2 1 4
都留在雪地裡 2 2 0

詩的未完成

（新序）

閱讀自己的散文舊稿時，我已無法推想當初撰寫時的情調與情緒了。我曾經這樣相信過，凡屬自己親筆寫出的文字，都能夠牢記不忘。不過，對於這樣的自信，我不再那麼有把握。有一位熟識的學生到圖書館搜尋我的舊作，並且影印成冊置放在研究室的書桌。面對那一堆複印的文字時，我竟錯覺地以為那是別人的作品。時間的隔離，果真造成如此可怕的生疏？或者是由於年齡的增長，我的記憶已經失去原有的敏銳？文章作者明明印著我的名字，我竟完全不熟悉其中的思路與技巧。身為作者的我，如果都遺忘了原有的創作動機，又如何能掌握自己作品的全部精神？

我越來越能同意，作者不再是作品的唯一詮釋者；我更能同意，作品一旦發表之後，就已脫離作者而獨立存在著。經驗告訴我，三十年前的時代背景已呈模糊，在怎樣的氣氛之下

所寫出的散文，如今已不復記憶。多少年來，總是不期然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遇到一些讀者，他們很熱心提起我早期的文學生涯，也會細數我過去的詩與散文。聽到他們在討論時，不免使我產生幻覺，彷彿自己是一位告別式中的逝者，聆聽著前來祭悼的親友在議論我生前種種。他們詮釋我、裁判我，而我竟無一詞可以回應。他們喚醒我的記憶，但是那些記憶畢竟不能取代前生。

時間過去那麼久之後，我的年齡終究到達了如何去體會遺忘的滋味。遺忘，在一定的程度上非常接近死亡。記憶開始出現空白時，曾經具體發生的事件便消失無蹤了。連繫那些事件的聲音、情感與人物，自然也跟著變得一無所有。我不能不承認的是，如果沒有重新挖出那些陳舊的散文，許多記憶確實不存在了，所以，我的學生找到這些作品時，毋寧使我感到訝異，也使平靜的情緒產生了波動。縱然那些文字如今看來是何等陌生，讀來是何等衰弱，但它記錄著活躍過的生命則是無可懷疑。

從十八歲那年，我就開始嘗試撰寫散文；也同樣在那年，我寫下生平的第一首詩。對詩的著迷，會變成一生一世的事，最初從未預料過。在大學時期，我喜歡在褲後的口袋塞一冊詩集，招搖走過校園。坐在草地上讀詩，讓自己的想像徜徉飛翔，幾乎成為當時的日行一善。我常常留在學校，直到天黑。然後，坐汽車從新莊的輔仁大學回到台北市區。我選擇坐在最後一排座位，靠著窗口眺望窗外的燈光。橫跨淡水河上的中興大橋，是我必經的道路。汽車搖搖晃晃跨越淡水河時，我常情不自禁暗中誦讀剛剛接觸的詩句。夢幻的年華，浪漫的

詩情，都倒映在黑夜的水中。

許多不成熟的思考，以及不連續的字句，最後都變成了深夜的詩行。我住在一個窄小的閣樓，獨自守著城市的燈光與星空。偶爾傳來市聲的寂靜午夜裡，我坐在樓頭完成了一些詩的斷章，然後毫不吝惜地又將之揉掉。這樣日復一日，閒情中混融著焦慮，期待中拌雜著失落。歲月是如此延續到畢業那年，直到兩個事件騷動了我的生活：一是愛情，一是政治。就是這兩個事件，改變了我的前半生，也支配了我的後半生。我開始體會到生命原來就不是這樣，而世界也不是這樣。

不過，我要說的是，生活還未受到擾亂之前，我對詩的迷信已到了執迷不悟的地步。那種虔誠與專注，是任何時期都未曾發現過的。對於詩是那樣尊崇，以致我不敢輕易破壞它的形式與內容。如果不能寫成，我就讓它保留原有的面貌。我想我是一位相當失敗的詩人，因為後來檢視自己完成的作品，竟然寥寥無幾。那些沒有完稿的斷章殘句既然未能轉化成詩，後來的下場又是如何？我現在必須承認，當年許多詩的企圖，最後都被我改寫成散文了。

最初撰寫散文，都是先有句子，然後才慢慢渲染成篇。當然這又是另一個失敗的散文家。當我還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歷練不足，讀書無多，根本還沒有能力去營造結構完美的作品。深夜裡揉掉的詩稿，總會殘存一些自認為是佳句的詩行置於桌上。每當確信那些詩行是不可能完稿時，我就放棄追求的意願。翻閱舊時的日記，常常可以找到一些殘稿的紀錄。這些詩行一旦沒有完成，它就永遠不是一首詩了。然而，如果能另闢途徑，把詩行發展

成爲新的文體，說不定能延續詩的生命也未可知。年輕時代寫出的好幾篇散文，其實都是以未完成的詩行爲基礎而開闢出來的。

我不是忠誠的詩人，或者說，我不是忠誠的作者。怯於進行抽象的思維，過於崇拜詩的形式，往往使年少的我反而不敢多做詩的嘗試。倘然那時不怕寫出壞詩，不怕發表劣作，也許今天我在詩的領土上已經有了豐收。既然未能忠於原始的創作動機，後來寫出的散文就偏離了詩的軌道。這樣說，我到底要證明什麼？我想要證明的是，最早寫出的散文，其實都是詩的餘緒。詩的原型遭到破壞之後，即使寫成散文，也不能保留原來的心情。說得更清楚一點，我的散文原來就是詩的墓誌銘。因此，重新閱讀早期的散文之作，我簡直可以窺見一個詩人生命的死亡。

收在《風中蘆葦》的最早幾篇散文，正是埋葬了一顆詩的靈魂。這絕對不是誇張的說法，因爲閃現在字裡行間的，我隱然能夠察覺當年一絲躍動的詩影，縱然是那樣倏忽，又是那樣輕淡。對於那一縷魂魄之所以特別懷念，全然是因爲那段時期的情操還維持得相當純粹而純潔。等到愛情介入之後，政治接著又撩撥了我的生命，我的詩情從此變得混濁且複雜。在地球另一端度過望鄉的歲月時，我常忍不住回顧閣樓時代的那位少年。在海外完成的詩與散文，不免帶有緊張與憤懣之氣，偶爾也沾染了幾許悲涼。守住城市燈光與星空的樓頭時，我從未預見到自己的靈魂有一天竟然會淪落到愁苦、浮盪的地步。《風中蘆葦》後半部大多數的文字，都寫在遙遠的異域。比起早期的散文，完全失去了那份飄逸與幻想。每個文

學生命是不可能停留在最初的階段，它被折磨、被鍛鑄，終於構成了今日的完整與殘缺。

我要感謝初安民先生對我的寬容。如果沒有他的鼓勵，我的少作恐怕還沉埋在時間的塵灰之中。他容許我收納年少時期的一些生命標本，讓我有自我鑑照的時刻，也讓我的朋友和敵人偷窺那段不堪的年華。散文結集成書時，終於證明了一首詩的未完成。

——一九九八年八月三日 聖荷西

(舊版序) 失去國籍的地圖

1992.11.14

1
這冊散文集，是我浪跡海外十餘年的一份備忘錄，是我對自己往後生命警惕的一份白皮書，也是我思想轉折過程中繪製的一份精神地圖。

因為這是一份備忘錄，所以書中所收的文字，記錄了我過去十年中情感與理智的交錯起伏。當一個人被置放於地球的偏遠角落時，許多情緒上的困頓與傷口，都必須依賴自己的心志去克服、去撫平。如果是在島上，我可以攜帶一顆受傷的心，到朋友的聚落處去取暖包紮。然而，在這荒涼的異域，面對的只是孤寂的時光。曾經有過一段日子，寧靜的湖畔、港夜的燈光、山谷的星火，或街角咖啡室的音樂，往往是我心靈曠野的低語者。離開家鄉以後，我便是這樣活下來的。然而，我掙脫了感傷的牢籠。在心路歷程的跋涉過程中，所有的挫折，所有的流言，最後都讓我當做磐石一般疊高起來，砌成一顆不碎不滅的信心。於今，

翻閱這份備忘錄，昔日誤以為是痛楚的打擊，看來已是多麼微不足道。牢記那些稚嫩的歲月，為的是要走更為艱難的道路。

因為這是一份白皮書，我不能不藉這冊散文集來宣告對舊日的遺棄，並且也嚴重警告自己日後應更無情鞭笞自己。對文學生涯的追求，始於我二十歲那年。今年，時間已逼我跨越生命中的四十歲。我在文學創作上的努力，僅收穫了這一冊散文集。這種疏懶，這種怠惰，已違背當初出發時的誓願。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這樣的爽約辯護，也沒有任何藉口可以為這樣的負信開釋。如果能夠解釋為何我的產量如此稀少，那應該歸咎於我對文字掌握的能力過於欠缺，以及我思想的成長過於遲緩吧。跨過中年的分水嶺，對自己提出了白皮書，自然不能掩飾長年以來的過失。不過，也正由於有前半生的懈怠，我才能夠以更警醒的心情經營我的後半生吧。

因為這是一份精神地圖，在散文裡有我走過的道路與選擇的方向。這十年中，我的思考有過幾度轉變。如果那轉變是可喜的，那是因為我找到了島嶼的方向。一九七四年離開台灣時，我的行囊裡裝滿了一顆雄心。那時，我決心要為台灣描繪一幅遠景，也要為島嶼尋找歷史的答案。十年之後，一顆心仍如焦渴的炭火持續燃燒，只是那份心情比較趨於落實，但有時又覺得落單。對自己歷史的無知，曾經使我懷抱過一個碩大無朋的巨夢。現在回首看來，無論那夢是如何虛幻，終究是每一位台灣子弟無可避免要經過的階段。唯一不同的是，有人把這個階段拉長，有人則將其縮短。我之所以感到落實，是因為我超越了這個階段，從此不

再迷惑於盛唐或江南的華麗假象。我之所以感到落單，則是因為我同輩的一些朋友，仍然滿足於一顆過度膨脹的心。往往是這樣的一顆心，使他們與島嶼的命運脫節。而這些朋友卻反而回過頭來，視我為分歧分子。倘若我是一位異議者，那是因為我認同台灣之後的一個必然結果。為此，我了無遺憾。

如果給我機會重新出發，我還是會選擇教育體制外面的這條歧路，一條充滿崎嶇卻有著出口的歧路。我曾經是島上教育體制的受害者，我的年少歲月都虛擲在知識追求的迷陣中。這份精神地圖，便是在摸索與試誤的過程中拼寫出來的。我要讓我的朋友看到地圖上的陷阱與死巷，也要讓後來者看到地圖上的錯誤與虛構。設若他們能夠按圖索驥，少走枉費的道路，那麼我的受害，就是我的受惠了。

2

選擇散文的形式來表達這幾年的思考，只是我嘗試各種文體撰寫中的一種。自一九八〇年以後，我使用了至少十個以上的筆名。埋名隱姓，是這個時代的苦悶象徵。只要對我的島嶼有所幫助，則具名或者是佚名，已屬次要的事。不過，這兩年來，我比較固定於三個筆名，亦即寫政論的施敏輝，寫文評的宋冬陽，寫詩與散文的陳嘉農。這已是公開的秘密，我無需「護短」。至於秘密的部分，則任其隱沒下去。當初為什麼要使用這麼多筆名？我相信，只有這樣畸形的時代才能解釋了。

對於散文的分類，我粗略劃為兩種，一是周作人式的，一是魯迅式的。前者言志，後者載道。周作人的文章，充滿書巾氣。傳統士紳的閒情，都可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找到影子。甚至，閒得有些腐朽。魯迅則不然，他的文風屬於草莽性格，彷彿是江湖浪子，不向任何權力低頭。周氏兄弟，領導三〇年代中國文壇，儼然成為兩個集團。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們的重要弟子選擇了兩個極為相反的道路。走周作人路線的文人，如果不是隱居，便是投靠日本人。追隨魯迅的作家，則參加延安的左翼革命運動，或抗戰游擊去了。文格與人格的關係，似乎可以在周氏兄弟的身上得到印證。

我自然是偏愛魯迅的。他的文字，剛強裡帶一份柔情，哀傷中夾一份悲憤。行文過處，都是力量。我必須承認，讀過魯迅之後，使我擺脫台灣教育體制釀造出來的酸腐之氣。而更重要的，魯迅使我正式確認自己是台灣人，因為，帶給他一生坎坷命運的統治者及其體制，對他的土地而言，畢竟是過去了。然而，同樣的體制，於我的土地卻還是方興未艾。魯迅如他也是台灣人，他當能體會我與我這一代的心情。

載道的散文，在台灣尚未建立起傳統。戰後台灣散文的主調，仍是沿著抒情的路線發展。在抒情散文中，有相當多的創作者，有意為既有的體制護衛。據說他們與政治是絕緣的；但是，權力者頒賜給他們的價值觀念，卻又照單全收。他們的散文遠離社會，因為他們對不公不義視而不見，他們也宣稱不談政治。如果他們稍有激烈的言詞，也往往只是反貪官，不反皇帝，最後又接受招安去了。載道的散文在台灣難以立足，並不能說權力者過於死

硬，而是創作者過於軟骨。向權力者低頭的結果，使他們寫出的感情也是帶有體制性格的。他們珍惜自己飽滿的情感，懼於探險，畏於挑戰。如果他們的創作具備抵抗精神的話，那麼他們抵抗的是社會上的抗議聲音。

台灣，曾經是無聲的。到了七〇年代以後，才漸漸出現了吶喊。台灣的文學工作者，卻總是落在社會的後面。當街頭上的運動澎湃洶湧時，他們卻以文字引導年輕人遠離土地與人民。有墮落的文人，才有墮落的文化。無聲的台灣，是這樣創造出來的。我曾經也參加沉默的行列，躲在知識的硬殼裡，龜龜瑣瑣表達一些空泛的觀念，零零星星吐露一些泡沫的情感。我的土地長期受到重創，我其實也是幫凶之一。

疏離自己感性的一面，過濾過剩的自我情緒，是我八〇年代以後嘗試去做的工作。我並不認為，散文創作必須要有一定的格式與方法。我也不認為，華美的文字，洗練的技巧，就能構成完美的散文。以社會現實來檢驗散文中的思想，應該是較為迫切的事吧。這樣說，我並不主張所有的創作都必須穿制服，都必須步伐一致。我的意思是，一位作家在不公不義之前，如果一語不發，或甚至去歌頌權力者，那麼他沒有理由不受到譴責。現階段的台灣，絕對不是一個常態的社會。如果有作家敢於宣稱他了解這個社會的動亂，我只有加倍佩服他的鎮靜與自私。

3

爲了我這幾年來寫出台灣社會的鎮壓與抗議，權力者竟然使我失去了國籍。他們以爲，

切斷我返鄉的道路，便可以切斷我的咽喉。他們以爲，割裂我的親情，便可以割裂我的人格。對於十餘年來所寫下來的每一字每一句，我都可以負起全責。當他們拒絕續簽我的護照時，竟然懼於說出拒絕的理由。那位有著發亮前額的據說是外交官的辦事員，以著頗有尊養的語氣拒絕爲我的護照延期時，面容仍然帶著微笑。對他來說，把台灣子弟關在島嶼土地之外，彷彿是一件溫文有禮的事。這次不快的經驗，使我第一次體會到他們如此酷嗜權力的原因。不過，這位西裝革履的辦事員，終於凝住了微笑。原因很簡單，我拒絕鞠躬作揖。低頭，是他應該做的，絕對輪不到我。

我依據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寫下我的見證。我表達我的憤懣，這是做爲島嶼子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我熱愛我的土地，這也是台灣子弟不可分割的情感。國籍是他們的，土地是我的。經過漫漫十年的光陰，我終於找到自己的土地，卻又失去了國籍。這當然是無可奈何而又諷刺的事。只是，我相信，一位回航的浪子，終有受到接納的一天。今天，我向島嶼呈獻這一冊散文集，不僅是要結束我沉淪的舊日，而且也要宣佈，終有一天我要爲我的精神地圖重新命名。這個名字，必然是全體台灣人共同創造的。我堅信，這個日子就要到來。我的堅信，來自我長期不毀的意志，從揚眉的少年到橫眉的中年。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聖荷西

第1輯
啓航

（此處為極淡的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識，疑似為正文或目錄的倒映。）

河想

它是一條河。筱楠，有冷冽冷冽的河水，流過你的眼睛，流過你的耳朵。沿著上游而去，便可找到一座森林——覆蓋千層的落葉，開遍的花叢，以及透過枝桠的陽光，所有的風景都擺設在那裡，有雲有風有山巒，只等待你去。當你逆流游上去，你已化爲一條魚，一條不知歲月，不知愁緒的魚。然後，你不願再回顧，擺擺尾，消失在那水的日子裡。

其實，這不過是我的夢幻罷了。幻想，幻想，稚氣的年齡已成呼喚，不再回來。不再回來。

筱楠，你可曾在深巷的閣樓裡，聽一夜的雨聲，久久不能成眠？失眠的心靈湧起百般的情緒，甜的鹹的，匯集成一條河水，沖激你的胸臆。你可曾在斜風細雨中，穿過冷清的校園？偶爾抬頭，看見夾竹桃開著它們無精打采的花；你的傘也像那花，非常衰弱，雨水打在你的傘上，你的頰上，甚至你的心也沒撐開傘，一股涼意從面頰直接傳到心靈深處，於是你

想起無憂的河水，無憂的童年。唉，濕漉漉的是你我的記憶。我有好幾次這樣的經驗，昔日的聲音在雨水裡吶喊迴響，繞著我的手指我的髮。

真的，我們可以活在城市的陰影下，可以離開大自然，因為我們的胸間自有山水，我們的心像莊子哲學，即世而且出世；我相信，空間的隔離有再回歸的時候。但是，童年卻不能再讓我們臥遊。童年是種純粹，那時候我只關心羊群們如何涉渡過河水，如何使風箏飛揚得更高。沿著河岸奔跑下去，那條小路是首長長的詩，看盡安靜的天空和輕盈的水色，幼小的心境承受潔白的歲月；即使有些不愉快的事，可以在果樹園底下悶一個黃昏。那種悲歡是完全單純的，不需要任何眼淚來解釋。而今，筱楠，那種單純已是遙遠的國度，回憶童年，比捧讀隔洋的來信更為空茫。

我說它是一條河，你就懂了。穿過森林，穿過時間，沿途載浮許多樹葉和泥土，原是清澈的面目，如今已是混濁的一條河水。

這一生從沒想到要擔心這麼多事情：友誼、書籍、初戀以及社會。衆多神秘的手勢到處召喚，何去何從？誰是誰非？我的心如揉縲了的紙船，載不動這許多憂慮。筱楠，童話世界已不容許回顧，陌生的河水便是你我的日子，啊，生命是追尋或是投奔？

我還記得那山頭上的白屋，整個青色山脈迤邐不斷，只爲了托住那點白，山有山的意義。我依稀記得家鄉的稻田，波浪們翻過防風林，去尋找待割的稻穗，它們飄過海洋，爲的是在平原上飛舞，波浪也有波浪的意義。事事物物的存在，必然是爲了要肯定些什麼？它們

擁有一層意義。那麼，我的生命呢？必須要找到它的註腳，否則，任憑生命的名字裝在瓶子裡，隨波逐流？

唉，童年早已飄忽爲神，它無所不在，卻不再降臨。筱楠，我們不能只迷信過去迷信昨日，甜的夢，鹹的夢，只是泡沫而已，沿河而去，終將破的。讓我們做踏實的人，不要做現實或超現實的人，把揉縲的紙船重新拉平，再摺一隻比較堅固穩定的，然後，攜手同去。

生命，原本就是一條河水。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重寫

《純文學月刊》，第二十四期（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天路歷程

——贈自己畢業

那隻白鳥飛離海岸的時候，頻頻回首。我看不見牠的眼神，也聽不見牠振翅的聲音。牠是飛得那樣緩慢，好像一位將要遠行的旅人，我想，陸地上一定有許多事物讓牠依戀；譬如說，牠曾經俯望的草原和曾經擁有的巢。最後牠還是飛走了，在淺海水面繞了一圈之後，便毅然飛逝。牠飛往那裡？牠的方向呢？我不知道，沒有人知道。天茫茫，海茫茫，但見一群綿羊似的白雲向南迤邐而去。

這是去夏五月在海邊看到的景象。那時海風直灌我的眼睛，站在沙灘上，我感到鳥的悲哀。我忘不了那白鳥的緩慢的飛行，至今，牠依然盤旋在我的心頭，哎，也許我就是白鳥吧，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飛行。我頓悟，飛行，是我的最初，我的過程，我的結局。

我的視線劃過蒼茫的天空，冥冥中，我便注定要飛行，這不是命運，而是生命。生命是一隻翱翔的白鳥，我是藍色長空的一點白。有時在雲層裡飛行，有時在陽光下滑翔。回首望望遺忘在背後的路程，確已穿越過不少的天空，而天空依然在我的額前延伸。生命有涯，天空無涯，已經換過許多的羽毛，天空還是不老。

無語的天空，無所謂地藍著。海水默默，無端興起一股波浪，又復平息。這是兩隻藍眼睛，從不說話的眼睛，冷眼旁觀看我的飛過。一生的夢，就寄託在這雙眼中，白鳥啊，你的怨恨與委曲，你的喜怒與悲歡，只是過目煙雲，只是湧起又消失的一道白浪。你的生，這個世界並不為你而存在；你的死，宇宙並未損失什麼；那兩隻藍眼睛，無言地張在那裡。

從開始到最後，我始終在飛行。逝去的日子是一段悵惘的歷史，回憶時雖很溫柔，在溫柔中卻有一縷淡淡的哀愁。二十三年的風雨，已記不得那場雨下在那一年？那陣風吹在那一個日子？記不清什麼雨水打濕了羽毛，什麼狂風掌握過我的生命。那風風雨雨，在記憶裡製造不少傷口，把耳朵貼在傷口聽聽，風颳得那樣銳利，雨水落得悽慘，一隻受傷的白鳥被打落不少的羽毛。傷痕累累的記憶，痛楚的記憶，改變不了我的飛行，這是一種堅持，我的雙翼不停地拍打，因為我是一隻不卑不亢的白鳥。

我是白鳥。我的白羽不在點綴海天的藍色，不斷的飛行，為的是在追尋一塊完整的境域。生命中並非沒有美麗的土地，啊，我曾經停留過許多的陸地，每塊陸地以茂盛的森林誘惑我，選最綠的山谷展開雙臂，以蜿蜒的河流。我只停下來休息，在湖邊喝一口沁涼的水。無庸招展潔白的羽毛給山的倒影，無庸幻想自己是一隻天鵝。我終必要出發的，因為天鵝只遨遊在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裡。

白雲就在前面等我。我不是要赴約，而是追趕，是超越。水平線彼端，似乎有遙遠的鼓聲在召喚，此番飛去，究竟是陰是晴？我毋寧是一隻赴火的鳳凰。白雲的背後，可能還是白雲，有天當我到了飛不動的年齡，我會後悔嗎？也許白雲後面，是一塊茫茫的天空。也許是一塊夢想中的陸地，或是一塊小小的島嶼，一隻僅供立足的帆船。翼上是天，海在翼下，白鳥只有向前不斷地飛，沒有選擇的餘地，沒有後悔的權利，這不是命運，而是生命。

白鳥，是一隻不卑不亢的白鳥。我，有一顆翱翔的生命。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畢業前夕

傍晚的叩訪

到達時，已是傍晚時分。白色的門就在小路盡頭。我想，我可以坐下來休息，靜靜享受一段美好的時光了。多少年來的跋涉奔波，為的是叩訪這扇白色的門；一顆朝聖的心已經疲憊不堪，而崇拜的那股信念依然熾熱。我反問自己，會不會來得太遲了呢？那幢青色的屋子掩圍在林內，我小心翼翼沿著路旁走去，紛紛飄零的是夏日綠葉，葉子掉在地上，鏗然有聲，使我驚覺不少。我感嘆時間，也感嘆自己，蕭條的林木正是昨日以前最好的寫照，不，也是黃昏以前。我走向那門。

輕叩白色的門，指頭才觸覺到那門是緊緊鎖著，像鎖在冬天深處。門內門外寂寂無音，到底是主人外出未歸，還是沒有聽到呢？陰霾中，那扇門顯得更加深白光亮。我的眼睛與獅首門環相對，牠怒視著我，張著不深不淺的嘴巴。我再度輕敲兩下，多麼衰弱的兩聲，一陣冷風自牆的背後翻越過來，我打個冷顫。不久黑夜就要來臨，尤其是秋末冬初的黑夜，那

時，整個森林將不只這麼暗。

是的，已是傍晚時分，我或許來遲了些。主人可能在大廳上燃起蠟燭，會宴早來的賓客了；也可能在高山流水之間，與貴賓們追逐秋風捕獵野獸，他們忘記還有一位客人，一位滿身拘謹滿身風塵的遠客。我站在門外傾聽，牆內並沒有絲毫歡笑聲，森林之外也沒有馬蹄，那麼，主人那裡去了？我回首看看來時的小路，樹幹已染起濃鬱的暮色，我突然感到孤單，衣袖在暮色裡更形單薄，哎，我原是不該來的。在秋末的蕭瑟裡，我只不過是一位平凡的黃昏客。

縮回我的手。酸冷的風掃起許多葉子，有兩片落在肩上，然後，又不經意滑下去。為什麼淒涼的事總發生在秋後的傍晚？如果有人站在林外，看到我叩訪的影子是那樣的衰弱、落寞，他也要為我輕輕掩泣。林內聞不到幽香，看不到落花，有的只是葉子，乾裂的枝條。我靠在牆上，冷冷的磚頭似乎已說明主人的意思：我已被摒棄門外。

從門縫裡，我看到牆內的燈籠已亮起，青色的火焰搖搖曳曳，高貴而矜持。主人在不在家呢？我不清楚。不過，我相信牆內的主人也是而且也將是我胸中的主人。這傍晚的叩訪已成虛行。我坐在階前回憶，且思量著主人曾經的眼神。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

《純文學月刊》，第二十七期（一九六九年三月）

落一片葉又一片葉

蘆葦長高了。

瘋狂的葉子不停地向林外飄送，把無限的愛心吹向無依無靠的秋天。每片葉子有一個巴掌大，猶如一隻隻告別的手飄得滿天，在風中飛逝。遠去的落葉，遠去的愛。

河床暴露潔白的鵝卵石，河的對岸招搖一片暗色的樹林，林後是山，殷紅的天空就渲染在山巒的背後，山影墨黑，罩住整個狹窄的花蓮平原。無語的神，佈下這麼巨大的風景，將又向人類宣告什麼？我納悶在河岸的一塊岩石上。

來花蓮以後，我已不敢作太多的憧憬。少年做懷的歌聲已逐漸淡薄，怎樣的夢就有怎樣的破碎，時間過去了，換來的是一位學歷史的少尉軍官在秋風中沉思。山的傲然，蟬的召喚，草的暗示，都足以佔據整個心靈。握在手中的石子，只是偶然的抬起，竟會引起長久的沉默。是年齡老了嗎？抑是一時的心境？哎，對岸的樹林竟不斷地飄落葉子，河床就張在那

裡，無奈看落葉飄過。我坐在乾旱的河岸上，讓山巒全面震懾我的心靈。

風拂蘆葦，嗚嗚作響，迎面而來的冷意好像要鎖住誰似的。我突然感到有一個聲音對我囁囁細語，冷冽中微帶責備：你相信命運嗎？你以為命運操在自己的手中嗎？黑壓壓的山影俯向我，對我說話一般。環顧四野，寂然無人，我失措一如落葉，那來自山巒的聲音在風中吹送，似有似無，攫住怯懦的我。我感覺出有某種偉大的戲劇正要上演以前的莊嚴，也許是護城神將要降臨，或命運之神。遠去的落葉，遠去的愛啊，來到花蓮以後，我第一次感到惶恐、茫然。我胸中有一座城，連帶過去輝煌的日子，漸漸倒塌下來，塵土飛揚，迷濛一片。

這就是命運嗎？我實在不敢解釋，我只相信一點，人的遭遇是多麼不容預測。有誰能料想得到，有一天我竟會在台灣東部的山巒下，踽踽獨行；竟會在枯萎的河岸承受冷了的秋意。漂泊的生活已使我愈覺自己如落葉的單薄。當一個人隻身離開家鄉，到達未識之境，對月光特別敏感，對冷風感到刻骨，對每滴雨水都覺得是一種苛薄。行伍生活確實使肌膚強壯了，卻也使感情脆弱了許多。面對這樣巨大的風景，看到那吹滿河床的落葉，自己忽然變得渺小，從前的驕縱和傲氣，如今已瘦得一如煙霧。

我看到另一種天空，沒有落日，只是一瀉無遺的殷紅。黃昏樹林猛向鼻頭撲來悲涼的味道，把那麼多的愛交給蒼茫的秋天，而山無語，神無語，究竟在安排怎樣的結局？我是一個見證者，我欲乘風歸去，多麼願望自己是一片平凡的草葉，默默腐朽，進入泥土。

今年的山洪沒來，也許山洪已經過去，焦渴的河床張在那裡，依然期待，河的盡頭就湮

沒在山腳下。對岸暗色的樹林，瘋狂向林外飄送落葉，落一片葉又一片葉，吹向河床，吹向黃昏。幾株斷柯，弱不禁風。我看到天空滿臉倉皇，啊，這樣的景色，這樣的景色，恐怕是秋深時節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於花蓮
《青溪》，第三十二期（一九七〇年二月）

路過大山屯

今年夏天，雨水佔據整個大山屯。

村內的男人和女人，躲在簡陋的茅屋裡，以畏縮（也許是羞澀）的眼光，看窗外一支著綠色野戰服的隊伍打部落邊緣走過。他們看到鋼盔底下的面孔，都是陌生的；他們知道，那是來自平地的文明人。通過村落中心時，隊伍的步伐聲把雨水踩得更響了。一位婦人匆匆上木窗。

大山屯是一個小小的部落，坐南朝北，背著粗獷的山巒，日夜眺望花蓮平原。大概從結繩的年代開始，山胞們就定居在此，世世代代接受山神的保護，山神伸出粗壯的手臂，圍繞這百戶左右的人家，不知是世界遺忘了他們，還是他們摒棄了世界？每座古老的草屋都保持著矜持的姿態。如今村南有一幢教堂，那是文明的象徵，他們不再崇拜雷神、雨神和山神，山胞們的胸中已被教堂鐘聲所取代。教堂外的花朵盛開，招展一種宗教的清新。

那天我們路過時候，雨水下得非常稠密，教堂的白門緊閉著；門前臺階上，坐兩位避雨的山胞小孩，他們臉上充滿好奇的神情。是陌生的容顏驚嚇這兩顆小小的心靈？抑是這一群隊伍的槍枝吸引他們的眼睛？我在心底議論，伙伴們也在心底議論，一位戰士舉起淋濕的手臂，向他們打友善的招呼。那兩位小孩睜著無邪的眸子，注視鋼盔、背包以及長筒膠鞋。我凌亂的腳步，把那條泥濘的山路踩得卑賤無比。我抬頭望望教堂屋脊上的十字架。

這是誰的安排？有一天我居然會走過這個山區？命運的安排，真是無常，人們只有感嘆，我只有感嘆。雨水遮住我的視線，近視眼鏡上被水珠迸濺得模糊不清。突然，我有股衝動，多麼希望教堂有鐘聲揚溢出來，那麼，被震懾的將不只是山胞的靈魂而已，我將帶一顆激動的生命，走過這村落，這偏居山區一隅的村落。

我深深體會到，鐘聲在部落裡，已不是單純的召喚，它敲醒了所有山胞們的夢，他們逐漸告別弓箭、篝火、祭神舞、紋身、巫師的咒符；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割捨？是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們已不識裸背的滋味，再也記不得當年在山林內追逐獵物的情景。自從文明降臨以後，矛槍掛在牆上日夜生鏽、腐朽、弓絃斷了，出征的花色戰服發霉了，所有原始氣息的記憶，隨著時間流遠，漸為山胞淡忘、遺棄。沒有人感覺到，該往何處去尋回當初最接近土壤的性格，我欲喝問，那粗魯的血液呢？那黧黑的面孔呢？教堂在雨水中無語地站著。

我隨著伙伴緩慢走出山神守候的部落，這是今年夏天第一次路過大山屯。我在路上自問，如何去解釋文明和蠻荒的事？荒蕪的山村一直向深山撤退，文明步步侵向山坡，山林。

整座靜謐的山巒不斷被潛移默化，而山澗的水依然唱著古老的民謠，誰知道那裡被改變了？年輕會長的雄心，秋後神賜的豐收，已沒有人在意。山胞學會拘謹的禮貌，他們流著溫馴的血，人類的聲音不再來自山谷，山巒的一切不再走入人類的生命。從前打六隻野鹿的英雄，已不知飄向何處？那位獵人的事蹟，如今已殘留得只剩一段鄉野傳說。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於花蓮
《現代文學》，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飛幡

雨花紛紛，若蛺蝶的夢。僅僅是一夜的時間，撐傘的人們盡望北風，鬱鬱對愁。杜鵑早已泣不成聲，開得輝煌，凋得也賤，已無人關心葉落幾片，顏色黯淡了幾分。一夜之間，所有的默契竟成失約。羊齒植物嚼盡秋日以後，那熊熊的火炬自卑得一如濕土的菌類，不堪回首。誰是這塵世中一顆最相近的靈魂？誰是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

我從書庫看完康南海手跡出來的時候，正好遭遇到一場寒雨，道路兩旁的棕櫚弱不禁風，曲折的倒影蜿蜒蜿蜒寫著我的心情，這可能是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場雨吧。我已懶得分辨雨水的美與醜，我只是擔心去年的雨景會不會重演，擔心細雨將又帶來怎樣殘忍的記憶；我只是覺得疲憊，雨水把我堅持的精神溶解了一些。

你以為我還是那位嗜詩而感情略帶幼稚色彩的少年嗎？你以為我仍停留在著迷一首菩薩

蠻或浣溪紗，甚或一首短短的四行詩嗎？傳說中的愛情、秋扇、青瓦、蹄聲……，已不是我的胸臆所能容納了，往昔那種渴熱的心懷已日趨式微，我委實不願再沉溺下去了。這雨水曾經有我的夢和我的理想；這雨水曾經融化我多少心志；這雨水，久久就是一個象徵。

一幕悲劇已經進入尾聲。翻閱這一年的信札，不覺暗驚，我的思想居然還是羞澀年齡的延續，我總錯覺自己已經獲取無數真實的事物，我以為已可放開心境馳騁久已憧憬的世界；經過多年的追尋，我覺得已找到一片豁然的山林，可以依靠在崢嶸的樹幹，回想一生的委屈。哎，天下有各種不同的情緻，為什麼觸及的時候，它卻又轉換成另番意義了呢？

上次到海濱去，他們以為我要重溫舊夢，其實都錯了，我為的是要埋葬過去。坐在沙岸上，靜觀漁火，微弱的燈光在不可辨識的海面上顯得飄搖；多像那單薄的愛意啊。正待漲潮的濤聲朝我直奔而來，似乎有人在呼喚我從前的名字，無限低沉。對於逝去的舊事，我還是不能自己地頻頻回首。我何嘗不願再回到那溫暖的年代，細說一些城堡的故事，關於中古時期的騎士和貴婦，以及花園裡的教堂、枯葉、風車和民謠。何嘗不想和你行吟水澤，歌頌古老的軼事，譬如傳述洛神，唐明皇的詩賦；及於五代和宋。是啊，為什麼不保留一些古典風味的愛情呢？坐在寬闊沙灘的松林下，湧浪不斷衝擊我感情的兩岸。我無法再嚮往毫無邊際的幻影了，若煙，若霧，若錯肩而過的風。

十二月的季候，人們匆忙地穿梭在雨景中，物理系館的拱形玻璃窗照映天邊最灰沉的一堆雲，真像四月雨水的午後，只是風冷了，樹木更悲涼了。我走過那惹人議論的傅鐘，鐘聲溶入雨中，落在草上，屋頂上，水池中。我的衣襟隨風拍打，猶如黃昏半降的飛幡，不止是落拓而已。

楓葉青青

看見楓葉青青的時候，是在五月的黃昏，雨過了，風來了，寂靜的夕陽向遼寬的天空尋找依靠。仰望見綠葉的後面，隱現一堆染紅了的雲，啊，那天空看起來真像是一塊夏日的天空，空氣中好像飄盪一種看不見的甜味，我用舌尖舐一舐晚霞，那甜味很淡，在若有若無之間。可是，她卻關心起楓樹了。我沒注意到她的神情，那塊漸漸轉紅的天空正逗引我的眼睛，這時候的感情想必是接近雲的顏色吧，只有微醺的顏色正好適合楓樹的枝葉。我回首要指引她的時候，她正悄悄把一張變黃的楓葉夾進書裡。

從四月以後，我的生活突然光亮起來，路人的眼光竟也容許我攀折花枝，是不是日子裡已開始隱藏了一些美麗的事物？會不會是誰在今年夏天爲我隱藏了一個秘密呢？我久久不敢去追問。每次經過那片樹林，便有一股綠色的影子向我襲來，沒有人知道，我實在掩不住心頭的喜悅。有一天，她拉著我的手臂說：「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她的微笑好像要揭發一

個事實，我看她走的方向正是通往那片楓林的路。我很喜歡她爲我領路，雖然我知道楓林就在那幢木屋的後面，雖然我也知道到了秋天，屋後的一片愁紅特別招惹人們的視線。我只是靜靜地踩著她的鞋印，在遠遠的地方，她就遙指著說：「看，楓葉轉綠了。」她的眼睛裡面也映著楓葉。夏季確實已經來了，在人們沒有留意的時候，它慢慢裝扮自己的容顏，把許多舊愁埋入新的顏色裡，埋得很深很深。

我應該選擇一張比較有光澤的楓葉，準備把它夾在新書的最後一頁。看完天邊最紅的一塊雲之後，我繞楓林的樹幹走，她跟在後面嘀咕著，好像在解釋什麼，我只聽到其中的一句話：「楓樹和槭樹是一樣的，到了秋天又要轉紅。」但是，我現在對植物的知識並不感興趣，只是計劃揀拾一張漂亮的楓葉，如果秋天來了，它還保持綠的顏色吧，但願是的，而且我決定在葉子上面寫下幾個字，譬如「一九七二的夏天」，或是「和蜜江路過楓林」之類的句子，讓字跡逐漸變成葉脈的一部分，我想她也會同意。

在花蓮服役的時候，也曾經拾過一張手掌一般大的秋葉，那時，演習的野戰車輛，正緩緩通過沉寂的海邊……每次不經心看到它，那些隱隱約約的葉脈似乎在爲我領路，領我走向遠遠的海岸，走進那不能還原的日子裡。也許我是寂寞的人吧，喜歡一個人點燃不明的憂愁，又捻熄一些零零星星的記憶。有時，我把寂寞當做花瓶，坐在燈下欣賞把玩；有時也把寂寞當做一杯釀好的陳酒，自酌自飲。但是，寂寞更像一張楓葉，在默默中隨著季節轉變顏色，看到葉子似乎就看到模糊的自己，多少有些自憐，自怨。

我是很容易爲楓葉所折服的人，看到楓葉青青，思緒也隨著青青，看到楓葉轉紅，情緒也跟著轉愁。可是她知道我也很堅強，我不可能被一張脆弱的紅楓所擊敗。我只是覺得楓葉是哽在秋天喉嚨的一句話，落下來的時候，就如像吐出來一個句子，卻永遠說得那樣不完整。落在地上的是破碎的楓葉，是破碎的語言，這裡落一句話，那邊落一句話，誰的鞋印裡也容納一句話，今年落完了，明年再落，一個不完整的故事便不停地傳說下去。去年秋天的語言，向風中追尋答案，在風中飄盪，漸漸化爲腐朽的泥土。新的一年有新的語言，今年葉子比去年更綠，新發的枝芽也比去夏茂盛，我拾起一張沒有腐蝕的楓葉，它可能只是故事中的一個句點而已，我輕輕拭去葉面上的濕泥，仔細端詳它的顏色，在落日的照耀中，竟閃爍幾點光亮，我決定把它當做今年夏季的標本。

她很高興我也那麼珍惜楓葉，她說願意把一張已經變成暗紅的楓葉贈給我。其實，我是在珍惜自己的生命，當我彎腰拾起一張落葉，也等於拾起一段遺忘的時間，拾起一個疏忽的自己。我拾起的是故事中的一滴眼淚，一個微笑，一絲冷卻了的雲朵。楓葉青青，是我今年夏天的寫照，是我生命中光亮的一部分，在纖細的葉脈上，找不到絲毫的憂愁，它隱藏了今夏的一個最大的秘密，我不忍去揭開它。我很感謝她邀我到這片楓林，只有溫柔的女子才瞭解楓葉，或許，她是楓葉的化身，把新的記憶輕輕交給我。地上的殘紅，只是一些舊夢，在潮濕的塵土裡腐爛，在五月的黃昏逐漸轉暗。我的日子是美好的，明年看到楓葉轉綠，也會

看到她揀拾楓葉的溫柔。我再次舉目遠眺天邊最紅的一朵雲，那形狀像極了秋楓，她又開始解釋楓樹和槭樹，她不知道我已變成一張楓葉了。

——一九七二年七月

秋渡華盛頓湖

已數不清有幾次，在夜間乘車跨越華盛頓湖。每次總是被湖畔四周浮起的燈光挑動記憶，閃爍的燈影，恰似無盡的新愁傾瀉了滿湖；總是在這個時刻，一股怯懦而慌亂的感情在血液中迴轉，但見黯淡的湖面像一片龐大的黑影，迎面撲來。秋，是陌生的秋；燈，是異國的燈，許多舊事從暗處強烈地湧上心頭。

你八月離開台北時，未能為你送行，到現在我仍引以為憾。你飛往香港，我來到西雅圖，正應驗了鄭愁予的詩句：「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今年是我有生以來，心情最難調整的一年，也是季節轉換得最快的一年。九月時，飛機過了夏威夷，我便立刻投入了深秋，那種從未經驗過的冰涼，瞬即襲上我的衣領，使我感到些許顫慄，也感到些許難過。等到站在舊金山的海關門口時，一種莫名的脆弱感擊打我的胸懷，從前那股頑強的意志，竟絲毫不容把握。我相信你說的話是對的，離國是一種「連根拔起」的傷痛，我想只有那四個字

才能貼合我當時的心境。進入海關，什麼都變成了鄉愁，我看到夜晚的舊金山，正在機場樓窗外眨著狡黠的燈火。到舊金山不要忘記把花戴在頭上，有一首歌曾經這麼唱過，我沒有花，只是帶著沉重的心情來了。

到達西雅圖時，另外一種秋天早已在等候了。這是一個靠近海灣的城市，湖泊和樹林圍繞城的四周，初下飛機，便覺得好像闖入一座壯闊的公園。可是，過了兩個星期，所有的樹木都紛紛變色了。無聲無息的，不見秋風吹來，也不知是從那一株樹開始的；有一天黃昏，從華大校園的高處經過，發現滿城的樹林已經換了顏色，從淺黃淺紅到深黃深紅，無邊耀眼的顏色覆蓋過來，我突然不知應該用什麼感情來接受這幕巨大的秋景。秋天確實是來了，好像蓄意要擊敗誰似的，一夜之間偷襲了這座城市。又過一個星期，葉子便蕭蕭而下，秋風也隨後而來，幾株比較衰弱的樹，一邊換色，一邊掉葉，剩下空空的枝桠在風中搖動，為與日俱增的秋色更添幾分淒清。

這裡的楓葉最美，無論是懸在枝上，或是飄在地上，那種醉人的暗紅隱約透出肅穆之氣，它只能觀賞，不宜揀拾；我曾拾了一張回去，端詳了一夜，迸然想起一塊遙遠的土壤，以及土壤上的親情和友誼，一張小小的紅葉，竟能使人睡得那樣不安，我不知道為什麼落葉最能惹起鄉思？最難忍受的是，走在空蕩蕩的路上，無數的亂葉從腳邊掃過，總覺得有什麼東西掉下去了，隨著落葉吹走了。猛回頭，好像滿地掉的都是自己的東西，待俯身去揀，滿地卻都不是自己的。一堆落葉，一團混亂的思緒，廢然站在秋風中，兀自倉皇不已。時光的

流轉，空間的變換，使人覺得什麼都不太可靠，秋風吹打我的肌膚，我真不忍轉身去看落葉飛揚，惟恐落葉的聲音細數我過去的一切。

遠在東方的你，或許能想像出我此刻的心情，這樣的處境相信你從前也經驗過；我只是想說，我是十分想家的。天地有多大，我們總屬於一塊土地，無論那塊土地如何渺小，總是盤踞我們的心胸；飄泊有多遠，總是有根線繫住我們，無論那條線是如何的細，卻不斷牽動我們的靈魂。有人曾經形容這是一個花果飄零的時代，那種心情我多少能揣摩出其中之一二，我雖不是花果，但是看見西雅圖的落葉滿地，竟也覺得自己開始參加飄零的行列，這樣的感慨，我實在找不出一首適當的詩詞來詮釋。這幾天越陷越深，看來距離下雪的日子已經不遠。寒雨也開始下降，據說這場雨將持續到明年的春天。落在身上的雨水，彷彿有點熟悉，只是冷酷了些，憂傷了些。走在雨中，更使我覺得我們那塊土地的溫暖，那塊土地滋養我廿餘年，敲鑿我也塑造我，如今突然遠離它，投入蒼茫而冰涼的天涯，你當可想見我懷念之熾熱。在台北時，我曾試圖喚醒一些墮落的靈魂，讓他們睜開眼看看自己的土地，多嗅嗅自己腳下的泥香，沒想到這樣的鼓吹，竟也成了「罪過」；那時我常常自問，是不是自己的觀念過分激進，或者說，過分保守？來到這個陌生的城市之後，使我能夠從容而冷靜地回想，並詳細檢查過去所說的話，我發現自己並沒有說錯，而且使我自己對自己的信仰更加堅定。我實在不瞭解，為什麼有人寧可鄙視自己的泥土，而自甘沉淪在不著邊際的「宇宙」夢想裡，也許葉珊說得很對，這種人如果不是天才，便是騙子。離開了自己的土地，給我一個

機會觀照從前的生活，讓我客觀地檢討自己反省自己。有時坐在圖書館，望窗外的雨水和落葉，便會設想自己如果是在台北，我將如何延續自己的信仰，堅持自己的生活。異邦的秋風秋雨，使我深信，擁抱我們的泥土已不僅僅是一種美德，而且也是一種義務。

這些年來，時時得到你的鼓勵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你能夠諒解我的心懷，在這個需要關心的年代，你的勤勉已是我意志的泉源之一。這次離國，我隨身攜帶了你最近出版的詩集——《白玉苦瓜》，你的信念和毅力都容納在這冊詩集裡面，即使遠在天邊，你灼熱的感情依然讓我覺得燙手。雖然在功課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之下，我還是不想放棄對詩的著迷，你的詩句或可維持我的一些信仰。前日收到你的來信，可以看出你的豪邁不減絲毫，你說，來到香港，好像回到久別的母親的床邊，竟覺陌生得可怕。我知道你的心還停留在台北，多年來，你的詩文已顯現出，從懷舊的心理漸漸轉化成面對現實，在你的這冊詩集裡，留下了一些演變的痕跡，你勇於面對現實的意念，我是相當信服的。我相信你的轉變，可以解除一些人對詩的誤解，同時也可以影響一些人去關心現實。我們都負欠這塊土地太多了，假如詩真是時代的見證的話，那麼，今天有許多詩人都應該回頭看看自己留下了什麼？歲月的遷移不容人駐足，大多數的詩人在台灣度過廿餘年的時光，他們是不是驚覺到，時間正向廿世紀的末葉跨越，他們將如何告訴子子孫孫，他們見證了什麼呢？

來此已屆兩月，時時以家土為念。前夜，經過第四十五街，忽聞古箏的聲音琤琮傳來，先以為是錯覺，駐足再聽，竟是一曲《漁舟唱晚》，當時我激動得像是聽到母親的召喚，幾

第2輯
遠航

乎不能自己，欲循聲而去，已不復可得，令我徘徊許久；異鄉聽箏的感覺，會是這般悲切，回首再三，換來的卻是陣陣寒風，和斷續的雨水。今晚我又坐車橫過華盛頓湖，看兩岸明滅的燈火，不禁想起大學時代，每晚經過中興橋的情景，遠處三重市的夜火，華江大橋的燈光，一再照映少年時期的幻夢，那時候從未想到，有一天我會離開那裡，到另一塊土地上接受煎熬。初來異域，總會遭遇折磨的，我更需要奮鬥一段時期，讓我的脊背磨得更為筆直一些。每次想起你在〈守夜人〉寫下的詩行：「五千年的這一頭還亮著一盞燈／四十歲後還挺著一枝筆」，我的精神就為之一振。現在我已漸漸習慣看落葉亂飄，斜雨橫打，我的信心也正在恢復之中。讓秋天渡過華盛頓湖，讓歲月醞釀一顆更成熟的心靈，我此刻的心情，相信你是瞭解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雅圖

為了忘卻的紀念 ——焚寄吳錦翔

再夢見我回到我們寧靜的鄉村，我已經成年了。那時，你離開這個世界已將近五年了吧。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能忘卻的。總以為，你的，我的，陰晦的，感傷的，種種記憶，都會趕在我成年之前而忘記，且深深埋葬了它。然而不然，像隱疾一樣，許多創痛的舊事，都會定期發作。離開我們的家鄉愈遠，記憶就加深顏色；發痛的時候，如一隻蛀蟲啃噬我的心靈。你了解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而沉重的是來自我的背叛。我一直相信，我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們的鄉村。

我也不是不想回到我們寧靜的鄉村。那年，你剛從南洋回來，寬闊的前額隱隱告訴我們村人，你是為了改造故鄉而回來的。我的幸運是，在我即將告別青澀的年齡，且正要跨進懂得思考的階段，遇見了你。我必須承認，和你坐在山坡的樹下，俯望我們的村落時，我的內心充滿了崇拜。與你相處的那幾年之中，那種崇拜的欲望，緊緊飽滿著我的胸懷，但我從未

說出，我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認，當年究竟在崇拜什麼？你指著朝村外的一塊綠田，那原是貧瘠的泥土，憑著你的耐心和毅力，竟也長出了作物。青色的葉子，覆蓋那彎曲而狹長的地帶，我也看到你的信心在成長。鄉裡的人都說，你是一位讀書的農人；在我的眼中，你是會種田的知識分子。你在教書之餘，也捲起袖子，學習掘土插秧，你逐漸變成我們鄉村的信仰。

那時你剛邁進壯年，三十歲出頭，正是最扎實最粗壯的時候。你領一群黝黑的學童，走到河邊，撿起石頭與他們比賽擲遠。我看見你堅碩的手臂，在河邊迎風揮動著。遠遠地，你整齊的牙齒在陽光下閃爍，學童們圍繞你奔跑跳躍，像一些無名的星球環繞著一顆恆星轉動。微風傳來你們的喧嘩，我們窮困的村落就因為這樣而活起來了，不只是你在貧瘠的土地上施肥播種，同時也是你為新一代植下信心。你真的領著陽光回到我們的鄉村，回到那終年沉悶陰霾的小地方。

在臨窗的燈前，你會回憶從前在南洋叢林裡的生活。對你來說，那大概是你最感淒涼最感痛楚的經驗吧。你，意味著你那個時代的不幸。你的零碎的不完整的日式教育，使你不能條理地思索，更難以吸收新的知識。而你情願被徵召去打一場莫名的侵略戰爭，幾乎動搖了你的理想。你一再提醒我，我們必須懂得感謝，時代太平了。時代果真太平了，我跟你望著窗外凌亂稀疏的燭火，你昂起首，又恢復磐石一般的坐姿。你說，只有這一片土地，能夠舐淨你的傷口。你推窗而起，家鄉的稻香的空氣，立刻湧到你的書桌。你笑了笑，坐下

來，看著我說，你比我幸運，你一定會比我勇敢。

我是勇敢的嗎？我不知道，猶如我不了解我們的鄉村，我們那一塊偏僻的窮困的土地。其實，我那時內心有著恐懼，害怕永遠留在這個隱藏在群山之中的小村落，害怕寂寞地過完我的一生。你可以感覺出我的猶疑，黯淡的燈光裡，你可以看到我慌亂的影子投在牆壁上。你撫著我的肩膀說：「堅強起來，有一天你懂得思考以後，就會了解這塊土地的珍貴。」你翻開聖經，唸出你偏愛的一段：

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喫的。地必給你長出荆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那年我才十八歲，不懂得思考，也不知道體會聖經的意義。如果你感動了我，不是因為聖經的旨意，而是因你低沉的聲音，及聲音裡蘊含的勇氣。我答應你，我也要改造我們的鄉村。

然而，我那時正忙著大學入試的準備。有時我感到迷惘，土地真的那麼重要嗎？常常看見村人，笨拙地在田園裡墾挖番薯，在夕陽中，彎腰的吃力的黑影，使我感到無限淒涼。我迷惘極了。你對土地那樣執著熱愛，使我欽佩感動，我卻不能真正瞭解你的心情。十八歲那年，我開始關心村外山外的世界。我總覺得外面的世界，是一片廣闊的天地，足夠讓我飛

翔。我急著想脫離我們寧靜而近乎寂寞的村落，我急著想告別我青澀的年齡，猶如我焦慮地幻想我的虛有的世界。

我開始憧憬遠方。

不錯，我憧憬遠方。有一年暑假，我們坐在山坡地放風箏，彎彎的天空下，愈感覺整個世界的遼寬，愈感覺我們鄉村的寂寞。我彷彿隨著風箏，把手伸出去，觸探那未知的遠方。遠天的浮雲，使我感到卑微，竟使我埋怨起自己的土地。我暗自告訴自己，我當屬於浩瀚的生涯，屬於一塊更空曠茂盛的草原。

現在我才領悟，在你回來故鄉之前，我已營造了一座牢不可破的自我世界。你的歸來，使我陷於矛盾，我踟躕於你的熱情和遠方的誘惑之間，一方面我鄙視我們的村落，一方面我又不能不依賴它。那實在是個苦悶又開朗的年紀啊，滿足於對你的崇拜，又渴望著無名的遠方。

遠方終於征服了我。那年村落的變化特別急劇，先是一場乾旱襲來，使得春耕延遲；緊接著，是你任教的學校，人事起了動亂。你突然變得沉默無語，整座村子就愈顯得非常寥落。學童的喧嘩也隨著凝滯下來，村人對你的信仰開始動搖了。後來，一場雨水迅速降落在村人的喜悅裡，大家都忙碌地播種一些短期作物，你的田地竟然荒蕪了。我只是覺得，那場斜斜的雨霧，像一支輓歌圍繞我們的村子，像預告什麼即將凋零，我不知道是我的年齡或是對你的崇拜？自從你開始在晚間閉門喝酒，我便停止每晚去看你的習慣。而且，我應該坦白

說出，你的轉變，突然釋去我內心的負擔。我可以全心去崇拜我的遠方，我已決心離開這個貧窮的村子。

我離開家鄉的前一個月，你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寧靜的村子，陷入極度的悲哀中，每個人都在搖首。你的死，混亂了我的思考。我已考取北部的一個學校，鄉人都在為我慶幸之際，你遽然遺棄這個世界，我不知應該如何來安排我自己？有人說，你是因為感情的煩惱而自殺；也有人說，你和學校新的人事主任相處不合。你什麼話都沒有留下來，就走了，那麼孤獨，那麼沉默。

我到你的墳上辭行時，心裡很恐慌。這次離開家鄉，就永遠背叛了它，也等於永遠背叛了你。站在空曠的墓地，風中送來熟悉的甘薯葉的味道，覺得有點不能自持。倘若我生命的一部分已經逝去，或即將逝去。我會不會再回來，甚至都不能肯定。在你的新墳上，我焚燒了一些紙錢，飄揚的紙灰蝴蝶一般地飛了滿天，我青澀的年齡大概也逝去了吧。我懷著空虛，又輕微帶一點興奮，踏出我們的村口。

這些年來，距離那些舊事已經很遙遠。但是，這些事都隨著我的成長，四處流浪。我飛進我的天涯，卻不知我在做些什麼？每當夜晚襲來時，便習慣以雙手掩上我的臉，我害怕面對窗外疏落的燈火。你生前開墾勞動的影子，時時映在我的內心；你死前的自毀自虐，更刺痛了我。我不斷咀嚼你的死因，漸漸的，我似乎比以前更瞭解你的心情。你的理想不能適應那個雜亂的時代，或反過來說，那個時代不能容納你，或兩者都不是。我的時代畢竟是從你

流浪的吉他

去年大雪壓境，持續的寒意久久不去。校園的樹幹仍殘留一些霜痕，像是侵蝕的，又像是咬噬的。衰弱的枝柯，竟也挺挺舉起，撐住整個天空，隱隱約約透露一股堅定的意志。穿過樹林時，意外地發現兩三片綠葉，已在枝頭眺望，或許它們已看到遠處的春天了吧。

校園廣場的角落，傳來一陣陣抑揚的民謠，起落的吉他旋律，隨著陽光四處飛翔，似乎帶來些許的溫暖。總是有這樣的賣唱者，在嚴寒的季節，在淡淡的初春，把哀傷的，愉悅的心聲唱出來。總是有是一群失落的人，圍聚著不知名的賣唱者，讓古老的或即興的民謠，變成他們的共同語言，相互取暖，相互傳達彼此的信息。

今天的陽光，又把久違的歌聲帶回來了。啊，那是一位年輕的母親，迎風彈著六絃琴。她的孩子正俯在背上睡覺，好像是母親的歌聲，把嘈雜的世界隔絕在外面，所以他才睡得那麼甜熟。一隻黑狗就俯臥在唱者的身邊，不停地抬起頭張望。她是誰？來自何處？這些都不

那個時代延續下來的，每當我看到苦悶的青年或意志消沉的人，便不期然想起你。我不忍責備他們，猶之我不忍責備你。

然而，我不能永遠懷抱一個殘缺的偶像，到處奔走。我強烈懷念我最初的那塊土地，我可以確信，我會回去的。就像你當年爲了改造故鄉而回去那樣。但是，在我回去之前，我必須把你忘卻。我要忘掉你，但也要紀念一塊土地。當我把臉埋在溫熱的掌心，萬種憤懣和哀怨都冷卻下來，凝成一滴卑微的雨水。我讓許多話都化成寧靜的黑夜，化成冰涼的空氣，讓風吹遠，吹散。我知道，這樣忘卻你是不妥當的，卻是必須的。當我忘掉你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心靈將和整個空曠的天地，等高同寬。

——《中外文學》，一九七七年

重要。圍聚的人只想聽一聽歌中的信息：

人生總有幾場勝利的仗

今天我跌倒，流血

你們用獸一般的眼看我

你是，不要笑

讓我舔淨所有的傷口

拭盡一路的血跡

我終要站起來

只因我相信

人生總有幾場勝利的仗……

她的歌聲在高亢處有幾許顫抖；低吟時，又是如此憂傷。有人以掌聲配合歌的節奏，疏疏落落，在空氣中迴響，我終於也忍不住擊掌回應，四周的人也共鳴著。年輕的母親笑了，帶著稚氣，夾雜一些黯淡的神情。她的節奏漸漸慢下來：「喂，朋友，讓我打好這場人生的仗。」歌聲琴聲戛然而止。許多人報之以熱烈的掌聲，一時使得寥落的冬天突然溫暖起來。有人丟銅板，有人愣愣地站在那裡。她吞一下口水，提起吉他，又唱出另一支新歌。

不知這樣的歌是古老的，還是臨時編造的？無論如何，我總是被這樣的歌者感動驅使。歌聲背後，往往蘊藏一則動人的故事，深深擊中過路人的心靈。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揹著小孩的歌手，一把吉他，一個行囊，一隻黑狗，便如此走遍天涯。我想，路邊的歌謠大概是最原始的，沒有經過電視的污染，沒有經過酒店經紀人的煙熏，直接從肺腑唱出來，直扣路人的心弦。

遠處枯樹仍筆直落寞地站著，似乎也想從民謠歌手的聲音裡，攫取些許慰藉。這樣的歌手對我是太熟悉了，好像到處都可遇到流浪的吉他。曾經在舊金山，電纜街車站旁邊，看到一對來自愛爾蘭的移民夫婦。他們各提一把吉他，站在鮮花店前的走道，朝著去了又回的街車，重複唱著幾首愛爾蘭民謠。鈴聲搖盪的街車，好像在為他們的歌謠打節拍，許多人都駐足傾聽。其中有一首是這樣唱的，使人低迴不已：

如果您聽到歌聲

那不是讚美，而是呻吟

如果你聽到槍聲

那不是慶祝，而是處決

但是，陌生的人們

如果你看到半俯的愛爾蘭人

請不要吃驚

他不是被擊倒

而是正要站起來

短短幾句歌詞，便精確地唱出愛爾蘭的歷史。這對夫婦都現出苦澀的微笑，歌聲穩重而圓熟；可以想像得出，滄桑的歷史是如何把他們傷害得這般蒼老。他們唱了整整一個上午，有一位路人在花店買了一束鮮玫瑰，雙手捧給他們，又引來更多的聽者。

在一切的歌曲裡，最使我信任的還是民謠。在電視中、舞台上的演唱者，大多是選擇最艷麗的服飾，摘取最動聽的旋律，唱出的卻是相當鄙俗的字眼。我說的鄙俗，不是民謠中那種原始拙樸的精神，而是一種迎合低趣味的格調。現在的美國文化，有一些是反映在所謂的 truck driver's song（卡車司機歌謠）。這種歌大多圍繞著色情與畸戀，主要是讓那些長途駕車感到寂寞者，提一提精神；當他們到達終點時，這些歌也就全然被遺忘了。另外還有一種歌，叫做 honky tonk song，大多流傳於夜間的酒吧。美國近百年來的都市文明，製造了一批定期造訪酒店的飲者。他們多半是低薪工人、學生、單身者、婚姻不滿者，他們企圖在酒中忘卻白日，於是一些鄙俚的歌也隨之產生，幫助他們度過漫漫長夜。這些歌曲每天每週可以誕生數百首，同時每天每週可以淘汰數百首。就像飲即溶咖啡，或是可口可樂，來得容易，去得也快，完全沒有回味的餘地。

而路邊的民謠，似乎變成美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據點。那些飄泊的歌手，仍然保持先人拓荒的精神，他們唱出他們所要反抗的，歌詞簡潔，旋律單純，非常能打動人們的心懷。青年人失業了，可以提一把吉他跑天下，在歌中罵他們的頂頭上司。反戰者也拿起吉他，用歌聲抵抗徵兵的制度。反核示威者，也以他們的歌謠來教育群眾。有一位反核的歌手就這麼唱：

哈囉，卡特先生

如果建一個核電廠

比種一棵家庭植物還容易

你何不在你家後院

種他兩三株？

這樣的歌雖短，卻含有強烈的抗議。因為英文的核電廠是 Nuclear Power Plant，而家庭的植物是 House Plant。在歌詞中正好押韻，聽起來很幽默。美國的支持發展核子者，始終堅持一個理論，每年數以千計的美國人，因花粉熱窒息而死亡；而到現在為止，真正因核電廠災難而死，卻寥寥無幾。民謠的歌，就根據這個理論譜成一首歌，給予間接的諷刺。

是的，我始終認為民謠是可以信任的。民謠注入人心以後，就不是單純的一首歌了，而是一種信仰，一股力量。有一次在朋友的聚會中，有人唱起台灣民謠（補破網）：

看到網，眼眶紅
 破得這麼大孔
 想要補，沒有半項
 誰人知道我的苦痛
 今日若將這來放（棄）
 是永遠沒有希望
 為著前途的希望
 找工具，補破網

音符很簡單，歌詞也相當拙樸，卻有深長的意義。台語中的「漁網」，發音與「希望」完全相同。據說這首歌誕生於戰爭的末期，台灣的百姓在困苦的生活中，對未來寄有無限的期望。歌中的「網」指的是現實，他們在絕望中，終於把破漏的網重新補綴起來。節奏緩慢，意志堅強。在今天的台灣來的留學生，流傳相當廣。顯然，他們在困苦的留學生活中，對未來懷抱著無窮的希望。

有民謠的地方，就有溫暖。在這冬天快要告終時，民謠的歌手為我帶來振奮的精神。我仰望藍天的青空，背後的歌聲不停傳來。我是多麼希望在老家的一個平凡鄉下，遇到一個吉他手，把我此刻的憂愁唱出來。然而，這是異國的青空，慰藉我的是如此的歌聲：

人生總有幾場勝利的仗
 今天我跌倒，流血
 你們用獸一般的眼看我
 但是，不要笑
 讓我舔淨所有的傷口
 拭盡一路的血跡
 我終要站起來
 只因我相信
 人生總有幾場勝利的仗……

——〈聯合報〉，一九八〇年二月

磐石與鏡

——我的俄國史教授屈萊果先生

一九七四年秋天，我到達西雅圖時，整座城市正由綠色轉紅轉黃。那是我第一次被大自然景色的轉變所震懾。來自亞熱帶的人們，從來不會了解季節的區別是如此分明。我看著楓樹與橡樹，如何被季節慘害，原是枝葉分明的楓樹，在短短一週內，立刻變成令人心折的艷紅；再過兩週，所有的樹葉集體落盡，一時使人不敢相信這種急速凋零的事實。橡樹也是，先是半黃，然後深黃，不數日又成枯褐。緊接著是一場刺骨的寒雨，滿地的落葉便開始它們腐蝕的命運。不久就完全消失了，似乎再也沒有人提起楓與橡的夏日盛況。剩下的是觸目驚心的禿樹，猶如一隻隻向天空求救的手掌，一股淒清的感情，壅塞整個大地。

我去拜訪歷史系系主任時，落葉的聲音鏗然可聞，好像在細數我沉重的心情。我那時的沉重是有原因的，一來初入異域，內心充滿不可靠的失落感，總覺得踏出的每一個步子，都不夠扎實；深恐前頭有陷阱，猶疑與畏懼盤踞著心胸。二來聽說華盛頓大學的俄國史研究，

在美國是重鎮之一，而我要拜訪的系主任，正是全美數一數二的俄史教授屈萊果先生（Donald W. Treadgold）。我深深瞭解，以我在台灣學習俄國史的背景，必然難以追趕此地的水準。所以，在見到屈萊果先生之前，感到惶恐不已。那樣的心情當然不是自卑，而且我也有足夠的理由不必自卑；我惶恐的是，應該用什麼問題與他交談？經過校園的一片樹林，我發現北美洲的天空特別青藍，但那時我實在沒有心情去弄清楚，為何北美的天空比我家鄉的還藍？

他是我看過的少有的儒雅學者，談吐清晰，態度和藹，在數分鐘內，就使陌生的距離拉近不少。屈萊果先生的辦公室整理得相當乾淨，就像我日後所讀到的他的文章那樣，井井有條，潔淨且引人。與他談話時，可以看到背後一排落地的書架，擠滿了許多有關俄史研究的書籍，他的著作之一：《二十世紀俄國史》（*Twentieth Century Russia*），就置放在他的右手後方。當我向他提起：「台大劉崇鉉先生向你問好。」他笑得很開心地說：「是的，我在台大教書時，曾與他多次交談。」屈萊果先生在五〇年代晚期，曾以交換教授的身分在台大執教一年。當時台大的夏濟安先生，便是交換來華大做研究工作的。屈萊果先生回來後，夏先生仍留在此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後來夏先生的傑出作品《黑色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就是在華盛頓大學完成的，要探討中共的文藝政策，以及中共作家的因緣，這本書已成了不可缺少的參考書。

我正式選俄國史，是來西雅圖一年以後的事。許多美國同學都來勸我，最好放棄選修屈

萊果先生的課，主要的原因是不容易通過。他待人非常親切，但在學術上、行政上，徹底地做到六親不認，這是他使人敬佩且畏懼的重要原因。據說，他的新著《西方文化在俄國與中國》（*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上下冊剛剛出版時，他曾頗具信心地說：「我這本書容或有缺點，但要同時批評這兩本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精通數國語言，包括德、法、俄、拉丁與中文；但他精通的並不止於語言，對於俄國歷史、歐洲文化史、中國近代史也是相當熟悉，這也是他有勇氣做中俄近代文化的比較工作。此書便是探討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中俄兩個東方民族如何回應，又如何影響它們在現代世界所佔有的地位。這二冊書問世以後，頗受各方注目，卻沒有人敢輕易寫書評。後來，還是有人提筆向他挑戰，果然遭到他精確而嚴重的反擊。

第二年秋天，我還是鼓起勇氣踏入他的辦公室，這次不是拜訪，而是上研究生的課。全部只有四個學生，一週之後，一個退選，一個改成旁聽，正式選課的是我與另一位美國同學。以我當時的英文能力與知識程度，自然覺得力不從心，過了學期中間，我終於知難而退。

那時，我氣餒到了極點，當我向他說：「我最好還是從大學部的課程選起。」屈萊果先生半句話也沒說，便立刻同意了。我無語退出他的辦公室時，心情複雜極了。而樓外正飄著皚皚的白雪，我站在窗口，看校園驟然變成銀色的世界，那刹那的美使我內心已有的惆悵更加惆悵。

我知道，如果我要重建自己的信心，就必須繼續選他的課，否則我將永遠被擊敗了。他在春季班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現代俄國史」，我一再提醒自己，絕對不要錯過這門課。校園的櫻花再度熱情奔放時，春季班也隨著開始了。這一次再跨入屈萊果先生的教室，我發現學生特別多，原來他的演講課程特別引人，所以學生也都硬著頭皮來了。那實在是值得一選的課程，在講堂教課的他，與在研究室時大不相同。他每次踏入教室，並不立即上正課，而是引用一段名言或一件時事做為楔子。每次他敘述一項時事問題之後，便會要求學生加以評論，然後再由他綜合分析。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次，是四月上旬的一個早上。他匆匆踏進教室，在黑板寫下英文的「秦始皇」。全班同學都面面相覷，不知所措。他說：「前幾天北京發生了示威抗議事件，你們或有所聞，現在比較詳細的情況慢慢傳達出來。根據昨天的收音機，北京曾經貼出一張大字報，其中有一句話是：『秦始皇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你們知道，秦始皇是誰？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全班同學又是一度沉默，屈萊果先生轉過來，要我大略解釋一下。我說，秦始皇是中國史上的獨裁君主的象徵，這句話所影射的自然是在毛澤東。這位五十幾歲的教授，感情有點激動，開始講述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下，如何以曲折的語言表達他們的思想，又如何以直接的行動表現他們的憤怒。

那是一九七六年春天的事。古老的亞洲大陸正走到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天安門事件，唐山大地震，「一代梟雄」毛澤東告終，「四人幫」被捕……，像悶雷一般傳來，縱然遠隔一

片浩瀚的太平洋，也依稀可以感到持續的震撼。這麼熟知世界局勢的學者，屈萊果先生，必然會提起這些事件。要描述他，似乎可以用「無可救藥的自由主義者」來形容；但是要瞭解他，則必須具有廣博深邃的知識。然則，說他是自由主義者應該是不錯的。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研究俄國共產黨那麼透徹，而批評俄國統治者又是那麼無情。每當提到俄國的御用歷史家時，他總是用如此的口氣：「那批可憐的史家」。上過他的課的學生都知道，如果想要了解他對專制統治的憎惡態度，那麼從他的批評字眼就可看出一二。在他那冊流傳極廣的《二十世紀俄國史》，屈萊果先生始終保持冷靜的語氣；當他想刺一下俄共時，便謹慎地選擇一些含蓄的，無傷大雅的字句，頗為準確地觸到痛處，讀者可能忽略過去，然而再次回味時，才發現字句背後藏有繁複的意義。這也是那本教科書，能夠成功地說服學生，並得到廣泛的重視。去年二月，他告訴我，目前他正在增訂此書的第五版，而且要補寫到一九八〇年的俄國。換句話說，當前的「伊朗危機」、「阿富汗危機」，都將寫入他的《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本問世二十年的教科書，其間竟然改寫五次，而每次都能提供最新的資料，這樣的敬業精神實在使東方學者感到汗顏。每當我想起，到現在我們仍在捧讀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國通史》，在字跡漫漶的翻印本中辨認中國的歷史，心裡便覺得挫折，疏懶，且不勝疲憊。

屈萊果先生對自由主義的信念，可謂牢固如磐石。有一次我曾問他：「是不是自由主義不適合俄國文化的傳統？不然，近代俄國的自由主義運動為何一再失敗？」對我這樣的問題，他似乎有點惱火。他說：「俄國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到現在就停止了，俄國人民依然還在

努力啊！」他堅毅的回答，使我感動。誠然，世人恆以成敗論英雄，對於歷史的評價，人們總是傾向於讚美勝利者。今天西方史家之所以過分高估列寧，基本原因也就在此。大多數的史家，酷嗜以列寧成功的結果，來推演他革命前的種種因素，其解釋往往倒果為因，而這正是屈萊果先生極力反對的。他認為，列寧之能夠奪權，「偶然」的因素大於「必然」的因素。他更認為，我們不能因為列寧攫取了政權，而完全抹殺革命前自由主義者的種種努力。今天，自由主義運動在俄國轉入地下，變成洶湧的伏流，其歷史背景，不能不追溯到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所播下的種子。

他也承認，近代的自由主義運動當然有它先天的困難。在一篇探討俄國自由主義的論文中，屈萊果先生指出，自由主義者的重要精神便是尊重別人的自由，他們不能以槍桿子強迫別人屈服，如果他們也學習專制獨裁者的高壓手段，就不成其為自由主義者了。然而，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型期，自由主義者便因為這種信念而吃虧，列寧及其他一黨專政者，藉著自由主義者的手無寸鐵的缺陷，節節逼進，或利用之，或打擊之，終使自由主義運動在革命的浪潮中湮滅。歷史事實既是如此，吾人何能論斷俄羅斯民族不適合採用自由主義？

他對俄國自由主義的研究，從五十年代初期便開始。一九五五年，他出版了一冊《列寧及其政敵》（*Lenin and His Rivals*），專門討論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革命者，與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關係與歧異。此後，有不少論文牽涉到俄國革命前的政治運動與思想發展，然而，他最重視者，乃是自由主義運動的成敗與得失。他對俄國自由主義的領導者之一米留可

夫 (Paul Milukov) 的評價相當高，並曾為米留可夫的一冊俄史研究的英譯本作序。

屈萊果先生，在思想上不僅是自由主義者；在行動上，也是道道地地的自由主義者。他在台大任教一年，與殷海光先生相遇，兩人一見如故，過從甚密，原因無他，他們都是無可救藥的自由主義者。殷海光先生去世後，他特地收養殷先生的女兒為義女，接她來美就讀。我來到華大以後，便不時間及屈萊果先生視這位義女如己出。他自己有一位女兒，年齡與殷女相若，他讓她們上同一個學校，帶她們同赴音樂會。許多人都深深慶幸，殷先生生前得到一位好友，死後又有一位義友。殷先生在天之靈，應無憾焉。

凡與屈萊果先生接近的人，都可感知他身上放射出來的精神，勤勞、禮貌、親切。華大歷史系的教授，對他都一致敬服，他擔任系主任，《南斯拉夫研究學報》總編輯（現已卸任），同時又要教課，卻常常有論文與書籍出版。這樣兢兢業業的學者，在東方固然難得，即使在西方學術界，也屬鳳毛麟角。然而，他又不是關在象牙塔的書呆子，他能夠批評美國的政策，介紹世界的政情，甚至談一談最近的音樂演奏會，在體育館裡又可看到他在運動。在那樣錯綜複雜的生活裡，他卻能把一切安排得那麼恰到好處。所以，在辦公室見到他時，他依然保持了那種不緩不急的溫雅風度。

我從屈萊果先生處，學習到一些俄國史的知識，但最值得我學習的是，他對人生的認真態度。這一年來，我利用撰寫論文的閒暇時間，重新捧讀他的《二十世紀俄國史》，才發覺自己從前讀此書時，是多麼草率。我已決定要把這本書翻譯出來，介紹給我的師友，不僅可

以瞭解近代俄國的因緣曲折，而且也可認識此書作者的靈魂。瞭解俄國史，從而鑑照我們自己的歷史。這使我想起屈萊果先生在書中的一段話：

「……因為人總是不能預測的，政治社會制度的前途也不是可以預見的。人既然必須要
在歷史發展所鋪成的舞台上表演，既然他們的期望不能完全決定在他們的成就，那麼，
在蘇俄圈外的人們，最好準備了解未來的一切，藉著對俄國過去的謹慎研究，機智地表
演下去。」

屈萊果先生奉勸生活在專制統治圈外的人，應該以俄國歷史的悲劇做為借鏡；而且，不要
把歷史看成是不連續的或切斷的。歷史仍在推演，勝利者不一定永遠勝利，失敗者終會有
復活的一天。我們應從歷史吸取慘痛的教訓，也應該去追問，為什麼自由主義會失敗？難道
東方民族就不應該享有自由主義嗎？在困惑的問題中間，屈萊果先生要我們機智地表演下
去。如何表演呢？必須熱情、樂觀、認真、勤勞，一如屈萊果先生。

——《聯合報》，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穿過歷史與文學的長廊 ——我的借書經驗

一個平凡的讀書人，在三十歲之前，是不可能讀多少書的，即使真的讀了許多書，也不可能完整地領會全部書籍的真意。學問的探索有賴長期累積的工夫，同時也要依賴思考的成熟，在壯年以前，恐怕還停留在尋找興趣、維持興趣的階段吧。大約從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的這段年齡，是求知欲最強烈的時期；但讀起書來也最容易盲目慌亂，「飢不擇食」也許是這個時期很恰當的寫照。然而，毛病也往往出在這裡，可能一天換一本書，持久一點也是一個星期換一本，幾乎都在封面與封底徘徊，最多讀一讀前言和後記，至於書中說了些什麼，很少仔細再看一眼。也許別人讀書不盡如此，不過，這十年來，我確實有點像上面所說的，讀書如走馬看花，盡成過眼煙雲。

我的年齡還不到三十，但接近壯年也是不久一、二年的事了。被時間驅趕到人生的另一個分水嶺，心底不覺悽愴，瞻前顧後，得失之心更加強烈。在我行將告別「青少年時期」之際，寫下這篇文章，似乎有點像是寫懺悔錄，心情複雜極了。我不敢說自己有什麼讀書經驗，但至少借書的經驗還是有的。在二十餘年的讀書生涯中，雖然對於買書不遺餘力，不過有許多重要的書籍，包括昂貴的、絕版的、被禁的，無不借自師友及海內外各大圖書館，如果沒有師友的幫助，恐怕我讀書不會那麼順利。當我最需要某本書的時候，那本書竟然適時地出現，不僅讓我驚喜、珍惜，而且也最使我難忘；同樣的，日夜夢寐的書籍，百求而不可得，便令我耿耿於懷，嘆息不已。現在回想起來，在連綿不斷的讀書過程中，自己不都是往返於喜悅和悵惘之間嗎？

在這篇文章裡，我只想寫出台灣一部分書籍的流通情形，並且比較一下海外的中文藏書，同時也記錄我這一代——戰後的一代——是在怎樣的情形下看書的。我遇到的書，可能是非常平凡的，我的讀書環境，也或許是平淡的；不過，我相信，我的際遇可以反映出這個時代的一些現象。因為，我相信，有不少和我一起長大的青年，分享了同樣的喜悅，分嘗了類似的惆悵。

從左營那個小鎮說起

左營，是我的家鄉，在行政上隸屬高雄市，且在我的感覺上，它卻是獨立的。從小學到高中時代，都是在那個小鎮度過的。記憶中的左營，和台灣其他的鄉鎮一樣，平靜、樸素、略帶西化。我讀的是舊城國民學校，規模不大，校舍蒼老，但因坐落於春秋閣的潭邊，環境

還相當幽雅。校內有一座孔子廟，每年高雄市的祭孔典禮都在那裡舉行，我的幼稚園時代就是在孔廟裡上課的。一九五三年我開始讀小學，到現在我仍記不起學校是不是有圖書館，縱使有的話，我想自己從未向學校借過書。

在小學生之間，漫畫書流傳很普遍，那是我最早的借書經驗。當時升學主義的風氣逐漸形成，除了白天上課之外，晚上還必須參加補習的課程，尤其上了五年級以後，那種單調枯燥的課堂滋味，與日俱增。回家後，不僅有家庭作業，同時也要背誦一些參考書籍，對於一位小學生來說，心理上的負擔是非常沉重的。自然而然，漫畫刊物就變成了課外的主要讀物，每當同學攜來一兩冊新書，整個教室便爭相傳閱，原因無他，稚小的心靈也有沉悶的時候，漫畫可以帶來許多新奇的幻想，開拓思考上的原野。那時我最著迷的，莫過於牛哥畫的《牛伯伯打游擊》，書中人物滑稽有趣，造形方面的誇張，給人印象深刻，書中的游擊情節更使小孩子為之激賞，所以即使看過了，仍一再要求同學帶來學校。學校嚴禁小學生帶漫畫書到教室，大人們稱它為小人書，常常不定期檢查書包。查獲時，或體罰，或沒收，但依舊不能禁止我們秘密傳閱。像《東方少年》、《良友》、《學友》，都是陪伴我們度過寂寞童年的重要刊物。到現在我仍覺得，如果沒有這些漫畫書籍，恐怕童年時代黯淡了許多。我不了解當時的大人為什麼會視漫畫如蛇蠍？小學時代的借書經驗，培養了我日後的讀書興趣，這也是為什麼我特別懷念童年時一起看漫畫的那群朋友。我正式向圖書館借書的經驗，則是進入初中以後的事了。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我的初中高中生活都是在省立左營中學。

這間中學原來是「高雄市立第一中學」，後來因教育廳實行「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的政策，才由市立改為省立的學校。從別人的眼光來看，這間學校並沒有特殊的地方，論升學率，不高；論校舍，也不宏偉，然而，在那裡卻開始了我讀書的摸索時期。初中的第一、二年，可以說依然是小學時代的延續，我仍舊沉迷在漫畫刊物裡，常常拿錢到書攤借連環畫來看，想來我是成熟相當晚的孩子。那時看的漫畫，不再是《西遊記》或《原野奇俠》之類的內容，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奇奇怪怪的爱情連環漫畫，有喜劇，有悲劇，看完後似懂非懂。到了初三那年，突然轉變了興趣，對小說有了莫名的好奇心。我清晰記得同學借我看的第一本小說，是畢珍著的《古樹下》，內容已經想不起來，大約是以抗日為主題的小說，第一次看小說便手不釋卷，完全投入小說的情節裡。第二本借來的小說是王藍的《藍與黑》，記得這書的扉頁有一段引言，同學之間很熱心的傳述著，現在看來那段話也許平淡而無聊，卻是促成我看此書的原因之一。總之，當時看小說主要是受同學的影響，而年齡的成長，似乎也漸漸知道要伸出自己的觸鬚，去探索，去尋找。

自從接觸了小說，才注意到學校的圖書館。左營中學的圖書館，是利用一間教室佈置而成的，侷促於校園的角落，和其他的教室一樣，室內非常陰暗。裡面的藏書恐怕沒有我現在的多，但是對一位初中學生來講，算得上龐大了。管理圖書的是位瘦削的山東人，已近中年，對學生很和善。我們與他談話，比向他借書的次數還多。因為，借書的手續很麻煩，借閱期限又相當短。由於沒有目錄可查，我們只能站在鐵窗外觀望，或者由同學告知有某本

書，才能決定向他借。每次借書，除了填表格外，還必須在學生證上面蓋章，然後他才從鐵窗的縫隙遞出來。往往在下課的十分鐘內，很難辦完借書的手續，中午休息時間又規定睡午覺，我們常常冒著違犯校規的危險跑去借書，所以在同學的感覺裡，借書實在是一種自找麻煩的事。後來，我便放棄在學校借書了。當時，我只覺得圖書館只是學校的行政部門之一，和學生沒有多大的關係，至少沒有像訓導處和學生那樣密切。

升入高中之後，我學會了看雜誌，才又回到圖書館走動。只有雜誌是開架式的，種類雖然不多，但是像《文星》、《人間世》、《幼獅文藝》等文化的刊物，都是在高中時代最初接觸的。不過，由於吸收知識的能力有限，在我個人的眼光裡，《文星》的水準很高，我只能零零散散地翻閱，所以當年的文化論戰，對我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想來我又落後時代一步了。一個即將邁入青年階段的學生，他所閱讀的書籍，往往可以決定他日後應走什麼路線；很不幸的是，我那時候都沒有遇到一本使我著迷的書籍，如果有的話，大概就是租閱武俠小說了。

在高中中的三年時光裡，我把許多寶貴的時間埋葬在武俠小說堆中。我每天騎車子到學校，放學時，總會路過一家書攤，是專門出租言情和武俠小說的。最初是懷著好奇心去租閱，不久便上了癮一般，一部一部帶回家看。現在想起來，實在看不出武俠小說有什麼價值，不過，那時並沒有考慮這些問題，這大概是年紀太輕的緣故，而環境的限制，也使我沉浸在這類無聊的小說裡。左營是一個偏僻的小鎮，沒有公立圖書館的設備，學校的藏書又不

能吸引我，我只好到街上的書攤去搜求了。

當然，在租武俠小說之餘，我也借了些文藝書籍來看，假如要追溯我對文學發生興趣的原因，也許就在這個時候開始的。像於梨華的《夢回青河》，朱西寧的《狼》，都是在無意中遇到的，那時候並不是純粹看他們的小說，其他如瓊瑤的《窗外》、《六個夢》，甚至金杏枝、禹其民的言情巨著，我都一一讀過。事實上，對一個鄉下青年而言，於梨華和瓊瑤是並列的，我分辨不出她們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等到真正瞭解他們之間的差異，那已是大學時代的事了，至少在高中時，我對書籍的選擇一直都是盲目的，缺乏一位導師來指引，自然而然使自己的興趣侷限在狹窄的圈子裡。

高三那年，我遇到了一位英文老師，姜林洙先生（以後我才知道他寫了一部《辛棄疾評傳》），中英文的造詣都很高，學問也相當扎實。我之所以提起他，是因為他使我的讀書興趣開了新的境界，他是第一位拿柏楊雜文給我看的。從我看第一本柏楊的書——《聖人集》之後，我才發現除了小說之外，還有如此引人的書。我不知道別人對柏楊的評價如何，就我個人來說，讀他的文章能夠體會到文字的力量，在輕鬆滑稽的語氣中暗藏嚴肅的精神，這都是我從前沒有讀過的。柏楊的書使我看到這個社會的真面目，也使我擴展讀書的視野。但是，那時已快接近大專聯考的日子，我沒有時間去搜集柏楊的書。全部讀完他的著作，則是在進入大學以後了。高中畢業後，便與姜先生失去聯絡，但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很感激他的。我感謝他的，不是讓我發現柏楊的書，而是讓我發現自己的興趣，讓我知道小說以外也

事實，要拿出證據，就必須多讀多看，這種訓練迫使我不得不常到圖書館找書。

在大學四年中，我從圖書館借到了不少可貴的書籍。我說的「可貴」，是指書籍給我的啓示和影響，因此在別人看來可能毫不足取，但對我個人卻具有很大的意義。大致上說，我借閱書籍往往隨著興趣而轉移。在大二那年，聽到同學大談文化的問題，一夜之間，自己也突然對文化史熱心起來。第二天到圖書館，就儘量把有關文化史方面的書目抄錄出來，準備從此開始埋首研究。像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柳詒徵的三冊《中國文化史》、陳登原的《中國文化史》上下冊，都在一股衝動之下借來的，不僅是一章一句地讀，而且還加眉批，完全是充滿了信心的姿態。其實，那不過是年輕人的一陣熱血而已，充其量滿足內心的一點虛榮，對於自己的學問並沒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讀文化史方面的書，接著對學術思想史也發生莫大的關心，錢穆的《國學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等等，也都是在那個時候一一借閱。這種借書的方法，絲毫沒有條理，所以吸收知識也自然就沒有系統。唯一的好處，也許只能增加書目的知識罷了，日後真正要寫論文時，又必須重新翻閱一次，花費不少心力。類似的這種衝動到現在仍會不定期地發生，每次總要借閱不少書籍，而讀每本書也僅是點到為止；大部分這種因心血來潮而讀的書，都是通論性、概論性的，只能使我了解一些皮毛，難窺其堂奧，更說不上專注深入了。真正要做研究工作的話，必須要從第一手原始資料著手。不過，那時才二十歲出頭，血氣方剛，還不懂如何謹慎仔細

在史學與文學之間

一九六五年我離開了左營，那年我十八歲，懷著恐懼而不成熟的心靈走向未知。和其他的年輕人一樣，我的志願是由聯招會決定的，我考進了輔大歷史系。在此之前，我總以為自己的個性是適合經商的；可是，讀了一年的歷史系之後，竟也覺得文史蘊藏著無窮的樂趣，從此我再也沒有後悔過讀歷史系，相反的，我為此倒頗有些自得。

輔仁大學是新設的教會學校，在師資和設備方面，自然沒有別的古老學校完整，可是在那裡的四年中，我可以感覺到輔大正努力地充實自己，企圖趕上其他的學校，這一點從圖書館的擴建便可看出來。輔大共有三座圖書館：一是屬於理學院的「自然科學圖書館」，一是法學院的「社會科學圖書館」，一是文學院的「人文學圖書館」。由於自己所學的是歷史，對於文學又具有探索的好奇，因此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利用文學院的圖書館。當時的「人文學圖書館」設在文學院大樓的三樓，面積相當狹小，大約僅可容納八十人至百人左右，每到考試期間，這座圖書館必定爆滿，人人如臨大敵，反而沒有讀書的氣氛。我欣賞的是，平時圖書館那種門可羅雀的情調，館內雖然只有兩三人造訪，但那種怡然自得的神態，使人體會到寧靜中的書香，在記憶裡，輔大圖書館確實是讓我最懷念的一個地方。我在歷史系所受的法訓練，用最簡單的話說，便是憑事實講話，或者如胡適先生說的：「拿出證據來！」要找

做學問，只不過是因為借書比讀書的興趣還來得大些。

藉著對各種書籍的強烈好奇心，自然而然也使借書的範圍漸漸擴大，才慢慢知道有所謂禁書和絕版書。我們這一代的讀書人，大多對禁書懷有神秘、渴望、畏懼等種種複雜的情緒，可能是由於時局變化的關係，到了我們這一個時代，禁書似乎特別多，這應該算是我們的一大不幸吧。我第一次借到顧頡剛的《漢代學術史略》時，我的同學很驚奇，他們都說這是一本禁書。既是禁書，一定很難看到，我們對於不易得到的書總是喜悅而珍惜的，所以帶回家後，便專心地捧讀這本禁書。讀完之後，我實在看不出此書有任何被禁的理由，後來才聽說是因作者陷於匪區的緣故。等我進入研究所以後，發現顧頡剛的這本書已在台北翻印，同時有兩家出版社在競賣，令我詫異不已。究竟是何時開禁的？不得而知。

自從知道圖書館藏有禁書，我便常常去翻閱館裡的目錄卡片，企圖找到更多稀罕的書籍。果然不久就發現譚丕模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綱》，費孝通的《皇權與紳權》，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等等，每次借到禁書，心裡總是很興奮，幾位熟悉的同學便輪流傳閱，金聖嘆說的那種「雪夜讀禁書」的境界，我們似乎可以領略一些。尤其是郭著的思想史一書，讓我們管窺到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流變，縱然只瞭解一些表面的史實，但已使我們這批狂熱的學生滿足了，所以這本書不斷在同學之間流傳，直到學期末才回到圖書館。這本書以後也有翻印本，改名為《近代中國思想史》，而且是精裝的，正續編合訂，我們自然很感謝出版商功德無量，不過，讀禁書的那種情調、那種神秘的感覺，便煙消雲散了。

禁書讀多了以後，我們也逐漸讀到一些公開的禁書了，譬如書名被改，或是作者的名字被改，這方面的書我們也有很大的興趣，像陳寅恪的書被改為「陳寅著」，費孝通以「費通」的名字出現，陳登原則成了「程登元」，這是作者名字被改的例子；又如徐浩的《二十五史論綱》變成《二十五史述要》，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改成《中國文學發達史》，這是書名被改的例子，類似此種改頭換面的書籍，可謂不勝枚舉。有的更乾脆以「本館編輯部」的姿態出現，這才真正是公開的秘密。有一年，馮友蘭的《新事論》也在「本館編輯部」的安排下問世，不久便遭到攻擊，此書才又收入禁林之列。我到圖書館借閱此書，結果空手而歸，但因心有不甘，我便一再向同學詢問，終於在朋友的朋友處借到，才算了卻一樁心願。

在那段時間，讀禁書不僅是要知道它的內容，而且也是一種虛榮心的表現。同學中看禁書最多的人，都是值得我們欽羨的，不論他是否全部看完某本禁書，即使他僅僅摸過書的封面，我們也是相當佩服的，所以讀禁書已經成爲一種榮耀，書的內容或好或壞，只要是禁書就足夠吸引人了。這種畸形的心理不能不說是時代風氣造成的，如果書沒有被禁，或許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既列入禁書，就變成了一樁秘密，在「窺私狂」的心理驕傲之下，必須千方百計得手，才算罷休。像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在沒有宣佈爲禁書之前，我大概不會熱心讀這本書，一旦禁止閱讀時，大家便奔走相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形成一陣熱潮，一股渴望。又如李敖的《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也是在我大二那年變成禁書的，這本書

《鶴林玉露》、張岱的《陶庵夢憶》、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都是在那段時間借來看的。從杜先生那裏我學習到讀書要專，研究要從第一手資料著手，從那時起，借書才有了一定的目標。雖然如此，我有時候還是喜歡亂看書，到處亂借，這主要和自己的性情有關，因為那時候我也耽溺於文學的書籍裡。

我讀的雖然是歷史系，但因為在文學院的關係，耳濡目染，很容易接觸到文學方面的書，並且傳統的「文史一家」的觀念，即使到今天仍然沒有去掉，學習歷史兼治文學當是順理成章的事；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的興趣過於廣泛，對文學的關心並不低於歷史，因此圖書館裡的文學書籍也是我借閱的對象。輔大的現代文學藏書並不多，事實上，這也是台灣一般圖書館的通病，或者更確切地說，台灣的各大專院校對現代文學大多懷有偏見，甚至鄙視它，這種態度自然影響了圖書館的購書方針。在輔大時，許多同學對圖書館不買現代文藝作品的事，甚以為病；後來我到台大，才發現那裏的圖書館也差不多，這個問題到現在我仍深深納罕著。不過，圖書館並非完全不買文藝書，像比較重要的書局如：中華書局、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等所出版的文藝作品，圖書館還是會購買的，可是這些書局出版的比例，與整個台灣文藝界的產量相較之下，則微乎其微了。我常常懷疑，如果圖書館不購藏當代的作品，則後世的研究者將去何處搜求呢？我覺得圖書館沒有收藏現代文學的書，就像一般中文系不開現代文學的課程一樣，都牽涉到一個「偏見」的問題。在中文系教授的眼光裡，必須是「古典」才算是書。什麼是「古典」呢？無疑的，凡是清朝以前的書，都可納入古典的

的序言（新夷說）發表在《文星》雜誌時，我們就預感此書不可能流傳出去，果然在我買到之前，便被有關單位沒收了，但因聽說有許多人還是買到了，我們也四處去打聽借閱，一睹為快。

整個大學四年中，除了讀正課之外，對禁書的搜求，不遺餘力。當然，環境的限制也是造成「禁書崇拜」的主因。在大三時，聽說圖書館藏有一套香港太平書局翻印的《古史辨》，我迫不及待跑去借閱，圖書管理員規定我必須坐在館內看，不准攜帶出去，他們下班時又立刻收回去；所以，《古史辨》第一冊顧頡剛的那篇長序，我花了一星期左右的時間在圖書館裏看完，正因為限制重重，我更覺得非看完它不可。等我大學畢業後一年，台北的書商又翻印了此書，到處都是《古史辨》，包括兩三種版本，但這時我對此書的熱心反而淡下來了。我也覺得這種讀書的動機是不正常的，但我必須承認，這種反常的心理促使我讀了許多額外的書籍。

我在大學時代讀書一直游移不定，借書的範圍也跟著飄浮。直到大三下學期，我選過杜維運先生的「史學方法」一課以後，我才稍微改變自己借書的方法，杜先生是一位謙虛的學者，他在中國史學方面的研究貢獻，頗受重視，他撰寫的《清乾嘉時代的史學與史學家》與《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兩部書，對我們有很多的啓示。得到杜先生的指導之後，我才固定了幾個借書的範圍，專門注意史學史的專書和論文，所以利用圖書館的機會就越來越多。同時，我也開始借閱一些筆記小說或古人的文集來看，像司馬光的《涑水紀聞》、羅大經的

過朋友的關係借來，常常一冊詩集到達手中時，已經過了四、五個人的手，得之不易，彌覺珍貴。如果拿到的是一冊五〇年代初期的絕版詩集，更是封底封面反覆摩挲，端詳許久，如紀弦的《摘星的少年》、余光中的《舟子的悲歌》，詩的內容也許比較樸素平淡，但體會到他們早期那種浪漫的精神，總是讓我低迴不已。新詩之可貴，在於詩人運用誠實的白話文，表達深遠的現代人的生活，在基本上與古典詩人是並行不悖的；奈何六〇年代以後出現的新詩，竟走上淒厲曲折的歧路，白話文反成現代的「新文言」，前人的努力毀於一旦，能不令人浩嘆？在大學時代借閱詩集，頗受非議。詩人的錯誤，讀者也為他們分擔，想來實在是啼笑皆非的。這也是我日後從事新詩批評的主因，為的是要判別新詩龍蛇雜處的混亂局面，當然那種野心也不過是一項企圖罷了。我相信，風氣之回轉端賴詩人的自覺。從大一看第一冊詩集開始，到現在恰好整整十年，這一段路程中，看盡詩壇的冷暖悲歡，但思量起來，畢竟喜悅還是多於痛苦的。每談起詩，便憶及大學時代的熱情與爽朗，更想起那些借詩集給我的朋友，有不少友誼是因為借閱詩集而建立起來的，像林煥彰、辛牧、施善繼、蕭蕭、景翔等朋友，都因此而認識的。更可貴的是，我們這群朋友日後又創辦了「龍族詩社」，人生的際遇是多麼奇妙，多麼不容解釋。

一九六九年我離開輔大，那裡的人和事都值得我懷念，而在那裡所看過借過的書，更像一個個烙印深嵌在我的記憶中。在此特別一提的，我在輔大文學院圖書館借書時，常受到一位館員的幫忙，同學都稱呼她為「梁阿姨」，到現在仍舊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對她的感激

範圍內，至多至多，也僅延伸到五四運動之前為止，再跨過一步便是洪水猛獸了，這樣的分期當然既精確又方便，但他們的偏見也跟著累積下來了。

《文星》叢刊是我們大學時最寵愛的書籍之一，幸好圖書館沒有遺漏掉這一叢刊。我認識現代文學的一些基本觀念，大多是透過《文星》叢刊得來的，當時很多的青年作家都以在文星書店出書為榮，他們努力介紹新鮮的觀念給當時的大學生，我們的談話內容也喜歡以他們的書為主題。那時候，我們幾位熟悉的朋友，常常比賽看這套叢刊，只要是圖書館的藏書，我們都借出來看，相互討論，像余光中、周夢蝶的詩，於梨華、聶華苓的小說，何凡、錢歌川、葉珊的散文，梁實秋、黎烈文的文學批評，都收入了這套叢刊裡，他們提倡的文學觀念新穎而不偏激，誠懇且富於說服力，我們那一時代的年輕人幾乎很少沒有讀過他們的作品，至少那時候我們私底下承認，《文星》叢刊確實是集合了當時聰明的頭腦與上乘的文筆，在提倡讀書風氣及出版事業方面，《文星》佔有重要的地位。猶記得我們那群朋友，或站在圖書館外的長廊，或坐在文學院樓前的草坪，圍繞著相同的主题，品頭論足，也許說的都是些隔靴搔癢、不著邊際的話，但我們覺得生活得很健康，很充實。

大三那年，我在學校組成了一個「水晶詩社」以後，對新詩的著迷更深一層，也因而開始注意搜求詩集。我到圖書館查閱，卻發覺詩集的收藏稀少得可憐，當時非常驚奇。原來新詩的讀者不多，由於詩本身的晦澀難懂，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新詩與「古典」詩的差距太大了，既沒有「古典」的資格，自然就被排斥於圖書館的門外了。因此當時借閱詩集，都是透

前身是所謂的「台北帝國大學」，數十年累積下來，藏書不可謂之不豐，果能進去一探寶穴，相信可以發現不少難得一見的好書。很多台大同學都懷疑館內的目錄卡不完整，就我們所知，台大還有所謂的「特藏室」，那裡面的書似不可能公開在目錄卡片上。謎終歸是謎，直到我離開台大，我對這個圖書館始終保持著又恨又愛的矛盾心理。

比較起來，我是相當偏愛研究圖書館的，這是在我進台大的前一年建成的，裡面所有的書籍全面對學生開放，這裡的藏書雖然沒有總圖書館完備。大致上，文學院學生所需要的原手資料及期刊雜誌還算整齊。我在台大三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都在那裡度過，有時找不到書，固然有點悵惘，但大部分的書還是足夠用的。這座圖書館分成兩部分，一是閱覽室，一是藏書室。閱覽室放置的書籍以大部頭的叢書為主，如：四庫全書珍本、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國學基本叢書、叢書集成簡編，各種版本的二十四史，書目、引得等工具書，換言之，比較普遍的重要書籍在閱覽室就可看到。藏書室則收藏比較專門的書籍和期刊，共分五樓，一樓是一般性的分類書，大多是近人的著作，有一半則是尚未整理的日文藏書（現在或已整理完畢）；二樓則是叢書，如正誼堂全書、聚珍版叢書、學海類編、小萬卷樓叢書、守山閣叢書、知不足齋叢書、學津討原、史學叢書等等，適合文史系的研究；三樓是日文藏書，大多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四樓是中文期刊雜誌，大部分重要的論文都可在這裡找到，五樓是中文報紙的收藏，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各家報紙，收集非常完整。各樓藏書的次序，記憶或有錯誤，大致如此。二樓和四樓的藏書是我比較喜歡的，因抄錄卡片大多需要這

則是無可言喻的。畢業那年，文學院圖書館擴建成一龐大的高樓，可惜我已沒有機會利用它，後來的學弟学妹確實比我們幸福多了。

書到用時方恨少

一九七〇年夏天服完兵役，我立刻又進入台大歷史研究所，在這裡的借書經驗比以前又豐富了許多。台大有三座比較大的圖書館，一是「總圖書館」，專供全校師生運用的，是最古老的一座建築物；一是「研究圖書館」，主要是為研究生而設立的，不過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也可利用；一是「文學院聯合圖書館」，是由原來文學院各系的小圖書館組合而成的，善本書收藏頗豐。看過這三座圖書館，才使我開了眼界，輔大的藏書自然無法望其項背。

凡是在台大讀過書的同學，他們在總圖書館借書的經驗大多是不愉快的。總圖書館的藏書庫是終年不開放的，像一個巨大的謎，大家都不知道裡面藏有多少書。每次借書須先填好單子交給管理員，然後就要等待半小時，這三十分鐘可以坐在館內讀自己的書，時間一到必須趕快去領取，否則又會收回去。所以，人人總是擠在櫃台前，像等待開獎一般，如果借到書的話，當然驚喜萬狀；比較不幸的，一張借書單又會退回來，沒有任何答覆，我每次到總圖書館，很少是愉快的，以後就放棄利用它了。書庫之所以關閉的原因，我想是因為學生太多的緣故，書庫容納不下；另一個原因，我相信是學生的道德心不夠，偷書割書的事情屢有所聞，如果把書庫開放，無異引狼入室。我一直很遺憾總圖書館的書庫沒有開放，因台大的

書，這點也反映了他對胡適先生的尊敬與懷念。

撰寫畢業論文的期間，更覺得自己從前吸收的學問太粗疏了，往往爲了解決一個問題，或者尋找一件史實，需要參閱數種史料，同時也需注意近人的研究成果，爲此我不僅往返於文學院與圖書館之間，而且也常常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紀念圖書館」找資料。傅斯年圖書館的閱覽室放置了大量的期刊，都是戰前在中國出版的重要學術雜誌，如《東方雜誌》、《清華學報》、《燕京學報》、《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漢學》、《學衡》等等，後來這些學報已大部分在台北一一影印。但是在我那個時候，卻必須坐公共汽車，花四五十分鐘的時間跑到南港參閱。這個圖書館不方便的地方是，在中午時間，管理員把所有的訪客讀者請出去，凡是在此讀書，中途都必須攔下來，等待下午繼續開放。另一個不方便，是借閱陷匪的學人著作，必須由學校開出一張公函，經由史語所所長的批准才能借出，我不明白要加上這層限制的理由何在？如果那些書籍真的是洪水猛獸，則大可不必編入目錄卡上，更下必購買此類書籍，同樣是由人民納稅購買的書，爲什麼學者可以閱讀，學生就不可以呢？「把持資料，謂之權威」，這是中研院一向爲人詬病的方面，那也是我親自領教過的借書經驗。這種封建的官僚氣習，並不是中研院圖書館才有，台大的「特藏室」似乎也具備了同樣的特徵。借書不方便是我們學術界進步緩慢的主因，我常常奢想著，有一天台灣所有的圖書館都能全面開放，人人各取所需，順利進行各自的研究，我們也就不必擔心漢學研究中心跑到日本、歐美去了。前些日子，還有人在雜誌上討論台灣能否成爲世界漢學中心的

裡的書。進去藏書室已並非都是爲了研究，有時也是爲了興趣，尤其是早期的雜誌，常使我有意外的收穫。像《自由中國》、《文學雜誌》、《民主評論》、《文史雜誌》、《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大陸雜誌》等等，都是我所偏愛的。不過，藏書室的一個缺點是，自己的書不能帶進去，裡面的書不能帶出來，有時要相互對照時，必須來回奔波，很不方便，但這種情形很少發生。因爲裡面的書帶不出來，有些研究生會經用刀片割下書中他所需的部分，使其他同學怨聲載道。讀者道德心不高，始終是台灣一般圖書館設備的一大致命傷，因爲有偷書的事件，圖書館就必須防範，防範愈密，借書愈難，偷書就愈多，而造成了惡性循環。

研究所三年級時，我因撰寫關於宋代史學的畢業論文，借用了歷史系的「第三研究室」，即「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這間研究室是姚從吾先生生前做學問的房間，他就在這研究室過世的，裡面藏了大量遼金元史的史料，他去世後，便由他的學生陶晉生先生負責管理。陶先生是我的指導教授，允許我使用這間研究室。他交給我研究室的鑰匙時，我心裡既興奮又感激，我的論文之所以順利完成，陶先生的指導固是主因，不過，他讓我利用研究室，更使我可以專心進行。有好幾次我都讀到深夜才回家，文學院鬧鬼是有名的，據說傅樂成先生還親眼看過（是幻覺或吹牛，姑妄聽之）。我心裡有鬼，卻從未碰過。現在想起來，那段時間是寧靜而愉快的，主要是我需要的書籍，在那裡都可讀到。翻閱書籍時，常可發現姚從吾先生加上去的眉批、註解，幾乎每本書他都碰過，足見他生前之用工。在那裡也看到姚先生的一冊剪貼本，把有關胡適先生的新聞，包括生前事蹟和去世消息，都輯成一本

想不會有人熱心剪貼下來的，經過多方打聽之後，結果在周夢蝶先生處借到《藍星週刊》的前半部，又在羅行先生處借到下半部。我第一次把前後兩部放在一起時，心裡不禁感嘆，看著已經變黃脫落的紙張，及脆弱不堪的裝訂釘痕，深深體會到台灣從事新詩的工作者實在是寂寞的。無可否認的，台灣的新詩仍舊在成長的階段，距離成熟的標準可能還要經過長時間的考驗，但是什麼才算是成熟呢？是不是要經過學者的研究，變成一部學術著作之後，才承認它是成熟的呢？姜貴的小說如果沒有經過胡適的推薦，今天的圖書館恐怕不可能藏有他的書呢。說不定也會有更諷刺的事發生，某圖書館可能藏有一部水晶的《張愛玲的小說藝術》，但館內卻沒有一冊張愛玲本人的作品，因前者是學術著作，後者則夠不上「古典」。事實上，一個健康的圖書館應是各類書籍兼容並蓄的，不能因為一種文學形成還未成熟，就完全不予重視，這種「以成敗論英雄」的藏書標準，未免太趨於功利了吧。一種書籍的出現，正反映一個時代的現象，而圖書館則是一個時代的檔案室，以此來看，詩集所具的意義，則不容抹殺。

我因注意台灣的新詩史，覺得要建立這段史實，勢必要追溯到三〇年代的詩壇，甚至要推到五四時期的發展背景，因此我也有心要搜集從前在中國出版的詩集。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來說，「三〇年代文學」不過是一個歷史名詞罷了，我們從未親眼看到當時的作品，最多只是從長一輩的口口，或是從別人的文學批評裡，略知概況之一二。我們確實很渴望讀到，那種長期亢奮的渴望逐漸發展成一種「崇拜」，有些朋友都以偷看了此類的禁書而沾沾

必備條件，我認為討論我們藏有多少書籍多少資料，都是無益的，只要圖書館絕對公開，同時思想言論絕對公開，漢學中心自然就會搬到台北來。

在研究歷史的同時，我也在新詩批評的領域開始探索。最初我很有野心要建立台灣新詩史，等到我真正搜集資料時，竟發覺詩集的散佚情形已非常嚴重。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只有二十餘年的光陰，台灣的生活環境尚稱安定，書籍保存應該相當完整，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我所能看到的詩集大致都在十年內出版的，十年之前的則很難求得，至於二十年前的，幾可視為珍本了。企圖在一般圖書館借到詩集，等於是緣木求魚，在我出國前的兩年中，花了不少時間尋找詩集，大多是去拜訪私人的藏書。記得余光中先生送給我二十年前出版的《藍色的羽毛》時，他特地在扉頁題上「海內孤本贈芳明」，視為「孤本」固然有些誇張，但這也說明這個時代的詩集之難存嗎？如果要在公立圖書館找到一套《紀弦全集》或《余光中全集》，恐怕是一個奢望吧。《徐志摩全集》的誕生，還是在徐志摩逝世三十餘年之後，經過有心人的多方搜求，才編輯而成，則台灣的詩人大概要等上一段時間，變成「古典」之後，才有資格進入圖書館吧。去年，有人整理台灣新詩集的書目，很少利用過公立的圖書館，完全是依賴私人藏書編輯的，因此，不可能蒐羅得完整。今年又聽說林煥彰先生正編輯新詩的書目，相信他也不可能從圖書館搜集到完整的資料吧。

我個人在搜集新詩史料方面，可以說全力以赴，我對公立的圖書館已經絕望了，大部分都是從私人藏書借到的。例如以前在《公論報》發表的《藍星週刊》，共發行兩百餘期，我

自喜，無疑的，那種崇拜實近乎盲目。在台灣，對三〇年代新詩的介紹，當以痲弦主編的《新詩史料拾綴》較具規模，但因環境的種種限制，他不可能做得很完整徹底。我第一次讀到三十年代詩人的詩集，是台灣翻印何其芳的《預言、秋天、狂風沙》，這本書不久就被禁了，我之所以能看到，也是從朋友處借到的，大家互相傳抄。後來陸陸續續讀到臧克家的《烙印》、《運河》，李廣田、卞之琳、何其芳合著的《漢園集》，都是在我離開台灣前所能讀到的。記得胡耀恆、朱西寧兩位先生分別在《中外文學》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為文，建議開放三十年代的文學。我覺得他們的建議是誠懇而得體的，且不討論開放的積極意義，從消極方面來看，三十年代文學開放以後，可以完全消弭青年盲目崇拜的變態心理，因為當時的文學並非都是美好的，時下的青年隨便偷看到一本就稱讚一本，結果他們的看法與官方出版的三〇年代文藝批判之類的書籍，背道而馳。與其蒙蔽他們，不如讓他們睜開眼睛來辨認，愈壓抑他們，除了增加他們的狂熱之外，收不到任何的效果。

飄泊書籍

一九七三年我從台大畢業，回到母校輔大執教一年，雖然回去的身分不同，但許多舊夢似乎又重溫了一次。我曾到文學院圖書館去借閱從前看過的那些「禁書」，結果有不少書已經被偷走了，像譚丕模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綱》，已不見蹤影，當時不禁怔然，總覺得有一部分舊夢被偷走似的。風氣如此，亦無可奈何。

第二年夏天，我因申請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歷史系，便懷著憂傷的心情離開了台灣。華大建校於一八六一年，距今已一個世紀而有餘，比起美國東部的大學，華大是年輕了許多，不過在藏書方面並不落後。來此後，我對圖書館的觀念才漸漸改變過來。華大有兩座大圖書館，一是蘇薩洛圖書館（Suzzalo Library），主要是研究生利用的，一般大學部的學生也可利用，不過借書的期限較短，另一個是大學部圖書館（Undergraduate Library）開放給全校師生，但主要對象還是大學生。蘇薩洛圖書館的藏書最豐，全部是開架式的，書庫就等於是閱覽室，讀書環境相當良好，書香四溢，令人駐足。研究生借書以一個學期為限，但可以請求延長，除非有人登記要看（place a hold），否則，此書能夠長期由個人保管，借書的數量沒有限制，可能的話，儘可請一輛卡車來載書。大學部圖書館的藏書，借期甚短，以兩個星期為限，必要時也可延長，有一部分書是學生課堂上的指定教科書，謂之 reserve book，借期是四小時到三天不等。華大除了這兩大圖書館，還包括十六個小圖書館，或設在醫學院，或設在理學院，或分設於各系，行政上直屬於總圖書館，我利用次數最多的便是「遠東圖書館」（Far Eastern Library）。

我第一次到遠東圖書館時，沒有料想到它有那麼多的東方藏書。二十萬冊的圖書中，有十三餘萬冊是中文書籍，據說在美國各大學所藏的遠東圖書中，還是居第十位的，則美國的中文書籍之豐富亦可思過半矣。此圖書館的正、副館長都是中國人，盧國邦先生與譚煥廷先生，對學生相當熱心，絲毫沒有官僚架子，雖然館中還有十餘位的館員與雇員，他們仍不時

親自為學生服務，與台灣的圖書館比較起來，實有天壤之別。我覺得台灣的圖書館應稱為「藏書館」，因為大多數的圖書館只是為了收藏書籍，並沒有考慮到讓讀者學生如何運用，館員只注意有沒有保持原來書籍的數量，忽視了為讀者服務的次數。這裡正好相反，他們考慮的是讓學生在最方便的情況下利用圖書，考慮一本新到的書籍如何能以最快的方法到達學生手中，學生愈覺得書容易借到，偷竊之心則愈減少，因為他們隨時可以看到書籍，不必偷竊就可長期讓個人使用。無形中，也提高了學生的道德心。圖書館雖全面開放，而且很少檢查學生的書袋，但圖書遺失率卻非常低。

圖書館裡的書籍採購組主任，是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吳燕美女士，她是台灣大甲人，曾在加州大學負責管理東方圖書館；來此則已有五年，她專門負責向台灣、香港、日本訂購書籍。我來華大以後，受她的幫助最多。據她說，每年購買中文書籍的經費，平均約在美金二萬元左右，書籍五分之三強由台灣書商供給，香港書商則供給香港、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出版的書刊，少數中文書籍及研究中國的日文專書購自日本。遠東圖書館與華大其他圖書館一樣，接受教授和研究生的建議，隨時可以訂購自己所需的圖書。我需要的每本書，如果在館內找不到，就立刻向她提議購買，大約在一個半月左右就可到達手中，用書之方便如此。在台灣的圖書館中，似乎只有台大研究生圖書館接受讀者的建議，不過買書的速度沒有那麼快，此或許受經費的限制，但接受讀者建議訂購的態度，則是值得稱讚的。

如果遇到絕版書，不可能自國外訂購時，還有一種「館際借書制度」(Interlibrary

Loan)可以補救。我因注意收集中國史學史方面的專書，對館內這方面的書目比較關心，有些已經絕版，吳燕美女士認為我可以從別的圖書館借閱，手續非常簡單，只要填兩張卡片，把書名寫上，大約三、四週內就可以借到，像王玉璋的《中國史學史概論》，借自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金井之忠的《唐代之史學思想》，借自芝加哥大學的遠東圖書館，借閱期限從兩週到一個月。不僅書籍如此，自己需要的論文也可從別的大學影印過來，手續和借閱書籍相同。

由於館際借書制度非常健全，所以無論在美國任何一個地方，都可利用到全國的書籍。聽起來近乎神話，如果沒有親自經驗到，簡直認為不可思議。透過這個制度，我已借了無數的圖書，像三十年代的新詩大多是借自別的圖書館，如戴望舒的《我底記憶》、《望舒詩稿》、《災難的歲月》、《望舒草》；朱湘的《草莽集》、《海外寄霓君》；臧克家、艾青、田間的詩集等等，他們的全部作品都一一過目。遠東圖書館有意搜集五四以來的新詩集，他們不僅編書目，而且也拚命到處求購。他們的野心是，有一天學者要研究中國的新詩，勢必要集中到這個圖書館來。他們認為，只要是一本書，不論它的好壞，他們都當作一本書來處理。只要一本書讓讀者看了，那麼這本書就發揮它的功用了，這種觀念確實值得我們學習。當然，在這種觀念的背後，必須有龐大的經費來支持，在這方面台灣的圖書館限制很大，但這樣的觀念不妨做我們的借鏡。

大致說來，我到華大以後，在用書方面從未發生過困擾，當初到達這裡時，我很擔心會

從小學讀書以來，便日夜夢想可以碰到一座隨心所欲的圖書館。這樣的夢做了二十年，實現的時候卻在距離故鄉千里以外的異邦。不過，我還是懷念在台灣的一種借書經驗，特別是大學時代，爲了尋求一本書，費了不少苦心，一旦得手時，那種興奮之情無以復加，而偷看禁書的那種氣氛，如今只能在記憶中揣摩。我相信，我們那時代有我們自己的情趣，今天的大學生也許在重演我們的鏡頭也未可知。我的心情是矛盾的，希望那種情調一代一代延續下去，但更希望，有一天我的下一代讀書不必那麼辛苦，他們可以得到一座，不僅僅是一座，完全開架式的圖書館。

——《書評書目》，第三十二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和台灣的讀書界隔絕起來，特別是新書的出版，總以爲要等一兩年以後才能看到。沒想到他們訂購新書相當迅捷，凡是重要的新書，兩三個月內便到達此地。即使我身在台灣，讀新書也似乎不可能那麼快，一方面是自己無力購買，一方面是圖書館處理新書的效率不高，相形之下，我和台灣出版界反而比以前密切多了。這裡的圖書館員也瞭解，他們不可能完整地購買台灣全部出版的書籍，在這方面他們很謙虛，常常向台灣來的留學生請教，如果有值得購買而遺漏的，可以隨時向他們建議，做爲以後購買方針的參考。就我所知，此館定期購買的叢書有：人人文庫、三民文庫、新潮叢書、書評書目叢書、萬卷文庫、遠景叢刊、純文學叢書、文史叢書，幾乎是每出版一本就購藏一本。至於重要的書局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學生書局、文海出版社、廣文書局等國學叢書，及學人的著作專書，都是他們訂購的對象。他們大多是主動去尋找新書，而不是被動等待書商寄書目來。

每次看到台灣有新書寄來，心裡固然興奮，也多少覺得哀傷。這些漂泊的書籍，和留學生的心境一般，都是寂寞的。有許多書在這裡封塵許久，往往借到一本書，有一、二十年都沒有碰過；這樣的圖書館利用起來，頗像私人的藏書。但每想及它們迢迢千里渡海過來，就只爲了被冷漠地放在書架上，不能不使人喟嘆。如果讓這座圖書館搬到台灣去，全面開放給台灣的學生，借書的制度完全和這裡一樣方便，真不知要受惠多少學生。真正需要讀書的人，不容易看到自己需要的書，而真正能購買得起書的人，卻用不完那麼多書，上帝未免太惡作劇了。

路過波士頓 ——給初識的張良澤

沿著海岸線，我和里法從波士頓乘火車南下紐約。大西洋就在我的左側，天空漸漸從灰暗變成漆黑。里法說：「到紐約還需五個小時。」但是，我卻一直懷念著波士頓。望著黑暗中的新英格蘭區，我竟錯覺自己處在台灣東部的海岸。離鄉太久的人，對於時空總是如此混亂吧。

還沒有到波士頓之前，曾經聽人說過，新英格蘭區的文化是相當傲慢的。這次唐突來此叩訪，卻讓我對這個美洲早期的殖民地文化有了新的認識。市中心古老的建築，陳舊的電車，長了青苔的博物館，竟然展示另一種歷史的魅力，我不知道應如何來描述我內心的喜歡。

不過，波士頓讓我懷念的，當不止於這些。告別了波士頓，我才知道自己的停留過於短暫，才知道一次初識的會面過於匆匆。

我們繞了半個地球，卻選擇在北美的東岸見面，時空的安排似乎是大複雜了，複雜得一如我撰寫此文時的心情。

在大學時代，曾經聽過一首叫做〈麻薩諸塞州〉的鄉村歌曲。那是，我初次聽到麻州這個名字，記得歌曲的最後一句說：「麻州是我曾經見過的一個地方。」沒想到，十餘年後我已來到這個遙遠的地方。

那晚坐在主人的家裡，望著侃侃而談的你，我激動地想念我們的土地，也激動地想念我的大學時代。我那時的心情，恐怕你無法理解。從前我以遙遠來測量麻州，十餘年後，我竟身在麻州以遙遠來感覺我的故鄉，生命的曲折變化原是難以逆料的。

你問我離鄉多久了？我說快九年了。這樣簡單的一問一答，觸到我內心的痛處。長久以來，我一直不敢計算離鄉的日子。我總覺得，離開自己的土地太久，就好像在故鄉死去了一般。如今在這個陌生的國度，回望自己的從前，彷彿是在憑弔自己的前生。這並不是諷刺，而是我真實的感覺。窗外北美的七月，夜裡寧靜的樹影，大概也會為我這個異鄉人感嘆吧。那晚我們飲著女主人沏好的熱茶，重溫了故鄉的許多舊事。在言談中，你自然也能體會我風塵的心情。畢竟，你也是離鄉背井的人。

我們這樣初次的見面，驚喜多於詫異。從前捧讀你編過的文學書籍，印象中以為你有健壯的肌膚或有粗獷的體格，但是這次初識，才發現你是如此單薄，和我的想像完全不成比例。我知道，這十年來，你把全部生命都投擲於台灣文學史料的整理。

在過去，我們要閱讀台灣先人的文學作品，是相當困難的。如今，許多重要的作品，我們都能夠俯拾可得，你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僅此一點，台灣的子弟都應向你感激了。讀那些編輯完善的文學史料，我仍可感知你灼熱的生命力。透過了你，我們竟能和我們先人的心靈交通，這能不讓我們感謝嗎？

離開台灣以後，我才開始認識我所賴以生存的土地。請別訕笑，我確實是離開了台灣，才肯定自己是屬於台灣。在故紙堆中，在塵封的書籍裡，我一頁一頁去辨認我們先人的容貌。我慢慢瞭解，什麼叫做歪曲了的島嶼，什麼叫做亞細亞的孤兒，什麼叫做被出賣的子民。我可以坦白向你說，我曾爲了我們的歷史啜泣過，也痛哭過。

和你見面時，我剛完成一篇有關台灣抗日運動的長文。我的認識與成長是相當緩慢的，只有透過一些勞作，即使是粗糙的，我才能對自己的歷史有所把握。連雅堂的父親曾經說過：「汝爲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歷史。」這句話大約是在一百年前說的，但是對於生在一個世紀以後的我，仍然具有強烈的震撼和無盡的啓示。

在那次長談的夜晚，你說你正在整理有關台灣的一切書籍的目錄。我深信，以你的信心和毅力一定可以得到。因爲我知道，你決定做這件事時，並非只依賴你的毅力而已，同時也要依賴執著的愛。

熱愛我們的土地，有許多表現的形式，而你卻選擇了這種艱苦的方式——讓流失的，重新匯集起來；讓被遺忘的，又再度復活。這樣的工作，大概只有以愛才能夠形容的了。

這些年來，我已遇見許多這樣充滿熱愛的人。那天我和里法乘車南下時，他也談起自己正在撰寫有關王白淵生平的文章。他所寫的《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你當然是讀過了。我常想，其實里法可以好好在紐約賣他的版畫，生活也不致這麼艱苦。但是，他卻要整理台灣的歷史。這一切只能以愛來解釋了。

我們雖是初次見面，感覺中卻好像是舊友重逢。那次的長談，我仍嫌太短促了，到現在我只能責怪波士頓的夏夜過得太快了。

我們都是路過波士頓，和你告別時，有許多事情值得我再思量。其實，在陌生的土地上，我們永遠都是過客。在火車上，里法說：「到紐約需要五個小時。」他拼命抽菸，我凝望窗外的夜色。我不知道下次見面會在何時何地，不過，我只想把我們的初識記錄下來。

——《自立晚報》，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忽然谷

我到忽然谷的時候，正是初秋。但是，我並沒有想到忽然谷的秋天會來得更早；我驅車前去叩訪時，整個山谷以一片熱情的紅葉迎接我。這是我初次的造訪，也是最後一次。

忽然谷 (Sudden Valley) 位在西雅圖的北邊山中，在地圖上找不到。有時，我真懷疑忽然谷這個名字是某位詩人取的，否則誰會想出這樣突兀而動人的字眼，而且又非常貼切這座山谷的性格？

山谷異常寧靜，靜得使人產生錯愕的感覺。林中那條喧嘩的溪水，反而把山谷洗得更為安靜。那是九月的黃昏，回望朝西的谷口，紅得令人心痛的落日，正沉沉俯望拉長的山影與樹影。天空的艷紅，似乎不是來自落日餘暉，我總覺得那是楓葉顏色的投射。

說到紅葉，簡直令我發狂。在北美的植物中，我獨鍾愛激情的楓樹；我始終堅持認為，楓樹是一種敢愛敢恨的植物。這些年來，在風塵奔波的旅程中，看遍了櫻樹、松樹與橡樹，

我只信仰楓樹，而楓葉是我感情唯一的認同。

若是在盛夏，楓樹充滿了柔情。只有葉子知道，應該為溫暖的空氣帶來一些涼意；而楓葉青色的葉脈，總是伸出情人一般的小手，彷彿期待著輕輕一握。我不知道忽然谷的夏天會是怎樣的景況？我寧可相信，滿山的青楓一定是在微風中低唱。柔情的楓樹是不可能聒噪不安的，我相信。

但是，我還是慶幸自己選擇在秋天來拜訪。這時是九月，風已經轉涼，楓樹的熱情只有在這種時刻表現得奔放，毫無遮攔。從谷口到谷底，楓葉一路紅下去。只有楓葉，才能以各種形式來表現強弱不同的紅；看過了楓葉，我才知道紅色竟然也具備了這麼多的顏色；淡紅、暗紅、深紅、粉紅、殘紅……，有的看來是如此淒美，甚至美得一點也不後悔。

我來忽然谷，並不是為了看楓、聽楓、拾楓。其實我是來探訪那條沒有名字的淺溪，我的朋友說，這是鮭魚繁殖的季節，看到鮭魚逆流而上的回歸，就可感悟到大自然的生命力有多堅韌。

夕陽殘照的溪流，匆匆在忽然谷的谷口形成一股急湍，這個地方最適合觀魚。在這個曾經是印第安人的土地上，鮭魚充滿了許多神話。但鮭魚並不是神，牠們世世代代都在求生。

這是一條亂石纍纍的小溪，秋來後，溪水顯得更少，溪底的小石子清楚可數。然而，這竟是鮭魚回歸的航道。據說，鮭魚從那條河水出海，日後回歸繁殖時，又循原來出生的河水逆流而上。牠們憑什麼記憶尋找最初的發源地呢？到現在，仍是一個神秘的謎。

我驚異地看到滿溪都是肥大的鮭魚，真不知應該用什麼文字來形容這種悲壯的場面？牠們都是攜帶沉重的魚卵，從茫茫的大海回到河中，然後沿著崎嶇的河床，逆著急速的流水洄游。有幾處溪水過淺，鮭魚的肚子貼著河底的石子，魚鱗有一半以上露出水面，牠們仍艱苦往上爬游。有些魚已是傷痕累累，鱗片脫落不少，但牠們仍堅持游上來，速度雖然緩慢，卻不容河水將牠們沖退。

我實在感動於牠們的勇敢，這大概是我所看到求生意志最為堅強的生物。在急湍處，鮭魚不再是以游泳的方式前進，而是以跳躍越過亂石，否則永遠便不能再上去了。成群結隊的鮭魚，似乎有默契似的，一排排並列，好像在等待各自跳躍的時機。

溪水沒有一刻是緩慢下來的，急急的水流沖刷著石頭，也沖刷逆流中的魚群。驟然，一陣銀白的影子自溪底躍起，魚鰭和魚尾拍打幾乎垂直下降的溪水，在空氣中還造成回響；不旋踵，一尾粗壯的鮭魚已經躍到上流了。那真是一次快意的飛翔，時間那樣短暫，鮭魚奮力躍過一道難關。可是，這裡並不是溪中唯一的急湍，聽說類似這種激流瀑布有數十處。牠們一關一關地跳躍，到達忽然谷時，不知道已是第幾度了？而這裡並不是終點，牠們還有數哩需要回航，回航到最初的出生地。

有些身軀疲憊的鮭魚，在跳躍之後，竟不幸落在頑石之上。那是悲劇的結局，亂石堆中已散置幾尾魚屍，牠們歸自天涯，卻在半途遭到不測，在奄奄一息之際，牠們是不是有靈魂在呼喚故鄉？或者牠們是否能夠聽到故鄉在呼喚？

這樣艱苦的航程，究竟是誰安排的呢？傳說鮭魚奔向大海時，只是數吋大的魚苗。當牠們捨棄故鄉的淡水，投入苦鹹的海洋，年齡還不足辨識大自然的凶險，牠們便毅然浪跡江湖，走遍天下。經過數年的風霜奔波，卻仍然記得故鄉的準確位置。秋天是牠們的信約，牠們回鄉並非是爲了鄉愁，而是爲了傳種。每到秋天，該回來的都回來了，據說很少有爽約的，如果牠們沒有罹難的話。

天色暗下來時，鮭魚彷彿沒有停止逆游，時間好像不容牠們靜止下來。在灰暗中，依稀仍可看見鮭魚撥水前進的姿態。牠們在河床上摩擦身軀，那種英勇已近乎傲慢，全然不可輕侮。那是我看到的生物中，最最傲慢的一群。

靜靜的忽然谷，黑暗中的忽然谷，恐怕已見證不計其數的悲壯場面。鮭魚的原鄉，還在上游數哩處，但是我已不想去探訪了。鮭魚逆流的精神，已足夠說服我了。

告別忽然谷時，我已看不見艷紅的楓葉。鞋底踩出的葉聲，使我感覺季節轉換的無情。在不明的黑暗裡，我隨手揀起一片楓葉，我不知道那是什麼顏色。

如今，那片暗紅的楓葉已扁扁夾在我的書中。每次凝望葉脈，就使我強烈想起忽然谷的秋葉、秋水、秋魚。那是一次生命力的展示，一次回鄉願望的表現，而這一切都容納在我偶然拾起的一片楓葉裡。

——《自立晚報》，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四日

雪融

我帶謙兒去看雪融時的松林，松林是一片黑白分明的世界。從林外望去，深黑的是潮濕的樹幹和解凍的泥土，皎白的是壓在松枝上的殘雪和滿地的積雪。在陽光投射之下，黑暗的顯得更加深沉，光亮的也顯得特別耀眼。

我和謙兒站在遠處瞭望這一片顏色強烈的密林，也端詳通往松林小路上遺留的凌亂足跡。下過這場大雪後，已經有人來造訪這個深谷了。蜿蜒的鞋印，看來何等從容，難道在風雪之後就有如此優閒的訪客嗎？我和謙兒互牽著手，一起觀看山頭的積雪。孩子的小手是溫暖的，似乎在暗示我也應該懷著從容的心情，來欣賞雪融時節的松樹。

這座深谷叫做四巨頭，但是在我眼前聳起的，只是一座矗立的山峰，不知另外三巨頭跑到那裡去了？從西雅圖驅車來此，約需兩小時的里程。車子折入深谷的窄路之後，便寸步難行了。多天以來的積雪，經過重複輾壓，幾乎已經凝結成冰。縱然輪胎加上鐵鍊，仍然很難

在冰路上前進。到達深谷的盡頭，天地豁然開朗。從遠遠的地方，就可看見東邊投射過來的陽光，完整而飽滿地灑遍了整座松林。

若是在夏天，這片松林呈露無限的蒼鬱，風來時，總是惹起騷動的松濤。但現在是隆冬，松林覆蓋白雪之後，看來卻無比森嚴。從山腳向上仰望，像是列隊的禁衛軍，形成一幅場面壯闊的沉默。我決定把車子停在路邊，和謙兒漫步到深邃的密林那邊。

孩子以顛蹶的腳步緊跟著，有時還刻意踩在我的鞋印裡。他突然停下來，望著路邊一堆隆起的積雪。他說，讓我們來做一個雪人好嗎？我笑說，先去看森林那邊融雪的景象，有時問的話再來堆雪人。

這一片松林雖然就近在眼前，但在雪地上行走卻覺得稍微遙遠。在這個時節，茫茫的雪景裡，只有我和孩子蹣跚邁步，寒氣是如此襲人，孩子的小手給我溫暖，我也把自己的體溫傳遞給他。我們父子的感情，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接近過吧。他只有三歲，恐怕還不能體會我此刻的心情。

雪地的松林，確實是迷人而深邃。這使我強烈記起佛洛斯特的那首〈雪夜林畔駐足〉那首詩。他寫此詩時，對生命與感情的看法，已經臻於成熟。詩中表現的境界撫慰了多少受傷的心靈，也鼓舞了多少頓挫的意志。在這風霜的早晨，想起他的雪夜心境，竟能激發我們的許多聯想。佛洛斯特在詩的最後留下如此令人著迷的句子：

這森林可愛，幽暗而深沈

但我還有一些諾言要信守

入睡前還要趕好幾哩路

入睡前還要趕好幾哩路

佛洛斯特所說的路程，可以明指一次真實的遠行，也可以暗喻一顆生命的歷程。我寧取後者的暗喻，生命的困頓與艱難，豈不像極在雪地上夜行？佛洛斯特捨棄沿途的美景，而繼續策馬上路，這種強烈的暗示，使人感知一股意志的執著，也使人領會到一片磊落的人格。

這些年來，我在幾千哩路的旅途奔波，但是我信守了多少諾言？又實現了多少諾言？我和謙兒在雪地上一步一步向前邁進時，不禁覺得佛洛斯特的詩句充滿了啓示。站在林前，回望後面迤邐的足印，深深淺淺刻劃我和孩子相扶前進的痕跡。謙兒說，我們已經走得很遠了。他說話的神情，似乎很滿意這一程散步。誠然，這樣的路程對他已相當遙遠；因為他用了他的年齡，以及他對世界的經驗來計算。如果那是遙遠，那麼我距離最初的出發點有多遠？對面的山麓背著陽光，陰影中的白雪看來頗具寒意。這道南北縱向的山谷原是我熟悉的，但是覆蓋白雪以後，竟然使我感到陌生無比。這時，我才感覺到雪的矜持和傲慢，它僅憑恃一個理由就要解釋一萬種美。這座山巒在夏天，以青草、黃花、頑石組成一片碧綠的山麓；但現在雪說，美只有一種，那就是潔白。

但是，雪再如何矜持，總是要融化的。繞過松林前的溪水，不就有雪融的聲音嗎？隔著淺溪，看低壓的松枝有時會猛然彈起，那就是雪融的動作了。謙兒問，為什麼松枝會彈起來，好像受到驚嚇？我說，不，那是雪解凍以後，雪的重量減輕，再也壓不住松枝了，所以松枝要恢復它原來的姿態。謙兒似懂非懂地凝望那些偶然彈起的松枝，似乎是松林在向他招手。

不知道謙兒領悟了什麼？也不知道他這次觀雪獲得了什麼？那年我跟著父親去看山，他同樣是牽著我的手，我以顛躓的腳步走在他後面。在印象中，我只記得拚命走在他後面，也只記得那是炎熱的夏天。故鄉的山是綠色的，整片山麓都是野草。記憶中就只有這些，我已記不清那年我幾歲。而今，輪到我帶著孩子來看山，卻不是青山，也不是綠野。將來在他的記憶裡，是不是只剩下白茫茫的印象？

陽光照耀得正好，溪邊的雪好像加速融化，這倒是我感情的寫照。不是嗎？離鄉這麼久，總以為自己的感情已經凝固了，如厚厚的冷峻的積雪。但最近每想起台灣，感情便加速解凍了。松林那邊可以清楚看見殘雪從枝上墜落，陸陸續續的，簡直不能收拾。感情的堤防崩潰時，不就是這個景象嗎？

多年來，已經學會不輕易觸動鄉愁，已經學會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在多少沉厚的黑夜，在幾許黯淡的清晨，把自己埋在狂熱的工作和讀書之中，便是企圖把難以梳理的感情磨鈍磨損，從此不再狂想和浪漫；就好像模仿一場風雪的來臨，毫無聲音，緩緩冰封整個大地。

一般。今年冬天的這場雪，來得恰是時候，融得也恰到好處。只是我的感情並不能如此妥當處理，思鄉和戀愛原是屬於同質的情愫，全然不可理喻。

今年冬天過後，我必須好好整理自己的感情，最好選擇詩的形式來表現。是的，詩是感情的一種過濾，就像那雪融後的溪水，呈現冷冽清澈的一面。

謙兒問，這條小河是不是通往海洋？我說，是的，它一直流到太平洋。其實，豈止通往太平洋而已，它還銜接溫暖的南方，甚至湧向嘉南平原的海岸。望著黑白分明的松林，我的血液不禁熱了起來。謙兒並不知道我還在雪地裡激動，更不會發覺我的感情已變成雪融的一部分了。

——〈自立晚報〉，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

深夜的嘉南平原

北斗七星垂直閃爍時，你或已沉睡。我依稀辨識你解衣散髮，寧靜地讓裸露的身軀舒放在黯淡的星光下。這是第幾度，我又與你相遇在蒼茫沉鬱的夜色中。

離開你，我不曾哭泣。再見到你，我已熱淚盈眶，因為那總是發生在深夜的夢裡。這時，你是平躺的島嶼，我假裝與你一起並肩臥下。推窗迎接夜涼，正好望見北斗七星冷冷地發光，我才驚覺自己擁住的，只是一張北半球的地圖。啊，我剛作完一場與地圖等高同寬的夢。

這一切，都只爲了習慣地回首看你。經過了這麼長久的別離，你仍是我最牢固的信仰。窗外的江湖，物換星移，而我總是以整個不眠的夜，以熾熱的心，記取你回憶你。我仍細數春日的柔雨，夏日的暴雨，秋日的苦雨，冬日的寒雨。在深深的記憶裡，你永遠是我暖和的嘉南平原。

你應該知道這是五月。蛙在田裡繁殖，魚在水底受精。在想像中，你以一片空曠的草原迎接我，以含蓄的河川，以大膽的山巒。我赤足向你奔來，若是我踏著歌聲而來，那一定是頌讚你的送抱，我的投懷。而今，我卻把自己囚禁在深濃的黑夜，藉著黯淡的星光，遙望你的身軀，煎熬我的心靈。

因為，我時常在子夜守候，猶如我那年坐在微風的山頭。彷彿，我又回到少年的時光，進入全新的浪漫時期，我嘗試以曲折的語言來表達我的感情。在煎熬中，我耽溺於精緻的隱喻，繁複的象徵，似乎我的胸懷就揣著一張神秘難解的星圖。我是多麼希望，我們一同坐在一顆擦亮的晨星下，攜手解析你的苦澀、我的困頓。此刻，我只能重新為每一顆星辰命名，讓每一個名字都與愛情相關。只因我深信，所有照耀我的星光，也同樣會降臨你、點燃你，即使是一顆晦暗的二等星。

你當不難瞭解我這幾年來在旅途上的受創，顛仆的道路，迎面的風塵，不斷阻擋我的前進。我孤獨地為自己敷藥療傷，一次又一次舔淨我的血跡；每當在我最疲憊的時候，就自然而然想起了你。我的靈魂已折磨成一排歷霜的樹幹，你可以讀出一些時間的創痕，一些錯綜複雜的刀割紋路。但是我要告訴你，受傷的靈魂仍然把你當做最後的依靠；我的年輪有多少，思念你就有多深。

我不會輕言失敗的，因為我知道你會給我力量，給我希望與再生。曾經，我在雪融後的池水中，發現一片殘敗的楓葉底下竟有一朵花形的投影；啊，那是一朵複瓣多重的花，周圍還環繞著光暈，璀璨亮麗。那不就是我的心的投影嗎？在大雪之後，春分之前，就有一朵花來向我預告生命的滋長，那是今年來得最早的喜訊。我願意把那朵花當做我的信約；不，就當做你給我的信息。那年我向你揮別，你不會許諾，因為你不輕易許諾。現在我主動向你許諾了，一個流落的人終於走向你，終要回到你的懷抱。

讓我向你坦白招供吧！有一度我會陷入矛盾的深淵。我竟然不敢為我的愛辯護，冥冥中有人以敵視的眼睛看你、看我。我的信念緊緊攫住我的靈魂，有一種聲音低沉警告：這種愛是不潔的、背德的。我躲在我的心室啜泣，突然不知道如何詮釋這一切。那時，我決定重新認識我自己，也重新去瞭解你。我讓時光倒流，回到我們先人的歷史深處。

我發現，我們的先人也是這樣愛過的。在華路藍縷的時代，我們的先人就是這樣留下獨特的愛的道德。我要接受的、學習的，就是先人在數百年來所建立的道德，一種與別人全然不同的傳統。也是在一個深夜裡，我突然澄清了內心的陰霾和恐懼，非常肯定地知道如何為你的愛賦予一個全新的定義。從一開始，我就屬於你的，完完整整屬於你的。我不過是一度迷失，一度流落。把應該奉獻的奉獻出來，那就是我們最初的關係。

同樣在那一個深夜裡，我仰望北斗七星一顆一顆仔細地照耀著我，我以感動的心情接納我一生中從未如此澄澈過的夜。我的心，和整個黑夜一樣透明，一樣年輕。啊，暖和的嘉南平原，在星光的閃爍中，我終於忍不住選擇最庸俗的字眼向你低聲許諾：我愛你。

這時，你或已靜靜沉睡。在這樣紛擾的時代，能夠度過一個寧靜的夜，就是一種幸福。

我依稀辨識你解衣散髮，讓裸露的身軀舒放在黯淡的星光下。我虔誠地跪下來，猶我年少時代跪向一顆升起的晨星。我答應你，回到你的懷抱之後，便不再離開你了。

——《自立晚報》，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向晚的華爾騰湖

白楊與青松

靜止的水，沉睡在林外；靜止的風，屏息在林間。在秋的邊緣，我造訪了華爾騰湖。這是生命中一個信約的湖，白楊與青松圍繞著湖畔，迎接了疲憊的我。

在暮色裡，白楊的枝幹呈現一片明亮；不遠處的青松則已轉成墨綠。這一暗一明，以陰霾的雲天為背景，看來像極一幅拙樸而陳舊的木刻畫。初臨這一場景色，使我感到怔忡猶疑；難道時光又流回到十九世紀？我是不是將走入另一個古典的世界？

華爾騰湖於我是陌生的，但是在我內心卻又覺得似曾相識。會不會是因為我讀過梭羅的《湖濱散記》而使我如歷其境？這是我不知道的。造訪這個傳說中的湖，與其說是來膜拜，倒不如說是充滿了期許。

昨夜暴雨過境，湖邊的泥土變得鬆軟，路上還殘留著幾處積水。不知是夏季快要結束，還是雨水帶來些許涼意，我的肌膚竟感到微寒。站在水邊，張望著這一片當年梭羅張望過的湖面，我想我是選對了地方。

這次決心前來，為的是選擇一塊寧靜的樹林供我沉思——對這十年來的旅程做一次最深沉的沉思。我相信，十年，對任何一個人來說，在生命中可以算是一個完整的時期吧。我確實是需要選擇一個地方，為自己做一次總的回顧。這十年來，自己的人生哲學、政治信仰、道德價值，以至對學問、事業、愛情、朋友、家庭的看法，不都是在風霜的旅途中緩慢而篤定塑造出來的嗎？生命並不能如四季分明的劃成幾個階段；但是，選擇離鄉後的第十年來檢討自己，重整自己，時機應該是很成熟了吧。

華爾騰湖恰好是一面平靜的鏡子，我選擇它來俯照自己。我不能像季節那樣，在一個確定的日子裡宣告結束；我也不能像楓葉那樣，在適當的時候轉紅，然後一夜之間全部凋盡。我的前來，並不想結束什麼，不過，我肯定告訴自己，我要開始一個新的時期。

木刻畫一般的白楊與青松，在暮色裡看來是如此淒美。十九世紀的梭羅，就是在林下對生命進行最為徹底的觀點，在他的書中，處處可見樹木的影子。但是，他並不是見樹不見林；他以隱士的生活方式從事入世的勞動，為脆弱的生命完成一場動人的辯護。我想，這一片湖水，這一塊樹林，對二十世紀的我也具有多重的啟發吧。

梭羅的故居

梭羅離開華爾騰湖，時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松樹下的木厝這樣記述著，這句話也寫在《湖濱散記》最後一章的最後一行。

木厝的旁邊，就是梭羅的木屋。但是，早就沒有木屋的蹤跡了；剩下來的，是後人依照考證而為他重豎的數根短矮水泥柱，標明那就是梭羅的故居。木牌前，是一堆疊高的亂石，那是前來憑弔的旅人在林中揀拾的，表示對梭羅的木屋的一點遺憾吧。百年後，仍然有那麼多人追念他、尊敬他，這一切並不能摒除他生前的寂寞。

梭羅是一個絕對的個人主義者，他的絕對已經到了沒有留下任何愛情紀錄的地步。他說：「我愛寂寞。我沒有碰到過比寂寞這同伴更好的同伴了。我們身處人羣之中，大概比我們獨處室內格外來得寂寞。」一八四五年三月，他向友人借了一把斧頭，先到林中砍伐一些粗臂的松樹，趕在秋天之前構築了一幢適合獨居的木屋，這裡有簡單的廚房，屋外也有一個六尺見方的地窖供儲存食物之用。可以想像的，他完成這幢小屋時，內心一定充滿了喜悅；他適時迎接了一個多姿多彩的秋天，而且也憑藉著這個屋子，他抵擋了一個辛苦的冬天。

他選擇這塊坡地定居是好的，從這裡望出去可以看見一個完整的湖面。我假想他曾經倚在我正依靠的松樹，傾聽貓頭鷹、野雁、松鼠，以至蛙聲。我來時，一切都歸於寧靜，靜得一如暮色之掩來。但是，我知道梭羅並不寂寞，在他的書中就可聽見不同的獸聲、禽聲與魚

聲。他拒絕納稅，辛勤耕作，又不忘努力讀書，任時間的長河在林外一瀉千里，他那與大自然為伍的境界，對我是相當遙遠的了。

梭羅在華爾騰湖住了兩年餘，然後就突然揮別，再也沒有回來定居。離開湖後七年，終於寫出了《湖濱散記》，就在這本書出版的前後，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經典著作，如霍桑的《紅字》，麥爾維爾的《白鯨記》，惠特曼的《草葉集》，都在這段期間問世。梭羅在生前並不會預知，他書中傳達的濃厚個人主義的思想，會對後世的文壇、藝壇產生無可比擬的影響。他蔑視富有與享受，尊崇刻苦與勞動；在內戰以前的美國新英格蘭社會，這種信仰毋寧是怪誕的、特異的。

梭羅離開以後，華爾騰湖卻不再寂寞了。來此朝聖瞻仰的香客，隨著時間的伸長而越來越多。對個人主義者的梭羅，這豈非是一種褻瀆，一種諷刺？很不幸的是，我也參加了這個行列。

這一個湖是屬於梭羅的，沒有人能夠像他用掉兩年的時光來瞭解它，更沒有人能夠像他動用那麼多文字來描寫它。我只是覺得，要認識湖的性格，最方便而可靠的，那就是直接去讀梭羅。任何人要超越梭羅而去擁有這一個湖，都是徒然的。

江湖夜雨十年燈

而我終於還是來了，趕在秋天降臨之前。湖面襲來的水氣，穿過單薄的衣衫，涼透了我的軀幹。我驚覺到，附近的楓樹已有兩三片葉子開始染紅，橡樹也是，已有一些呈現變黃的葉子。這使我想起梭羅的句子：「啊，它們的顏色訴說了許多故事。」

我發現，其實湖邊四周具備了各式各樣的顏色。邀我前來的友人，就曾經給了我一封夏天的信箋說：「湖畔的白楊，襯托出池邊枯木叢泛著的紫色光彩，在艷陽照映下，突出於墨綠的背景，那種對比，總是令我心悸。」我想我錯過了許多令人震顫的色彩吧，因為我到達時，已是夏天尾聲的黃昏。每種顏色背後都暗藏了一則故事，這是我深信的。即使是一朵小小的丁香，恐怕也曾經吸引過一雙情人的手吧；至於那撒得滿地的松針，以及那即將飄遠的葉子，可能也暗示一些流浪的、挫傷的故事。

而我呢？我的顏色應該是屬於蒲公英，或者是風信子；我的故事的結局就叫做失蹤。不是嗎？多年來，許多人都在探聽我的下落，而一些零落的流言也在追尋我的足跡。這樣長的時間裡，我竟能保持出奇的沉默，到現在我仍對自己深深感到納罕。

梭羅當年宣告失蹤時，曾說是要選擇自己喜歡過的生活，結果他幸運地找到了這一片與世無爭的湖水。但是我並沒有找到供我開墾落戶的土地；其實，我也知道自己還沒有到達與世無爭的年齡，而且這樣一個時代，也不容許我隱居，獨享寂寞。我只是在找一條恰當的道路，選一個恰當的時機返鄉。

然而，一回首就是十年。水中倒影的我，竟是謠傳中失蹤的人物。我想撥開水面看清自己，換來的卻是一場幻滅。這些年來，我的思考不都是充滿了幻滅嗎？不過，對我來說，幻

滅與復甦是一對孿生胎，我分辨不出它們有什麼不同。在與家鄉斷絕音信的日子裡，我仍保持清醒的頭腦，仍辛勤做思考的體操。我在內心尋到一塊平靜卻又關切的角落，從那裡我開始我的望鄉歷程。我越來越覺得，幻滅是一種崩壞的過程，但也是一種再造；十年的時光，足以拆毀我的少年，也足夠重建我的壯年。我的望鄉，是因為我不甘心在陌生的土地生根，而我的失蹤，卻是因為我難以回歸生根的土地。這是種幻滅，也是一種覺醒。

我必須承認長久以來的一個秘密，我的埋名隱姓是一群朋友的失蹤而引起的。當我再度聽到他們的消息時，他們已都分散在遠方，在鐵窗、在高牆。我總是帶著一份傷痛懷念他們，以我無力的感情。爲了同樣一塊土地的命運，他們選擇了同樣的道路——共同雕塑一個夢，勇敢去營造它，並且寧可爲它而受難。那時，我突然對自己的知識與學問感到萬分疲倦，甚至懷有一股羞慚。

當我決定要改革自己時，我選擇了自囚式的生活，在精神上與我的朋友一起坐牢。我以鐵門關閉我的日子，以鐵鍊封鎖我的感情，以鐵絲網纏繞我的行動；但是，我讓我思想解放。這樣整整度過了三年，在失去自由中，我知道自由的可貴，從而也知道監禁的痛苦；在思想的解放中，我終於認識了生命的飛揚，同時更體會到我遠方朋友長久以來所嚮往的境界。

然而，我也漸漸領悟到，我並不能永遠依賴自由的生活方式下去。在隔絕的日子中，我只是覺得距離家鄉更遠了，也距離我失去自由的朋友更遠。我的自我監禁與自我服刑，並不能解除他們苦痛於萬一，而我對他們的關切、懷念，也不能使他們感覺絲毫溫暖吧。

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的土地之外已有十年了，這樣的刑期還會繼續下去的。只是我想我應該走出自我構築的牢房了，讓日子開放，讓感情舒展，讓行動伸張，讓思想更加奔放。

夏天的風、秋天的雨

我把華爾騰湖當作新生命的一個地點。選擇它，是因為我要學習梭羅的反叛與傲岸；而更重要的，這是我感情得到解放的一個地方。在我到達湖畔之後，我已變成大自然的一部分，心室開門的張開，如松針之落地，雨水之入湖，那般無懼而果敢。

好像聽見湖水在林外呼喚，又好像松樹在對我低語：來吧，請來尋找我，就在水的盡頭。其實，我只在水邊找到自己的影子，當暮色急躁地圍攏時。

天邊傳來沉悶的雷聲，似乎在預告夏天的最後一場雨水吧。我必須在下雨之前趕回湖邊的旅店，四周的林木看來是如此行色匆匆，它們大概也感覺出季節交替之不可抵擋吧。我向華爾騰湖揮別時，內心暗自決定，要把過去十年加諸身上的鎖鍊解除，我要迎接生命中的新季節，縱然秋天就要來臨了。

當晚，我在旅社孤燈下聽了一夜的雨聲，使我怦然想起島上的雨，終於忍不住爲我心中的土地寫下一首詩的前兩節：

雙手捧著火焰走向你
 在白露初降的秋天
 你若站在林外看我
 搖曳的燈芯明滅
 豈非像極我滿懷希望的投射？
 投射在枝幹錯落的小路
 那時你就前來牽引
 在我行將熄滅而又燃起的剎那
 我便爲你寫一首冬日之歌
 以我燙熱的手掌
 並那無懼的喉音
 唱出你我巨大的島嶼之夢……

離開了華爾騰湖，我收到友人來信說：你走後，秋天就來了。我知道，我告別的，是靜止的風，靜止的水。

——（自立晚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七日

我所不知道的謝里法

1

對謝里法我所知不多。他是畫家，但我最初認識他，卻並不是他的繪畫，而是，他的文字。即使到了今天，我所讀過他的文字，比我所看過的他的繪畫還遠超過許多。然而，這也無妨，我仍然把他當做畫家看待。我總是這樣相信，他骨子裡流的絕對是畫家的血液和情感。

一九八一年暮春，我偶然路過紐約，也偶然錯過了班機，我竟因此與他第一次見面。在他靠近赫德遜河的公寓裡，我們竟然像極故人重逢，有不少話可以交談。對紐約，我從來沒有喜歡過。那裡錯綜複雜的橋樑與道路，凌亂陳舊的街頭與建築，使我一開始就對這城市懷著敵意。但是，與他見過面之後，我突然感覺到，紐約畢竟有它令人留戀的一面。否則，像

謝里法這樣的畫家，如何能夠與它纏綿如此之久？

從他公寓的窗口，可以望見迷濛灰色的格林威治村，還有那斜風細雨的赫德遜河。隱約中，使我感到這些景色與他的談話並不協調。那時，他正熱心尋找江文也的音樂資料與生平事蹟，所以話題就不知不覺集中在他如何挖掘台灣藝術史料的歷程。在他看似平淡的談話裡，可以說隱藏了他對台灣先人無限敬愛與感傷。我警覺到，龐大的紐約居然沒有把他吞噬，很少有人來到這個大都會而不被支解消化的。謝里法仍然維持台灣畫家的本色，仍然懷抱著一顆誠摯的台灣的心。

2

認識他的人，很少不讀過他的《珍重阿笠》與《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二書。他也因為這兩本書而認識了不少人。《珍重阿笠》係以書信體寫成，字裡行間充滿了機智、幽默，也夾帶著譴責與訓誨。那篇題為《赤牛》的書簡，人物據說是虛構的，但在他筆下竟然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台灣讀書成長的知識分子，在一生中不免會遇到一兩位像赤牛這樣的人物。謝里法寫他，並不在於強調人物造型，而在於藉這位人物抒發他自己對台灣鄉土的懷念。一位在異域流浪已經二十年的畫家，能夠寫出像赤牛這樣人物的文章，他內心懷鄉欲念之強烈是可以推見的。《珍重阿笠》深入淺出表達了他對藝術的基本態度和見解。然而，如果讀了這本書就以為瞭解他，那就錯了。

他所寫的美術運動史一書，使他贏得了「巫永福文學評論獎」。他在這方面所下工夫，顯然已獲得海內外台灣人的普遍肯定。我之能夠閱讀這本書，是林衡哲寄給我的。（林是一位熱心而熱血的朋友，我希望能夠寫篇文章記述他。）當我捧讀時，非常訝異於一位未曾受過史學訓練的畫家，竟能寫出這樣扎實的作品。謝里法當然也在私下承認過，這本書有許多史實錯誤的地方，從而需要重新解釋的地方也很多。無論如何，這對於有意研究台灣美術史的學者和青年，都是一塊重要的基石。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把這本書稱為「美術史」，而命名為「美術運動史」，顯然有其微言大義之處。讀完他的書就可發現，他並未把台灣美術的發展過程視為靜態的，而是充滿了有機生長的一段活潑歷史。不同時期的連帶感，不同人物的相關性，他都利用一些可靠的史料組織起來，突出一般人未曾注意到的特殊意義。更重要的，他所強調的「運動」一詞，並不純然將美術史的活動孤立起來觀察，而是把美術發展史放在政治運動史的脈絡來看。這種方法無疑是把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社會看成一個整體，因而這個社會中的整個文化活動，也彼此息息相關。

他說過，寫這本書使他的收穫甚大。比較實際的例子，便是他常常提到的，寫作此書使他發現了雕塑家黃土水，音樂家江文也，文學家呂赫若。為了這樣的發現，也讓他陷入了更深一層的探討與研究工作。這些工作看來是點點滴滴，但細算起來卻耗了他十餘年的心力。他投入這樣瑣碎的工作中，令人不禁想起張良澤類似的辛勞。在這點上謝自然沒有張那麼專

注而堅持；但每次聽到或看到他在向人索取資料或探詢傳聞時，那種近乎謙卑的精神，毋寧是令我感動的。

他爲了黃土水，寫下了這位雕塑家的生平事蹟，衍生出《台灣出土人物誌》這本書；他爲了江文也，果然也在台灣內外引起了討論與研究江文也的熱潮。我嘗想，難道研究呂赫若的工作也必須由他來做嗎？關心台灣文學史的有心人，何不出來爲他分勞呢？我知道，他現在仍時時注意呂赫若的史料，並且也鼓勵旁人或朋友能夠爲呂赫若寫出精采的篇章。我想，有一天謝里法居然也寫出了呂赫若，研究文學史的專家應該會感到慚愧吧。

3

對謝里法，我真的是知道得很不清楚。像江文也這位台灣音樂家，理應由專攻音樂的學者去挖掘才對。在音樂上理解的程度，他並未勝過任何酷嗜古典音樂的人。他尋覓江文也多年之後，有一天果真遠從北京的江文也家屬處獲得一套樂譜。這時，他才喟嘆「誰來爲我看譜」。他在〈斷層下的老藤〉那篇文章中，表示對自己看不懂樂譜而感到好笑。他那種介於狂喜與尷尬之間的心情，我是非常了解的。追求多年的夢寐之物，一旦得手時，竟然不知從何處下手去處理。我不能不承認，他畢竟是可愛的。

從江文也的生命經驗，使他清楚看到台灣人在近代歷史上的苦難形象。當他用「台灣人的原罪」來概括江文也的苦難根源時，他自己也一定有著難以言喻的苦楚吧。「台灣人的原罪」一詞，自然不是謝里法唯一使用的。我最近讀了一冊由王育德所寫的日文書籍《台灣海峽》，是一冊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其中作者就用「台灣人的原罪」來形容吳濁流、陳若曦筆下台灣人的遭遇。我會深深思量過這個詞句的歷史意義，那不是一個文字層面的意義而已，它暗藏著台灣人的多少血淚。

據說，謝里法使用此一詞句，頗遭來某些有識之士的微詞。他們認爲，江文也在北京所受的迫害，其實只是整個中國知識分子受苦的其中一位罷了。若是有所謂「原罪」的話，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原罪」，而不是「台灣人的原罪」。這樣的意見當然有其膽識過人之處，如果他只是把江文也孤立的放在文化大革命中來看的話。

事實上，企圖用「中國知識分子的原罪」來掩蓋「台灣人原罪」，是說不通的。江文也並非只是到了文革時才受迫害的，早在五〇年代反右傾之風高漲之際，江文也就因爲台灣人身份而背上了「海外關係」。到了文革，江文也除了因爲是知識分子的關係而受辱之外，同時又再背了一次台灣人「海外關係」的罪名。從歷次的政治鬥爭來看，「台灣人」是一個逃不掉的罪名。這種罪名，在丁玲、曹禺、巴金等人的身上是找不到的。再深一層觀察的話，所謂「中國知識分子的原罪」一詞，是不能成立的。記得一九七九年曹禺來美時，我去聽了他的演講（擔任翻譯者是英千里的兒子英若誠）。在演講時，曹禺以激動的語氣回述他在文革時遭到迫害的經過。他的種種苦難，我認爲是應該寄以最大同情的。但是，想到五〇年代的曹禺，就不禁令人沁出冷汗。在反右傾批判的時期，曹禺便是帶頭痛擊其他作家和知識分

子的領導人之一。他的批判文章充滿了猛烈的字眼，頗有「除之而後快」的氣勢。他當年圍剿整肅別人，後來便輪到他被圍剿整肅。我看不出這是不是叫做「中國知識分子的原罪」？謝里法寫江文也時，並非只是以江文也個人的經驗來投射台灣人的影像，他其實已經從史實中看到台灣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普遍經驗。瞭解了這些，我們才會驚覺到，鍾理和、吳濁流、張深切筆下所刻劃的「中國經驗」，是多麼令人刻骨銘心。

4

對謝里法的繪畫，我知道得更加稀少了。在還未認識他之前，我在幾位朋友家裡，零星看到他畫的幾幅台灣農村的景色。給我最深的印象，便是他很喜歡使用綠色來表現他的台灣感覺。在他的作品裡，他所懷念的台灣充滿了蔥翠的樹林、草地和山巒。

以後，我才陸續看到他早期製作的版畫。那是他在越戰期間以版畫藝術來表達他當時對時代的一些思考。這些作品給人一種不快樂的感覺，但我認為這一系列的版畫頗能代表他的風格。他有意要表現出對那個時代的反抗，使得整個作品有一較為集中的主題。我也覺得，這可能是他繪畫生涯中較為認真的一段時期。後來他以紐約都市為主題的版畫，呈現得明朗活潑一些，很容易博得喜歡。但對我來說，我反而覺得過去的那些作品才比較能反映他的精神。

倘若謝里法返鄉的話，他可能會畫出許多台灣景色的作品吧。這是我一直深信的。一九七九年之後，呂秀蓮入獄時，他特地畫了一幅巨大的呂秀蓮的側面像。這大概是他第一次為朋友畫像的吧，唯其如此，我才更進一步體會到他關心、熱愛台灣的感情。

到現在我仍然記得，一九八三年秋天與他一起去拜訪畫家洪瑞麟先生的情景。那時候，洪瑞麟正以艷陽為主題畫了系列的作品。謝里法去那裡除了看他的新作之外，主要是為了看看洪先生早期的礦工素描。他在數百張的作品中選了三張，然後怯生生問洪先生說：「我不是可以付一千元買三張畫？」對我來說，此舉使我吃驚。因為我知道，一千元美金對謝里法是一筆大數字，當時他是很窮的。一般人對洪先生的畫並不是很注意，更不用說對他尊重了。然而謝里法遠從紐約飛到加州，然後又驅車到海濱去看洪先生，這份心意毋寧是熱誠而真摯的。等他拿出現款買畫時，似乎又擔心觸犯了這位前輩畫家。這時我才認識到，謝里法對台灣前輩畫家的尊重，確實出自內心深處的。

我後來問他：「當你收藏一位台灣畫家的作品時，是因為考慮到他是台灣人，還是因為考慮到他的藝術成就？」他說都有。他認為，台灣畫家的藝術成就一直受到忽視，如果台灣人不先尊重自己的畫家，又如何會贏得他人的尊重。他也說過，台灣現代畫的源流在日據時代就已打下根基；如果以為台灣的現代畫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才從中國接來的火種，這種認識絕對是錯誤的。

他的這種觀點，顯然也可以糾正一般人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錯覺。長期以來，總是有人這樣傲慢的宣稱，台灣新文學是從一九四五年戰後才發生的。這種偏頗的觀點在台灣橫行了

將近三十年才慢慢被糾正過來。其實，並不是只有台灣繪畫或文學遭到曲解而已，整個台灣文化長期以來不也是嚴重受到蒙蔽、扭曲，甚至醜化嗎？

謝里法會寫下《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以及最近出版的《台灣出土人物誌》，都是基於上述的信念而著手進行的。他並不是善於辯論的那種人，他只知道以歷史的事實來鋪陳他對台灣美術的認識。然則，這種落實的工作，就足夠駁斥那些饒舌挾空洞的「中國」以壯聲勢的論調了。

5

認識謝里法將近四年，其實，我對他還是知道得很少。這次聽說他在台灣舉行水彩畫展時，不禁爲他感到高興，一個以台灣爲傲的畫家，他的作品也應該是要送回自己的家鄉的。我不知道這些水彩畫是不是能夠代表他的藝術成就，也不知道家鄉的朋友對他的作品會有怎樣的評價。不過，他決定把畫送回去展覽，就足夠表達他的一些心願了。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夠回到自己的土地，把他的心力完全奉獻給台灣。我更希望，我能夠和他在自己的土地上相遇。到那時，我也許會寫出另一篇「我所知道的謝里法」吧。

——《台灣文藝》，第九三期（一九八五年三月）

給秀喜姑媽的一封信

北美的春雨正在窗外不停落著。在燈下夜讀，卻突然強烈想念台北盆地的雨，我決定寫一封信給妳。離開台灣已經這麼久，時間確實長得足夠讓我與妳長談。

沒有人會原諒我離開那麼久，就是自己，也找不到恰當的藉口來爲自己辯護。當一個人被迫流浪時，就只能以各種形式來表達對鄉土的熱愛。但是，這種愛並不能爲自己長久的離鄉而辯護。我只想告訴妳，僅僅依賴這麼卑微的一點愛，我才得以在流浪中繼續活下去。

記得在爲妳的詩集《樹的哀樂》寫下〈祝福一株不老的樹〉那篇短文時，我說：「我暫時要離開這塊土地，這塊養育我將近二十八年的溫暖的土地，我知道再回來時，必將是跨過了青年的階段，且邁向壯年的時期。」現在回顧這段話，心情居然微近中年了。如果是妳自己的孩子離開這麼久，妳原諒他嗎？

請不必追問我爲什麼我被迫流浪。歷史如果有被歪曲的時候，我們的時代也有不可能避

免顛倒錯亂的時候。我想我生在一个錯誤的時代，所以我會被一些流言啃食，歪曲並污辱。我所賴以生存的那一點點愛，也被視為可怕的禁忌。可是我相信，沒有人能夠剝奪我對鄉土的熱愛，我寧可用我的血，甚至生命來維護我的愛。

有一度，我曾經相當絕望，總以為我和自己的土地全然隔絕了。深陷在絕望的角落時，我幾乎放棄文學，更別提寫詩了。有天我忽然看到台灣寄來的刊物，讀到宋澤萊的〈若你心內有台灣〉，對我衝擊許久。我沉埋已久的欲望竟好像立即迸發出來。那時，我才知道我並未完全絕望。

宋澤萊的詩，使我又勇敢振作起來。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時，使我看清楚每位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位置，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在曠野裡，有人喊出狼來了的呼聲。對我而言，那簡直是野性的呼喚。經過那次論戰，我對自己從事過的文學批評，竟產生前所未有的鄙夷之感。我為自己的詩評感到可恥、可憎。從那時起，我決心放棄寫詩評的工作。

後來，我又讀了一套名為《現代詩導讀》的磚頭書籍。兩位現代詩的「導師」，寫下那麼厚重的書，不知要將台灣文學領航到何處去？該書對我的奚落，當然是無可避免的。其中還有一名導師竟然尊稱我為「普羅詩人」。

讀完他的評語，我才知道這位導師根本不知什麼叫做「普羅」。坦白的說，以我這種中智階級的脾性，是沒有資格被尊稱為普羅的。但是，也因為看到他們那麼輕易的下筆，才使我瞭解台灣的詩評是如此俯拾可得。這一位導師還算是四十歲以下的青年，說話就已經這樣

不負責了，台灣的詩評還有什麼指望？

然而，這一切畢竟是過去了。我從前希望所寄託的，實在是放錯了地方。讀了宋澤萊的詩，我內心又燃起熊熊的希望；直到我讀了他的〈文學十日談〉，我便預感一個新的時代就要來臨了。

我開始嘗試重新寫詩，我決定要為台灣土地上的子民好好地寫。流浪了這麼久，見識了那麼多，我覺悟到只有台灣的子民才值得我寫，值得我去表現他們的善良、純樸和勇敢。有人指控台灣子民有偏狹的島國心態，這一點我並不想費筆爭論，就讓我的詩來表現他們的偏狹與自私吧。

這兩年來，我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有幾首或許妳已閱讀過了，有的妳或許看不見。但我要讓妳知道，每一首詩我都寫得非常用心，因為只有台灣子民的善良與自私、純樸與偏狹、勇敢與怯懦，才值得我全心全力去刻劃。

離鄉這麼久，我總以為我在故鄉死了。寫這封信給妳，我要向妳宣告我就要復活，我要以我的詩，證明我活得勇敢無比。

在流浪中，我曾經遭逢無數的頓挫，曾經脆弱得幾乎要下跪。但我畢竟克服了自己的怯懦，因為我知道做為台灣的子弟，應該比任何人還勇敢。我畢竟做到我們台灣話所說的：「沒有失人之禮」。

妳的話，我仍時時可以拜讀。在亞洲，要尋找一位像妳這樣多產的祖母詩人，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從前我說過妳是不老的樹，並說吾鄉吾土生長著這樣一株樹，我感到非常驕傲。那是將近九年前說過的話，到現在我仍這樣堅持認為。

北美的春雨仍在外面不停落著。在燈下寫這樣一封短箋，並非祈求妳原諒我長久的辭鄉，我知道沒有人會原諒我。我只想向妳說，我是多麼想念台灣。請容許我在異鄉的雨聲中，寄出這第一封信。

——《文學界》，第六集（一九八三年四月）

第3輯
回航

從落空到落實 ——「巫永福評論獎」得獎感言

一個離鄉十年的遊子，也許早就被他的土地遺忘了；至少，他是不可能輕易獲得寬恕的。所以，當我知道自己入選今年的「巫永福評論獎」時，內心的錯愕與惶恐毋寧是大於喜悅的。在我還未來得及向自己的土地祈求原諒之前，故鄉的朋友已經以寬容的心懷接納了我，並且還以這樣鼓勵的方式召喚我。這不能不使我沉浸於一片無盡的感動之中。

使用宋冬陽筆名發表評論以來，便陸續獲得一些預期的和意外的回聲。這些文字部分地反映了我近幾年來對島嶼命運的思考；因此，當遙聞一些回聲傳來時，我便警覺到這樣的思考並非只是我一個人的了。台灣本土文學運動的澎湃發展，無疑是點燃這些思考的主要觸媒。然而，本土文學運動卻又並不孤立地推展，它其實是台灣面臨時代大轉彎時推波助瀾的重要一環。這樣說來，我的思考並不僅僅是文學的，而是整個動盪的土地的一個連鎖反應。倘然我的評論因而染上了政治色彩，那就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我寧可認為是我們身處這

個時代的共同問題吧。

我是一個台灣意識論者，這是不必否認的，而且也不必謙卑。我不知道我們何時竟被教化成習慣於這樣的論調：凡涉及中國的，便是全局的，是有著寬廣的歷史視野；而凡是提到台灣的，便是局部的，是偏狹的地域主義。這種簡單的二分法，曾經藉著官方的政治宣傳而長期橫行。如今，一些中國意識論者竟然也不假思索而照單全收，這不能不說是知識分子的疏懶與墮落吧。意識，是有其社會經濟內容的；它是一種思想，一種行動，一種生活態度。它只有落實與落空的真偽之分，並沒有寬廣與狹隘的尺寸之爭。在文學評論的實踐上，我持的便是台灣意識這樣的思想，這樣的行動，這樣的態度。我在政治信仰上，亦復如此。

涉足於文學工作已近二十年，流浪於異域也已過十年；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過去五年那樣，在思想上發生過劇烈的變化。在變化過程中，我經驗了至今回想起來仍然有著的一種創痛的感覺。不過，通過那道傷口之後，我知道我已經免疫了。此後，我解釋在台灣發生的一切事物時，再也不會虛偽地使用「中國」這樣的字眼。當我說中國時，我一定指的是真正的中國——那塊古老的亞細亞大陸。猶如我說台灣時，指的便是我想望的、孺慕的、賴以生存的那塊島嶼。

然而，我並不從此就迷信「台灣意識是檢驗文學的唯一標準」。在文學的領域內，仍然有其超意識和非意識的層面。文學使人提升，並非使人矮化。我深知，我的文學道路仍然是曲折而遙遠的。我也相信，要追求一個恢宏的時代，更需要有一顆恢宏的心靈。這次得獎，使我有一次反省的機會。果實在反省中而有所獲，則其意義應該超過得獎本身吧。

——《台灣文藝》，第九三期（一九八五年三月）

受傷的蘆葦

消息傳來時，我正要前往那塊蘆葦地帶。對於毫不設防的我，這個消息使我感到震驚、刺痛，繼而是無盡的悲傷。已經有好長一段時日，自己的感情不會如此搖撼過。總以為在自我鍛鍊之後，感情會變得粗壯起來——我深信已向脆弱、纖細、敏感的年齡告別了；在往後的日子，至少是不會輕易掉眼淚的。但這仍然只是假想而已。在接到消息後，我不禁掩面跪下，我偽裝不成一個男兒的模樣。

蘆葦地帶是一塊荒草的土地，從外面看來，好像真的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情。其實，這是一塊野生禽鳥的保護地。在廣大湖泊的西側，蘆葦大約蔓延橫跨了兩哩長，形成一個不規則的新月狀。秋天來時，蘆葦就開滿了白色的花，棉絮一般的迎風招展。每次路過那裡，我就聯想到一排排高舉的手勢，彷彿要傳達什麼信息。這裡是土生禽鳥的出沒地帶，也是過境候鳥的棲息處。那一系列揮動的手，如果不是在迎接禽鳥，就是在歡送吧。

我喜歡那揮舞的波浪。現在是暮春的五月，已沒有花白的旗號，蘆葦在艷陽下長成了暗褐的草叢。微風襲來時，蘆葦照例是左右擺動。一排排的野雁降落又飛起，偶爾也會傳來幾聲呼喚。我總是耽溺於觀察牠們升降時的姿勢。禽鳥飛起時，張揚著一種曠達的雄姿；降落時，又擺出一種恬然的身影。我欣賞的是牠們那種來去自如的風度，這是牠們的土地，一塊使人類都必須謙卑的土地。

大部分的時候，蘆葦地帶一片寧靜，我酷愛這一片小小的土地，這常使我懷念在台灣時守著荒蕪河床的情景。我也愛極這裡的寧靜，在禽鳥的呼喚裡，望鄉的心情多少能獲得些許的平衡。在停車場的這邊，自然看不出蘆葦叢裡充滿了生生不息的禽鳥。搖下車窗，北地五月的微風立即湧入，也帶進了一股濃烈的荒草味道。若是在往昔，我會走進這一塊禁地，有時也驚起一些倉皇的水鳥。這樣可以看到飛雁、野鴨、水鳧、灰鵝；我甚至還看過怒張尾羽的孔雀和栖栖遑遑的雉雞。牠們是北地曠野的主人，也是過客。

守在蘆葦地帶的盡頭這邊，我並沒有觀鳥的心情。我只是習慣坐在這裡，或者也可以說，我一向是來此逃避的。天空有野雁飛過，一隻，兩隻，三隻。但我的視線跨越了蘆葦，投向遠處的雲層。我不想辨清雁子是北行還是南飛，也不想讓雁子打斷我的思索。我思索的是消息中一群受難人的命運。

我想起來了。他們曾經描述自己是「受傷的蘆葦」，我為這一詞深深感動著，彷彿看到風中舉起眾多的手，就像我在秋日時節望見一排排招風的蘆葦。然而，他們的手勢並不在迎

接，也不在歡送；而毋寧是在呼喊，在叮嚀，在喚醒。每當望鄉時，蘆葦的影像就自然升起。他們是受傷的，但也是有思想、有意志的，他們是勇敢的蘆葦。

我的家鄉豈不也是一塊蘆葦地帶？在草叢深處，不也充滿嚮往飛翔的禽鳥？如果蘆葦受到創害，禽類又將如何？幾年來，我的心情似乎與他們緊緊銜接在一起。說得更確切一點，我只是被他們激起的波浪所衝擊的其中一個。不論走到何處，我都無可避免要懷抱他們受難的形象。我曾經這樣片面假想著：當他們開始在重重鐵門背後度過困頓的生活時，故事到此應該有一個結局了吧；至少，也應該告一個段落。我會那樣想，無非是在呈露我的怯懦，只希望他們的苦痛能夠有個了斷，從而也可使我不必時時刻刻思考如何去分擔。我的怯懦，不僅是可鄙，而且是可惡的吧。

故事並不從此結束，猶如他們追求的夢，依舊在我的土地延續著，縱然這樣的夢是多麼平凡。可是，他們的夢又何嘗不是我的？何嘗不是屬於同一塊土地上千萬生命的夢？倘使這一場貫串數世紀的夢未能實現，他們的痛苦，世代的痛苦，就沒有拭去的一天吧。

蘆葦受創，卻不凋萎。那年九月，我又遙聞他們散發了一份受難的聲明。當我捧讀傳單上的一字一句時，我就知道他們的意志是如此牢固，是如此的不容輕侮。那不是平面的文字，我依稀望見一朵朵迸放的璀璨的鮮花。他們都是蘆葦，卻都是會思考的蘆葦。如果思想之花，以鐵門鐵窗都禁錮不住，那必然是洶湧的憤怒的花朵。

他們失去了溫暖，竟仍然要付出溫暖；他們的愛被剝奪，卻仍持續要付出愛。我不知道

是什麼力量塑造了他們的意志；但是，我知道他們的意志是與我的土地緊鎖在一起。

然而，他們的行為與行動，不免是引起議論的。操縱宣傳機器的人，當然是不用說的。也曾有過這樣高貴的知識分子，善於使用據說是近乎科學方法的分析，把受傷的蘆葦的夢和理想，規定為屬於社會中一個特定的、既得利益的階級運動，滿足於這種精確分析的知識分子，顯然並不驚覺自己也是蘆葦地帶的一群。總是有這樣古怪的禽鳥，發出空洞的聲音，宣稱蘆葦的夢不應該是島嶼的，而應該是亞洲古老大陸的。我並不困惑於這樣的聲音，全然並不。當蘆葦受傷的時候，我不知那高貴的一群有什麼理由可以免於受傷；我看不出亞洲古老的大陸能夠給予受傷的蘆葦怎樣的溫暖。

夢是不會結束的。傷痛的消息中，我又聽見受傷的蘆葦在牆內牆外一起攜手絕食。有什麼消息比起這還更令我震驚的。

在禁錮的歲月中，他們從未停止思考，從未放棄維持他們的尊嚴。若是文字不容許傳達，聲音不容許散播，那麼無言的飢餓可能是窗內窗外共同的強烈語言了。說它是最原始的行為也好，說它是最高貴的行為也好，這種語言的誕生是凝聚了多少果敢的精神。在遙遠的印度半島，在遙遠的愛爾蘭，在遙遠的俄羅斯，都見證過這種勇敢的行為。那不屬於個人的，也不屬於特定人群的，而是跨越了階級而屬於共同命運的土地的。逼使這種行為產生的，是應該因此而深感羞愧的吧。由於傲慢與偏見，由於自私與怯懦，才使得受傷的蘆葦在鐵窗的陰影下受到差別待遇。果真如此，在偏見之前，在傲慢之前，他們的夢和理想不就綻

放得更加放膽而動人？

沒有聲音的蘆葦，飢餓的蘆葦，他們造成的語言竟是震耳欲聾。我知道他們不會凋萎零落，他們不僅做了預告，而且也營養了更多的花朵，我不能不掩面為他們祈禱，也不能不全心向他們認同。

他們追求的夢毋寧是極為單純的，那就是把自己所賴以生存的土地營造得更像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猶如這片北地禽類聚散的蘆葦地帶，免於恐懼，免於受害，並擁有廣漠無垠的天空，足供遨遊飛翔。在混沌的晨霧裡，在不明的黃昏中，永遠不必擔心迷航或落入陷阱；每一次出發與回歸，都是一段放懷的旅程。他們的夢就是這樣透明。然而，這竟需要以鮮血，甚至生命的代價去換取，一個簡單的夢仍難以實現。正因為如此，在失去自由的狹小天地裡，他們仍然繼續辛勤努力。他們是這塊土地孕育出來的生命，有的是根鬚，是萌芽，是花朵，是果實。鐵鑄的門窗，能夠監禁那樣多的花果嗎？

微風的暮靄裡，又有一隊低飛掠過的雁群。牠們優游展翅的飛姿，難道是證明牠們的土
地優於我的土地嗎？衆多高舉的手，在那裡搖動揮舞，果眞在歌頌讚美牠們的天空寬闊於我的嗎？這是我不知道的。回首瞭望我的土地，彷彿看見一列列叮嚀的、喚醒的手勢。我不容許自己變成一隻脫隊的野雁，永遠不許。

我確實飛得太遠了。我曾經飛入分歧的天涯，感到無力回頭；我以為天長地久的意志就在地平線的那端。有一天，我突然聽到呼喚，來自我小小島嶼的遙遠的呼喚，催醒了我的靈

魂。那聲呼喚，來自受傷的蘆葦。確實像極白萩的詩句所說：

只有你

僥倖

飛脫

在天空深處

孤零鳴叫

消失

對我的土地來說，我的消失其實是微不足道。但是，我的催醒對我是極其重要的，那是生命的一個大轉彎。我得承認，我是僥倖者，是飛脫者，是孤零者，但不再是消失者。

我正在朝著家鄉的方向飛翔，我深信有一天我的土地會緊緊擁抱我。這一切，都是來自受傷的蘆葦的呼喚。消息中的他們，是不是安然無恙？我為他們祈禱，也要讓他們知道，他們被禁錮一天，就有許多人跟著他們受到禁錮，而手持監禁鑰匙的人，也就永遠沒有放懷的一天。他們是蘆葦，是粗壯的，是不輕易折斷的蘆葦。

——〈台灣文藝〉，第八九期（一九八四年七月）

寧可是一個歌手 ——讀〈苦痛純真的鮮明砲手〉

合當在自己的土地咆哮

倘然我是一位砲手，就不會隔岸開火，而應該是回到自己的土地咆哮。倘然有人偶爾聽到我浪跡天涯時發出的聲音，那不是開火，而是頌讚。我的歌聲容或低沉沙啞了些，請不要以為我摻進了憤怒的音符，其實，我只是感到沉痛。我寧可我是一位歌手，把那受害受辱的創傷，化為歌聲，化為力量，化為永恆。我寧可自己是土地最平凡的一位歌手，縱然只是扮演卑微的助唱的角色。

讀了〈苦痛純真的鮮明砲手〉（《前進時代》第九期），使我在入春以來的每個晚上都睡得相當複雜，似乎難以安眠。這並不是因為那篇短文觸痛了什麼，而是因為它把這幾年來的記憶又重新點燃，匯集在我胸中燃燒。最近五年來的經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重大轉折。

我並不認為有了這樣的轉折，就足夠讓我代表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發言。如果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還具備了一點點意義，那不過是整個動盪時代的一個反映罷了。在我埋名隱姓的這幾年中，我自然也聽到無數有關我個人的流言，甚至我從前的學界朋友還為我搖頭嘆息，其遺憾愴然之情，彷彿是台灣的一個重大損失。正因為如此，在讀完那篇短文之後，我覺得有必要給我的朋友、我的敵人做一個回答。我也相信，我的土地應該會允許我發言的吧！

時代的順流和逆流

時代的潮流湧來時，有人身不由己捲進去，有人自告奮勇投進去。無論那是順流還是逆流，在跌宕的江湖中，往往感覺到個人的力量是多麼脆弱。尤其是一個讀書人，更加慌亂而不知所措了。不管是隨波逐流也好，逆流泅泳也好，近十年來，我具體感知一股潮水在滾動，也見證了那股激流在增強膨脹，以致波浪滔滔。然而，我也只是一個知識分子罷了，對於狂奔的怒濤是無可奈何的。我比較相信的是，時代的潮流無疑刺激了我不少的思考。

一九七四年我到達北美邊城時，釣魚台事件已經到了尾聲。我常常很慶幸自己沒有趕上那個運動，因為到現在我仍然認為，那是一個被出賣的政治運動——被所有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每一個政權所出賣。不過，在餘波蕩漾的那幾年，我仍不時可以與釣魚台運動中的各

路人物不期而遇。

在雪夜裡，在秋風下，也會與他們討教激辯。現在回想起來，那種論爭是多麼無謂，但許多思考方式似乎就是透過無數的討論而塑造出來。海外政治運動中的三個流派，也大約在那幾年中劃清界線，以至涇渭分明。正因為戰國時代就要結束，在稍早幾年常常出現的所謂「台灣前途討論會」的擂台，也漸告銷聲匿跡。不過，這種討論會的紀錄與專書，我在後來也涉獵不少。因此，對於海外天下三分的來龍去脈，有了概略的瞭解。漸漸的，我也發現當年那些就台灣前途坐而論道的各路英豪，似乎沒有多少人是真正下功夫去瞭解台灣。

島嶼命運的思考

我對台灣命運的思考，也許就是由於這樣的因緣際會而開始的。猶記得第一次捧讀《台灣通史》時，竟然慟哭起來。徹夜不眠翻閱發黃的紙頁，我才發現自己對台灣先人的血和淚全然一無所知。還有什麼比一位習史者無知於他所賴以生存的土地的歷史更可悲可笑的呢？還有什麼比一位知識分子怡然自得於他的長期被蒙蔽更可憐可恥的呢？

然而，對島嶼命運的思考，並非是依賴激動的情緒就可獲致。在困頓的日子裡，我終於學習冷靜下來，尋找並思索台灣歷史的問題。拂去塵埃，撥開迷霧，我窺見了一片失去的天地。原來歷史的撰寫權並不操在台灣人的手上，而是操在統治那塊土地的人的手上。一塊傾斜的島嶼，自始就被弄歪了。一頁殘破的歷史，都是銜接不起來的鏈鎖。我難以辨識我先人的血跡，他們的血大多被統治者拿去洗刷他們的罪。

在挫折疲憊的探勘過程中，我發現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如何擺脫那些撰史者在文字記錄中留下來的傲慢與偏見。我也發現，要認識台灣歷史發展的軌跡，便是如何把一度顛倒過的史實再一次顛倒回來。誠然，把歪曲的島嶼扶正，把歷史的漏洞填滿，不就是開拓台灣社會的子民長期以來努力的目標嗎？

台灣那塊土地原是荒蕪未闢的，經過數百年來的經營，終於證明先人的血汗並非虛擲。然而，台灣歷史這塊領域，卻仍然還是荒涼不堪的。多少世代以來，我們彷彿已習慣於這是一塊無聲的土地。倘然有人在歷史的迴廊發出了聲音，聽來還是那麼細微而寂寞。但是，我相信爭取發言權的人仍不在少數。在不同的地點，我們仍可聽見此起彼落的呼喚，只是這些呼喚並未匯聚在一起而引起更大的回響。

歷史的星火點亮時

一九七七年以後，我漸漸可以感覺到台灣社會的脈搏跳動得越來越快。那股活潑的力量，果然也越過海洋，擊打我的胸坎。應該動盪的，就不會長久靜止。在那年，我瞭望著鄉土文學論戰次第展開，黨外民主運動也開拓了新的境界。我忍不住自問：我們的歷史是不是

已到了轉彎的階段？緊接一九七七年之後的幾年，台灣的文化與政治運動，桴鼓相應，齊頭並進，遠在海外的我，竟絲毫不能幫忙。這常常使我想起吳濁流在小說中寫過的話：「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去的，你一個人袖手旁觀恐怕很無聊吧？」那確實是我生命中一段寂寥苦悶的時刻，雖然我曾經以為自己是多麼沸騰。

然後一個更大的浪潮來了。我望鄉中的港都，在一九七九年寒流裡燃起了一些星火事件。我錯誤地以為，那只是歷史長流中浮起的若干泡沫，竟未發覺那是時代胎動的陣痛。我熟悉的，未識的許多朋友，都涉入了事件的行列。在遲來的消息中，我焦慮地尋找他們的名字。故事意外地急轉直下，他們對台灣的愛，都被宣判有罪。這個事件如驚雷一般，猝然把我搖醒，這時我才相信：原來歷史是這樣被顛倒過來的。如果愛與罪的界線是如此模糊，我看不出人間還有何種是非。更挫傷的是，伴隨著事件而來的血案，更使我陷入幻滅的深淵。對我而言，所謂知識的力量，所謂道德與正義，至此變成了嘲弄與諷刺。

那真是一個刺骨的冬天，我彷彿經歷了一場暴雪壓境的夢魘。

有好幾個森寒的夜裡，我不能不用這樣的話自我審問：「當朋友為自己的土地受難時，你在牢外做些什麼？」我在內心開始一連串的激烈辯論，最後我領悟到，沒有什麼比無聲的台灣落入無邊的痛苦更能喚醒我的了。我不免對自己的往昔報以嗤嗤冷笑，能夠那樣做時，我知道我已有了勇氣向舊的幻夢告別。我也知道，當朋友的語言和思想被鐵柵封鎖時，應該是輪到我發言的時候了。

跨越寒涼的禁區

我常常認為，最勇敢最聰明的台灣人都留在獄內，其次是留在獄外的島上台灣人；而最自私最懦弱的，便是留在域外的知識分子。很不幸的，我恰好是域外台灣人的其中一位。倘然在歷史轉彎的時刻，我仍不敢說出壓抑許久的語言，我想從此我會更加鄙視自己吧。

從一九八〇年以後，我選擇做兩件工作，一是以文學形式把受難的事件表現出來，一是重新整理日據以降的台灣歷史。像我這樣在性情上近乎浪漫的讀書人，也許只能選擇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考。在探索我們的文學遺產時，主要是為了從台灣先人作品中汲取經驗，並且也是為了印證他們的與我的時代的共同傷痕。我嘗試掙脫一些定型的觀念，希望以比較接近台灣子民的心情來瞭解台灣文學。我能做的，也只有這麼一些些。

當我決定以「航向美麗島」做為我新詩創作的主題時，我非常清楚我將為誰而寫。基於對整個台灣史的再認，對當前現實的領悟，我希望以這些卑微的文字去溫暖那塊島嶼，我的島嶼意識也因而鍛鍊得比從前更加鞏固。當我大膽向我的土地謳歌，我的內心確實有跨越思想禁區的寒涼感覺，這益加使我體會到在這個時代身為台灣知識分子的惆悵。

我的轉變自然是引來一些議論的。從前學院紅牆裡的某些舊識，偶爾會向人表示對我的轉變感到惋惜。我不知道他們為何有惋惜之情？當有人受難、受辱、受害時，他們總是保持

高貴的沉默，很少公開表示遺憾，何至於獨獨鍾情於我的轉變？這是我深感不解的。另有一些文學界人士，對我高舉台灣意識的旗幟，則極端憤怒。他們指控我讀書不精，對歷史無知，缺乏全局觀念。對於這種近乎作文比賽般的控訴，我並不感到訝異。倘然我以將近二十年的少壯歲月奉獻給中國歷史的研究，到頭來仍然對歷史無知，仍然缺乏全局觀念，那麼我這一代知識分子，恐怕幾乎都必須驅趕去重新教育改造了。

我的轉變，更無可避免要受到當權者的重大關心。他們以各種溫柔的、粗暴的方式，對我的家人、朋友、親戚進行辛動的無限關切，這自然使我特別難以釋懷。長期以來，台灣文學在學院裡遭到刻意忽視；而今，他們竟然動用大量人力，對我微不足道的文學勞作展開密集的 research。每思及此，我並不只是寒涼而已，我強烈感到刺痛。如果這種離奇的現象不能使我的思想轉變，還有什麼能讓我轉變的？

追求充滿愛的台灣文學

我有著粗壯的感情，但我從未想過要擔任砲手。我寧可選擇抒情的方式，唱出我的歌聲。在鐵門高牆的背後，仍然投射著我所尊敬的朋友的孤獨身影。他們坐在鐵窗的陰影下，在遙遠的小島上，單獨咀嚼台灣命運的苦痛，為島嶼負荷沉重的憂慮。我想我的詩並不能使他們溫暖；相反的，是他們的精神感動了我。

從來的台灣新文學，就是抗議的文學。在抗議中，蘊藏著台灣人的崇高理想，那就是讓愛和公義降臨這塊土地。我的先人、我的朋友以鮮血和生命追求這一份理想，無力行動的我，只能跟在他們的背後追趕。倘然我能歌頌，我便繼續高唱，直到愛在我的土地實現。

——〈台灣年代〉創刊號（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

除了抒情外！
台灣不該只有抒情！

曠野裡的墓碑 ——紀念王萬得先生

獲知王萬得先生去世的消息，使我又一次強烈感受到台灣抗日運動人物的急速凋零。他死得如此沉默，又如此寂寞。彷彿在曠野豎起的一塊墓碑，沒有姓名，沒有時間，沒有籍貫。他死在遙遠的異鄉，不知道他的靈魂是否仍在望鄉？

我的感慨，當然不只是這些而已。流落在北京的台灣政治運動者，一個個含悲離去，他們的歷史也一一被拭淨。不論他們的背景是如何不同，他們生前的努力又是如何迥異。在他們告別人間時，都毫不例外被戴上一頂同樣的帽子：「愛國老人」。他們一生的奮鬥與掙扎，竟只是贏來這樣一個嘲弄的名詞。這誠然是令人心如刀割的命運。

王萬得於去年七月二十六日病逝於北京。直到八月十二日，在他死後長達三個星期，中國「新華社」才發佈了如此的消息：「台灣的名政治活動家、愛國老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顧問王萬得，因長期患病，醫治無效，於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歲。全國政協和台盟總部已組成治喪小組，籌備追悼會事宜。」

一位抗日的運動家，只剩下「政治活動家」的封號。善於經營政治運動的中共，不會不知道「運動」與「活動」的區別吧。使人感到特別心痛的是，在他逝世消息中，竟然找不到他年輕時代的經歷。如果不是消息中出現一個「台灣」的字眼，任何翻閱報紙的讀者，都會當做一位尋常的中共黨員的訃聞。更令人訝異的是，在他成為「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之後，立刻就變成「愛國老人」。彷彿他生下來就是「愛國」了，彷彿他生下來便是「老人」了。對於王萬得是台北人，是台灣文化協會會員，是台灣共產黨員等等的事實，竟然吝於提到隻字片語。

正如我對台灣歷史的認識，起步得相當遲緩一般，我知道王萬得先生的名字，已經是很晚的事了。我真正著手整理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政治運動的史實，是到一九八〇年的下半年才開始的，在許多陌生的歷史名字中間，我找到了王萬得。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意義，更不清楚他在台灣史上佔據了怎樣的地位。

在台灣，許多專攻歷史的讀書人大多也經歷過同樣的道路。對於中國歷史能夠如數家珍，可是提到台灣歷史時，卻茫然無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一位來自高雄或台南鄉間的知識青年，也許可以滔滔不絕討論唐代中國的盛衰，也許可以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挫敗而痛哭流涕。但是，如果問他有關余清芳在嘉南平原的抗日事蹟時，他會很乾脆並且絲毫不

會不好意思的回答：「這不是我的本行。」

當我初次接觸台灣歷史時，心情也大約就是如此。我們確實被蒙蔽太久了，我們甚至被教化如何指控研究台灣史的人「視野過於狹窄」。當歷史撰寫權操在統治者的手中時，我們對台灣史的瞭解，往往就陷入殘缺不全的境地。王萬得先生的去世，使我這樣的感慨更加深切。統治者是如此橫暴又如此有計畫把台灣史分割、扭曲、擦拭、滅跡。使我們看不清楚整個歷史的軌跡演變，使我們的時代與先人的事蹟全然脫節。

王萬得先生的死，究竟能引起多少台灣人的喟嘆，是很值得懷疑的。至於說，爲他感到悲痛哀傷的，恐怕就少之又少了。

王萬得先生是台北人，他本居地是「台北州台北市太平町四丁目二百二十四番地」。一九一八年畢業於台北大稻埕公學校，一九一九年通過郵政資格考試，曾在新營、淡水、台北郵局工作。一九二一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任職於《台灣民報》。一九二七年離台，遠赴中國，旋即參加中共。一九二九年返台，成爲台共的重要幹部之一。

他在台灣的抗日運動，可以說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以台灣文化協會會員的身分，來掩護他的台共活動。在文化協會中，他擔任中央執行委員；而在台共裡，他卻佔據了領導人的地位。有關他的政治思想梗概，可以在日本學者宮川次郎所著《台灣的政治運動》一書中發現。此書出版於一九三一年，書後附有一份〈自治問題座談會〉的紀錄，很完整的反映當時台灣政治運動者對「台灣自治」所持的態度。出席討論者包括：張維賢、王萬得、柯文

德、楊克培、謝春木等重要人物。王萬得自然是反對所謂「台灣自治聯盟」運動。他在會中的發言，分析了當時台灣社會性質。在言談中，可以了解他所追求台灣的出路並不是「自治」，而是台灣人民必須自救。

他的重要性，乃是一九三〇年接受第三國際的指令，聯絡蘇新、蕭來福等人組成「改革同盟」，而與台共領袖謝雪紅決裂。一九三一年，他主動召開台共第二次大會，會中被選爲常務委員暨書記長，完成台共的改革。但是，這個組織甫改革完畢，立即就遭到日本警察的逮捕鎮壓，同年底台共便完全瓦解。王萬得是在當年七月被補，坐牢十二年。直到戰後日本投降，王萬得才又在台灣社會出現。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之後，逃往中國，又開始他後半生的苦難生活。

與所有遠赴中國的台灣政治人物一般，王萬得並沒有躲過整肅、鬥爭、下放的命運。在他後半生近四十年的中國經驗裡，顯然一直是在望鄉的。他的苦楚，恐非我們所能理解。

我與王萬得先生的通信，是在一九八二年。這件事，對他對我都是一種奇異的經驗。雖然往返的信件只有三次，卻給了我刻骨銘心的記憶。

我研究台灣左翼政治與文學運動的勞作，在一九八二年時陸續發表了一些。其中有一篇長達六萬餘字的〈永遠的望鄉人——蘇新的生平與思想初論〉，就發表在海外的《美麗島》週報上。蘇新是留日學生，他的經驗與王萬得全然不同。但是，他們兩人都在一九二九年同時回到台灣，加入台共的組織。我正式把研究蘇新的文章整理發表時，蘇新在稍早的前

一年（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這給我有無限的感慨與遺憾。那也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思考震撼。我從來沒有寫過傳記，更沒有寫當代人物傳記的經驗。我更沒有想到自己在研究一位人物時，竟然聽到他去世的消息。

對於蘇新的人格與思想，我懷有超乎他人的尊敬。我從未見過他，但是從文字記載與史料痕跡中，我隱約可以體會一個落實、勇敢的人格。他有一個筆名是「莊嘉農」，爲了表示我對他的敬意，我也取了同樣的筆名。撰寫那篇文章，也使我認識不少朋友，當然也包括蘇新的女兒蘇慶黎。去年七月，我遇見她時，她還建議我應該儘量把她父親放回他所處的時代。她很委婉的說，我用了一些現在的標準來評斷半個世紀以前的蘇新。對於這點，自然使我特別警惕。蘇慶黎當然是站在她父親的立場來談該文，我對她的建議不能不表示謝意。

我寫的那篇文章，也使我認識了王萬得先生，在發表該文的過程中，就有許多認識和未認識的朋友來信與我討論。後來有人告訴我，台共領導人之一王萬得，仍然還在北京。一九八二年，我偶然在海外華文報紙上，讀到王萬得在北京度過八十歲生日的消息。我便決定寫一封信給他，請教有關台共的一些難解之謎。我並不知道他的住址，只知道他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掛了一個閒職。所以我把信寫好時，就在信封上寫了「北京台盟總部煩轉王萬得先生收」。在我投出之後，就沒有再牽掛這封信了。

大約在一個多月後，我突然收到北京的來信，居然是王萬得先生的回音。我以激動的心情拆開了信，一張小小的信紙，寫了密密麻麻兩面。這封信因爲不在手邊，我不能記住全部內容。不過，在字裡行間可以體會到他興奮的心情。他的字跡有點扭曲，筆跡很深，顯然他寫時極爲吃力。他在信後才告訴我，他有嚴重的風濕症，寫那封信他用了兩個小時。看到那裡，我真正感受到他對我信件的反應。他的誠摯，深深感動了我。

他到中國以後，便改名爲「王文德」，一個相當傳統的中國名字，我寧可喜歡他原來帶有台灣鄉土味的名字。他的信中也說，在日本牢中曾被迫去擔任印刷工人。那冊日本總督府所編的《警察沿革志》，他在監獄印刷廠就曾看過，並說該書的史料極爲可信。然後，他提醒我必須區別「台灣人」與「台灣人民」的不同。他提到這個問題，自然是回應我在信中所說的「台灣人的命運」。在現階段中共對台政策的陰影下，王萬得居然避免使用「台灣人」，而選擇使用「台灣人民」。這雖然是信中小小的一段，但對我有著無限的衝擊。原來他也和近代所有流浪在中國的台灣人那樣，對「台灣人」這個字眼那麼敏感，又那麼恐懼。這難道是三十年來他遭遇的政治打擊而留下來的後遺症嗎？

在信中，他也希望我「回到祖國」與他討論台共的歷史。最後他表達了強烈的返鄉欲望。因爲，他不只提到期盼「有一天回到台灣」，他還說希望見到家鄉的「伯伯、叔叔、兄弟與子侄」。他想望中的台灣，畢竟還有他衆多的親戚。這封簡短的信，我反覆讀了好幾次。每次我幾乎都可以想像一位八十歲的老人，坐在異鄉的燈下，吃力地爲一位陌生的故鄉子弟回信。與其說他是寫信給我，倒不如說他是在傾訴無盡的鄉思；他的信，應該是寫給他的故鄉吧。

我收到信後不久，便立刻回郵給他。這次停了好久，我才收到一封從加州轉來的信，這次不是他的筆跡，而是請人代寫的。信中仍然熱切邀我到北京與他討論。他說他可能是目前最熟悉台共歷史的一位見證者。又說，他也讀過〈永遠的望鄉人〉一文，但只是連載的前四章而已，希望我影印全文給他。因此，我便影印了連載十四回的長文，以航空付郵；同時附上一封信，請他能寄相片給我。一個多月以後，我收到他另一封請人代筆的信，他並未告訴我是否收到我的文章。不過他確實寄來了他的近照，唯囑咐我不能發表，因為他不是「喜歡出名的」人。

端詳著他的照片，年輕時代的輪廓仍然依稀可辨。黃師樵在一九三三年所編的《台灣共產黨秘史》一書，刊登了謝雪紅、蘇新、王萬得、簡娥、楊克培、趙港等人的照片。所以我知道王萬得當年參加台共時的模樣。

我不知道他對我所寫有關蘇新生平的文章有何評語，更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寄去的影印文章？我從一位同鄉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完成一篇長達二十萬字的台共歷史，交給中共黨中央。如果這個消息屬實，那麼這可能是研究台共的最佳史料了，這份史料如果是存在的話，我們希望中共當局能夠將之公開。這不是黨派的問題，而是歷史的問題。

我與王萬得先生的通信，在一九八二年就終止。我之所以沒有繼續寫信給他，有我的顧慮。第一，在我收到他第一次回信後不久，便開始收到北京國際書店的新書廣告，收到這些新書廣告，自然不是壞事。不過，國際書店之所以會得到我的住址，顯然是知道我與王萬得先生來往通信。我擔心因此會帶給他麻煩。第二，他後來的兩封信都是請人代筆，我想他每次回信都要勞動他人，這對於一位八十歲的老人來說，實在是一件煩累的事，我於心難安。第三，台共的事蹟，在中共現行政策下顯然還是一個禁忌。我不希望我的詢問求教，又為他的家人引來政治風暴。

無論如何，我是感激他的。一九八三年初，台灣發生了「楊煥西事件」。楊煥西在台北機場為情治人員所逮捕，被指控的罪名，便是曾經與蘇新、王萬得通信。楊煥西是一位旅居紐澤西的同鄉，年近古稀，竟然躲不過被逮捕的命運。這件事對我自有的無限的啓示，像我這樣撰寫蘇新的傳記，而且又與王萬得討論台共歷史的年輕讀書人，豈非可以預見一個永無天日的未來？楊煥西事件，使我聯想到北京的王萬得。他們都見證日據時期的抗日運動，但是在海峽兩岸，都同樣受到政治迫害與政治歧視。我不能不在內心痛喊：台灣人，你的命運難道注定是淒苦的嗎？台灣人，難道不知道要覺醒站起來嗎？

一九八三年春天，我又在海外華文報紙上讀到王萬得先生寫的一篇短文。大意是他八十歲生日之後收到一位陌生年輕人的來信祝賀他的生日，使他備覺溫暖。我知道，他指的是我所寫的信。如果我那短短數語能夠帶給他些許溫暖的話，那麼我應該多寫信給他的。

同年夏天，我有位黃姓朋友，因公出差到北京，問我是不是要買書。我請他有空時去探望王萬得先生就好了，並代我問幾個問題。黃姓朋友果然不負所託，一個月後便帶來回音。他說，王萬得先生看到台灣的來客，非常歡喜。從頭到尾都是以福佬話對談，似乎鄉音未嘗

稍改。黃姓朋友爲他拍了三張家居照片，也都寄來給我。從相片，可以看到屋中簡單的擺設。相片中的人物，看來相當老邁，帶著輕微的笑容。對我來說，這又是陌生又熟悉的面孔，比起他上次寄給我的相片還真實。從帶回的信息中，我知道不便再繼續討教有關台共的歷史。他的年齡，他的處境，畢竟是很困難的。

台共的歷史，在台灣只延續三年的時間（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但是，它在抗日運動的背後，卻掀起不少的風潮。即使是它本身的組織而言，也經歷不少驚心動魄的事件。這個由留學日本、中國的讀書人，以及部分本地農民運動者共同結合起來的政治團體，具體而微地反映了台灣政治運動的特性。與所有其他團體那樣，都沒有脫離內訌、分裂、滅亡的道路。台灣人命運之坎坷，是不是與這樣的性格有著密切的關係？我不能不感到苦悶。

如果不看集體的行爲，每位政治運動者區別來看的話，都是懷抱著理想，充滿了善良的個人。然而，善良的、理想的個人凝聚在一起時，就注定要傷害、要互鬥、要犧牲？右派的蔡培火、楊肇嘉，中間偏左的蔣渭水，左派的楊逵、連溫卿，極左的蘇新、王萬得，都給了我們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要撰寫一部台灣人分裂史，其史料恐怕較諸台灣人政治運動史還豐富吧。當集體的力量不能發揮作用時，當外力介入時，所有的個人就必須犧牲了，犧牲在洶湧的歷史逆流之中。

王萬得先生的去世，不能不使我回憶他淒苦的一生，也不能不使我想起他悲涼的晚年。他在日據時期所參加的政治運動，由於統治者的高度鎮壓，也由於朋友同志的互相內鬥，而

使整個組織在一夜之間崩潰。那瓦解的過程，至今回顧起來，仍然令人心痛。他們未能形成團結的力量，所以遭到逆流逆風時，便各自東西了。與蘇新的命運一樣，他所經歷的每一個政權，都迫害他、通緝他、下放他。他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家鄉，也失去了自己。

他們的歷史是不能遺忘的。在他們的身上，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台灣人在近代的飄泊命運。王萬得先生離開苦難的世界時，迫害他的人仍然吝於提到他的生平與籍貫。他漫漫八十年的一生，被壓縮成一個「愛國老人」的稱號，縱然他是愛那個「國」，但那個「國」愛過他嗎？

我彷彿在茫茫曠野裡看到豎起的墓碑，那裡埋葬著一顆冤屈的靈魂，只有名字，沒有時間，沒有經歷，沒有籍貫……。

——〈台灣文化〉，第六期（一九八六年六月）

遠行的玫瑰

他的一生有過幾次遠行。只有這一次，他走了，不再回來。也只有這一次遠行之後，他不再離開我們。他的精神，他的文學，完整且永遠留在我們身邊。

他並非沒有被遺忘過，曾經有過數十年，他與世界隔絕了。那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最成熟的階段，但那也是他最困頓最孤寂的時光。當我們記起他時，他已然接近晚年。生活了將近八十年的他，正好跨越了兩個等長的艱苦的時代。然而，真正屬於他的時代卻從未到來。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最後一季，最後一天，他仍然在期望那樣的日子。他的期望，不是坐待，而是追求。他的追求，終其一生。

自從第一次遠行之後，再也沒有人看見他退卻過，那年他二十歲，果敢並充滿野心。從殖民地台灣到達日本時，他就已經知道要選擇怎樣的道路。那並不是一次枉費的遠行。在那裡，有了一次刻骨銘心的體驗，他見證了殖民地母國的資本家是如何欺侮社會的弱小者，也目睹了弱小者是如何結合起來反抗不公不義。同樣在這一次遠行時，他初次接觸了社會主義，這使他成為日後台灣左翼政治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他在理論中汲取了養分，而在行動中開花結果。回到台灣時，他二十二歲，時正一九二七年，台灣抗日運動發展到一個分合的路口。他並沒有去尋找一份安身的職業；相反的，他解下了知識分子的書巾，毅然投入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的行列。

他的性格帶著一種驕傲，這使得當年凌辱他的人，到後來都要感到自慚形穢。他的驕傲，並不是要榮養個人的尊敬；他總是忘記自己，而讓驕傲的性格化為政治運動的一部分。唯其維持這種高貴的氣質，所以在他多次進出日本人的牢獄之後，仍然鬥志昂揚，毫不灰心。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歷史圓柱上，他為我們留下最好的台灣人形象的浮雕。

敏銳的思考，清晰的觀察，是他的特徵。當他和他的同志捲起風暴時，他反而是冷靜的。保持冷靜，是他再出發的動力。他也與他的同志決裂過，但是他的決裂並不澆熄希望，而是為了點燃更多的火花。在風聲鶴唳的時代裡，當政治運動變得零落不堪時，他選擇了無聲的文學道路。他在晚年時曾經如此回憶：「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年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我的文學發生很大的影響。」

他並不是第一個以文學形式來表達政治信仰的人；在這塊土地上，他卻是唯一一把文學運動和政治運動做最完美結合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是靜態的。他身處那個時代所感受的社會活力，都飽滿而充分凝聚在他的字裡行間。因此，從發表第一篇小說開始，他的文學就不僅

僅是個人的，而是屬於整個台灣。

我們難以發現他細緻纖弱的感情。他呈獻給我們島嶼的作品，毋寧是粗糙的、雄美的。他靈敏的耳朵，總是聽見黑暗角落發出的疾苦的聲音。他不必使用想像；如果在他創作生涯中有所謂靈感的話，那絕對是來自他的經驗。他更不必使用裝飾的語言；他的語言其實是民間的、群眾的。他篤信文學應該是根植於人民和土地，這說明了爲什麼每當他的作品問世時，便很迅速發生廣泛的說服力。他從來也不必使用欺罔和誑騙的技巧，他一落筆，便是樸素和誠實。在半世紀以後的今天，我們捧讀他的小說時，仍能準確感受他那時代的艱難與黯淡。

他沒有表現細緻的情，並不就等於他了解愛。當他攜著他的新娘去坐日本人的監牢時，就足夠告訴我們那是一個如何悲壯的戀愛故事了。他的小說沒有私情，有的只是擁抱台灣的高尚情操。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緊緊守著與他一起患難的妻子——一位背叛纏足的、肩負鋤頭的、沾滿泥土的女性。他們可能並不熟悉海誓山盟的私語；他們的愛的語言，表現在受難時仰望鐵窗的每一刻盼望，表現在勞動時淌在田野的每一滴汗水，表現在奔波時共同迎接的每一粒星光。他們的愛，沉默不語；像兩株佇立的玫瑰，彷彿各自迎風綻放，而他們的根鬚卻在土壤底下盤錯糾結在一起。

然而，歷史並沒有給他合理的回答。

在兩個時代交錯的岔路上，他對土地的愛又變成了新的罪。這一次，他開始了生命中最長久的遠行。那時他正踏入盛年，但是展開在他面前的道路，竟是陰霾而曲折。在漫長的被遺忘的十二年中，他一無所獲；唯一的收穫，便是鍛鍊了更堅強的意志。他已經預見，他後半生面臨的將是一個毫無許諾的時代。他也知道，沒有人能夠拯救他的土地，只有他和他的人民才是可以信賴的。他不知道什麼是歎息，更不知道什麼叫做畏懼。在新時代的舊監牢裡，他仍然堅持文學的勞作。他以兩倍心力寫出了陌生的漢文，只爲證明他對文學的力量仍具信心。在那些誠摯拙樸的文字中，他對酷嗜權力的腐朽人物，依舊保持嘲諷輕蔑的態度。他的體格瘦小，卻有著巨人般的人格。所有的壓迫者站在他面前，都一律變成侏儒。

他重見天日時，已近六十歲。結束這次遠行，他更必須挺著腰桿走出高牆，因爲在牢獄歲月中，他已知道島嶼變得更加傾斜，而歷史也顯得特別扭曲了。身爲一個受害者，他把憐憫和傷感全然擲棄在陰濕的牢房裡。他這樣說過：「憐憫和傷感是膚淺的，不能把讀者的感情變化爲意志和行動。」說這話時，他已坐過了十三次牢，而這正是他所遵奉的文學信念，也是他的政治信念。很少有壓迫者遇到像他這樣傲慢的思想犯吧。在經過長達十餘年的思想改造之後，他仍然坦白向世界宣佈自己是「人道的社會主義者」。他的宣稱，豈非是對一切加諸於他身上的污辱做了有力的反擊？他不懈地堅持自己所信仰的思想，就足夠證明他和他的土地是牢牢站在一起的。

他深知，公平和正義還未降臨他纏綿苦戀的島嶼。所以，他決定荷鋤上山，把最大的輕蔑給他背後的權力者。他爲自己的農場取名「首陽」，稍有一些歷史常識的權欲人物，看到

這樣的命名都應該覺得羞慚的吧。倘然他們站在首陽農場之前而不感到臉紅，那如果不是無恥，便是無知。縱然他後來又為花園重新命名，但是他的首陽精神，已成了他生命的支柱。

這樣一位驕傲的人格者，也有謙遜渺小的時候。從一朵茁壯的玫瑰，他虛心學習了堅忍不屈的精神。沒有什麼可以擊敗他，艱苦折磨的經驗，使他在任何環境都能萌芽、生長、開花、結實。也沒有什麼可以誘惑他；在他看來，栽培一株花苗遠比追求名利重要得多。對於佔據要津的政客，他可能感到陌生；但是要他細數花園中所有的植物，他絕對能夠叫出每一朵花每一株草的名字。他把腐朽與芬芳區別得清清楚楚，一點也不通融。如果有人偶然看見他低頭，那不是屈服，他其實是在埋首為他的花園施肥。他用經營一篇文學作品的心情，去扶植一株玫瑰。但是，他揮汗翻土、辛勤澆水，並不是要去感動每一朵花，他只不過為了使自己的背脊挺得更直。他要讓他的土地知道，一顆社會良心依舊充滿了活力。

他身在山上，心存人間。在晨霧中，在暮靄裡，都可看到他工作的身影。勞動，不停的勞動，成為他生命的最後的據點。可是，他的眼睛始終注視世事的一切變化。他以一朵壓不扁的玫瑰自喻，而且也終於成為年輕知識分子的普遍認同。他支持每一位追求公義的人，但他不以指導者自居，他參加他們。他跨過七十歲時，還蘊藏著年少時期的奮鬥與憤怒。反抗的意志使他昇華為這個時代的象徵——一朵玫瑰，成了他的名字的隱喻。

然而，歷史還是沒有還他一個公道。直到不告而別的那天，他苦戀的島嶼仍然還是傾斜著，他沒有看到它扶正過來。他可能覺得遺憾，但不必感到抱歉。這樣龐大的工作，顯然不是他一個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責任。對於這個人間，他完全沒有一點虧欠。可是，這不能說已經銀貨兩訖。他付出本分，還透支了精力，我們虧欠他太多了。他曾經被奪走的光陰，更不是我們能夠補償的。我們悲傷，因為他的離去將使這塊土地寂寞了些。但我們也應感到僥倖，因為他留下來的的工作，恰好是我們能夠繼續完成的。倘然有人退縮卸責，宣稱難以繼承這樣的工作，那就不只是羞愧而已，簡直是一種罪惡。

這一朵玫瑰，以盛放的姿態離去。那天他要遠行，再次顯露他豪放的性格，在清晨霧氣中說走就走，絲毫不拖泥帶水。他已習慣那混沌的霧，正如他熟悉那兩個顛倒錯亂的時代。他的去和來，將成為這塊土地永遠的傳說。設若有人問起這朵花的來歷，我們都知道他屬於常綠灌木，學名叫楊遠。他選擇出發的那天，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

——《台灣文藝》，第九四期（一九八五年五月）

交錯

聽說詩人路過我旅居的城市。彷彿是一陣風，一聲嘆息，一瓣落花，寧靜得使我不曾察覺他的過訪。詩人離開之後，我才知道他曾經來過，在繁花喧鬧的五月裡來了又去了。若是在昔日，我想我會和詩人熱情見面的吧。至少，他會讓我知道他的造訪，即使只是偶然的路過。而今，他與我默默交錯而過，我第一次感知友情的褪色凋零。這於我多少是有些悵悵的；而且也不僅止於悵悵而已。因為有了這一場交錯，我更加確信嗜詩的少年時期已全然結束。那段可以為一次詩朗誦會而冒雨前往的日子，已經完完全全過去了，縱然我愛詩讀詩一如往昔。

從書架上抽出他從前手贈給我的詩集，我忍不住又重新讀過一次。看到紙頁上留下的一些眉批的墨跡，恍惚中似乎窺見青年時代在燈下翻閱詩集的我。我知道，當年的許多信仰和寄託，都殘留在那幾冊詩集之中。所以，我也不必掩飾自己在重讀詩集時的激動之情。然

而，與其說詩集本身的作品引致我如此感動，倒不如說是夾在書中的記憶又一次襲擊我的胸膛。

輕撫詩集的扉頁，我不禁想起當年他坐在桌前簽名贈書給我的情景。在他的書房，我望著他取出一冊新印的集子，慎重寫下他的名字在扉頁上。從讀他的第一首詩開始，我便決定收集他全部的作品。如果說，是他的詩陪伴我跨越整個荒涼的青年時代，並不是誇大的說法。即使是到今天，我仍然承認他寫下了不少可以傳誦的好詩。在與他同輩的詩人中，至今仍不易找到幾位如他那般，把生命全然奉獻給詩，虔誠而又專注。從認識他的那年開始，我便這樣相信著。這也是當年他要贈送詩集時，我難以隱藏心中的喜悅。

與詩人認識，是從通信開始的，那年我才度過第十八個生日。他剛從海外歸來，充滿了憤怒與改革的心情。如果我沒有算錯，我們認識時，他正值壯年的三十六歲。他的詩風剛剛結束他自謂的新古典時期，從柔情哀艷轉變為陽剛雄美。幾乎每當聽到他有新作發表，我便刻意去尋訪。即使是刊登在一冊發行不廣的詩刊上，我也會輾轉索求。讀他的詩，是我的一個慰藉。更確切的說，他的詩是一種激勵，一種鞭策，一種指引。

在六〇年代後期的台灣，文壇的風氣是苦悶的、沉滯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一股求變的力量正在隱隱醞釀。那是從封鎖過渡到解放的一個時期。小說中，我漸漸接觸到一些社會寫實的作品，這些小說作者後來在七〇年代都躍為領導人物。在詩方面，我僅注意到幾位特定的創作者，而詩人是其中的一位。別人的詩風，年輕人都可以模仿得唯妙唯肖；只有他

的，卻獨樹一幟，很少看到成功的追隨者。然而，我之耽溺於他的詩，並非只是他在詩句上的鍛鍊手法，我著迷的是他詩中隱藏的一顆良心。每次打開的詩集，我確定可以感受到一種呼喚在引領我的靈魂。

有幾場詩朗誦會，他站在燈光下緩慢而安詳誦讀自己的作品。那時，我會在內心默默跟著唸出他的句子。因為，他那幾年的詩，我大多能夠記住。在寂寞的少年心靈中，我彷彿可以從詩句找到自己的依靠。廳堂中迴繞著他磁性的聲音，吸引我去認識什麼是愛情，什麼是苦痛，什麼是時代的悲劇。他也領我去探索一段曲折的歷史，一些難解的神話，一塊遙遠的土地。我可以體會到他心懷許多難抑的情緒，我看到一顆掙扎的生命，想要打開政治悶局。他也有許多夢想；他說過，當他死時，願意聽到長江兩岸升起的音樂。我總是感動於這樣的詩句，縱然他描摹的那些水田阡陌，對我是那麼空幻而不著邊際。

我常常去叩訪他的書房，我也喜歡看他整潔的原稿。他若有新作即將發表，而我恰巧出現在他的書房時，他會讓我做第一位讀者。在那墨跡猶新的稿紙上，我自信我能夠讀出他的心情。他是在西方文學訓練中成長的詩人，但他從不排斥傳統。就我當時的認識來說，他是少數幾位能夠把西方和東方做最恰當結合並表達的詩人。在六〇年代以降的西潮衝擊之下，有不少文學工作者迷失了，搖擺了，墮落了。我彷彿看見他舉起一枝有力的筆，抵抗著外來文化的各種侵蝕。他的筆，不是匕首，也不是投槍，而是一個指針，好像在告訴我如何去確定一個方向。

我後來嘗試寫下一些讀詩心得，那些雜感，不久就收輯成兩冊書。可以預料的，我的評集自然是以他的作品為重心。在文字解析的過程中，我慢慢摸索出什麼是好詩，什麼是泛泛之作。曾經有過一段時間，台灣盛行過一些難懂的詩。他們援引了許多經典，為這些神秘的詩辯護，那些辯護建立了不少理論基礎。然而，最後宣稱勝利的卻不是詩本身，而是那一堆疊床架屋的理論。在那些駁雜的理論中，我和我那一代的年輕人曾經以痛苦的心情去探險，但是我們總是找不到屬於我們時代的詩。

在那帷幕重重的現代詩裡，我認為他的詩闢出了一條新的道路。他勇敢地向當時晦澀的、虛無的詩挑戰，他的行動驅除了不少我對現代詩的恐懼。我那時急於要肯定他的詩，便是因為我對台灣的詩壇焦慮過。把他的作品放回那個時代，我認為還是具有特殊的意義的。我曾經預言過，以他發展的軌跡來看，他的詩風將會從古代走向近代，再從近代跨進當代。寫下那樣的預言時，我警覺到自己的感性已逐漸超過理性。我期待著看到他表現這塊島嶼的作品，把這塊土地上的苦難和歡愉都化為他的詩句，正如他以動人的意象歌頌他夢寐中的長江黃河。我不能否認，在後來我所寫有關他作品的評介中，感情的成分是相當大的。

感覺中，那幾年好像過得特別快，我發表的文字也出奇的多。我突然警覺到自己有一種茫然，有時在孤燈深夜，我不禁會質問自己：這樣寫下去，究竟在追求什麼？一位來自宜蘭的小說家，曾經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在寫什麼，你自己也不知道。」他說得很平淡，但對我卻是一陣驚雷。聽到這樣的評語時，我正收拾行囊，準備離開我的島嶼。那年，詩人也計

畫到亞細亞大陸南端的一個半島去執教。這好像是預告一個時期的結束。對詩，我開始產生一些幻滅。離開島嶼，真的是一個結束的開始。

現在回想起來，那樣的幻滅是可以理解的。從七〇年代以來，台灣開始遭受各種政治經濟的衝擊。在我的校園裡，我常常可以聽到憤懣的抗議的聲音。如果說那些聲音對我毫無影響，那是錯誤的。要求解開桎梏的欲望，時常在我的胸懷膨脹著。身爲一個愛詩的青年，我自然希望藉詩來發抒這種心情。我更樂於見到類似的作品，把土地的動盪具體呈現在詩中。

在那幾年中，詩人的作品更加圓熟豐富；甚至有幾首詩，我認為是無懈可擊的。但是在內心，我一直期望看到他寫出那時候的緊張現實，就像他在中年之前所寫的詩那般。如果他能夠對一塊遙遠的土地表達他的憤怒，那麼他對自己立足的土地，也一定懷有強烈的情緒。我從來不會苛責他的故國之思；相反的，我認為那是高貴的、可敬的情操。這也是爲什麼我一直相信，他會以同等的情操把島嶼寫進他的詩中。事實上，他也曾經以歌謠的形式，頌讚過甜美的島嶼。只是，我難以看到他詩中對危機動盪的台灣有所回應。在離開島鄉的最後一年，我發現我突然不能了解他。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他。到今天我還是認爲，他是我所認識的唯一忘年的朋友。他對自己的作品充滿了信心，但他不會驕傲。在這點上，我一直是很欣賞的。當他的詩在島上普遍流傳時，許多人讀出了他的名字；他總是懷著一份適度的謙遜。不過，當我對我的社會有了新的認識時，我領會到他的詩已距離我越來越遠。如果我的文章態度沒有改變的話，我想我仍

會全心去擁抱他的作品。

我深信，文學作品是一定社會的產物，這種觀點無關乎左翼或右翼。即使是一首情詩，都應該有它的現實基礎，何況是表現時代的作品。他令我迷惑的是，他對另一塊土地上的不公不義觀察得非常清楚，以至發而爲詩，吐而爲文。那麼他爲什麼看不到自己土地上的欺侮與凌辱？我並沒有理由要求他像其他社會寫實的作家那樣，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在社會的苦痛之上。我對穿制服一般的文學也是很厭惡的，我不可能苛求他加入現實作家的行列。我只是不能了解他對島嶼上的受辱受損，竟不表示任何的抗議，即使是一絲輕微的聲音。那短短一兩年中，我彷彿感覺自己置身於激流之中，浪潮洶湧拍打我的意志。我有著幻滅感，我看不到光。

懷著落寞的心情離開鄉土時，我深知自己的無力，我甚至有一種逃避的衝動。也因為那樣，我更沒有理由要求他寫出我想要的詩。做爲一個朋友，他對我的鼓勵與指導，一直是誠摯而真切的。在異鄉漂泊的最初幾年，我不時可以收到他的信件，有一次他還寫了一首詩贈我。他的叮嚀與召喚，使我在他鄉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溫暖。不過，我並沒有告訴他，我對詩已感到幻滅，而且已到了絕望的地步。我隔海瞭望自己的土地時，似乎能夠撥開迷霧看到我在島上的過去。我始了然自己是如何自囚，我的思考，我的知識，竟與島嶼没有任何的牽連。這種覺悟，使我更加感到那位寫〈看海的日子〉的作家所講的話之正確：「你在寫什麼，你自己也不知道。」

我偶爾也會拿起詩人的詩集細讀，隱約中仍有一股慰藉，但已不致令我感動得想寫下詩評。我企圖把自己從詩的國度放逐出來，因為我自認為在詩中不可能找到希望。我更不會認為，讀詩可以激勵我什麼。我必須承認的是，我和他的友情純然是建立在詩的追求之上；一旦我放棄對詩的信仰，我發現自己能與他對談的事越來越稀少了。這份友情若有任何過錯的話，那一定是在我，而不在他。因為我從來沒有讓他知道，詩已不可能拯救我。每思及此，我不能不感到歉然。我正努力把自己從詩中解放出來，我要改造自己。對於那塊宿過的、愛戀過的土地，我有太多的虧欠。我要補償失去的光陰，要重建被蒙蔽的歷史。如果那可以稱為我的新世界觀，那麼也正是那一份認識，攜我邁向新的年齡。我不免對自己的青年時期頻頻回顧，而我的回顧，卻是一種告別儀式。

我對詩的激情真正冷卻下來，是在一九七七年。詩人在那年寫了一篇短文，對台灣現實主義的作家做了許多不恰當的指控，這使我感到震驚異常，也使我陷於疑惑的深淵。他的詩沒有對台灣的不公不義發出抗議，我寧可認為他是以沉默來表示他的態度。魯迅說過，最大的輕蔑便是一語不發，而且臉也不別過去。對於他的無語，我也作如是觀。可是，當一場論戰的波濤襲來時，他選擇站在有力者的一邊，而且是那樣的毫不遲疑。這對我不僅是一個震撼，甚至也使我在其他朋友面前極為難堪。

直到今天，我仍然無法理解他是如何評估正義的。他所指控的幾位現實主義作家，永遠是手無寸鐵的。他們如何努力，也不可能釀造任何巨大的風暴，他們畢竟是社會的無力者。

他們所散播的現實主義精神，即使能夠有一番作為，那也將為台灣文學開拓一塊新的領土。樂觀其成已唯恐不及，又何忍提棒追擊？我也相信，文學的問題必須以文學的方法來解決，借用政治力量來干涉，是任何稍具良心的作家所不為。我更認為，今天台灣弄成這樣一個局面，有力者是應該負起全部的責任，如今嫁罪於幾位無力的作家，是很不公平的。捧讀他的短文，我有著難忍的痛楚。在苦悶深處，我想到三十六歲時候的他，以及他帶著憤怒心情寫出的詩和散文。是年齡改變了他，還是他從來都沒有改變過？我落入疲憊的苦思之中。

後來在報紙上，我讀到他參加文藝大會的消息，在主席團的名單中，我發現了他的名字。剩下來的，都成了歷史。我與他，已投向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已可預感，我不會再揮汗討論他的作品了。那次論戰，我一直是一個旁觀者，但我好像在沙場受傷了。我急於要在心房裡找一塊角落，為自己舔舐傷口，那是心路歷程上的一個頓挫。

我重新拾回對詩的信心，還是這幾年的事。在望鄉中，我看到一股新的詩的力量正在崛起。他們的詩風仍在摸索塑造之中，但是他們的作品確實是根植於自己的土地，他們向世界預告了一個新的道路。我並不覺得他們已經成熟，也不認為他們很從容。相反的，他們表現了一些過剩的急躁與緊張，他們的文字有時太過誇張，有時又失諸謙卑。這都無妨，至少他們具備了勇氣要反映這塊土地的苦難，這方面他們是很誠實的。只要繼續走穩這一條道路，我們相信他們一定可以建築一個牢固的王國，一個精神版圖極為遼闊的國度。我仔細閱讀他們的作品時，就像十八歲時在燈下翻閱詩集的我，懷著一股激情，雖然我的心情已不復年

輕。

時時，我還會忍不住檢討過去與現在。我認識詩人的那個時代，是一個苦悶封閉的時代；而今則充滿了危機動盪。兩個時代所產生的詩人，在性格上、精神上自然也自然不同。我對兩個時代都有偏愛；我比較相信的是，新的時代畢竟是充滿了希望。我恍然發現，我與我的舊時代是如此疏離而互拒。

對他的詩，我並未失去關心。這幾年中，我若在報刊上發現他的新作，仍會剪下來夾在他贈我的詩集裡。既然我已恢復對詩的信仰，我對他的所思所想還是很注意的。我總是有這樣一個奇想，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會與他不期而遇，那時我對他提出的問題，一定是離不開一九七七年的那次論戰。這次，聽說他路過我旅居的城市，我竟錯過與他見面的機會。這樣的交錯，我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心情極為複雜。

把手上的詩集闔上，一一放回書架。我，沉浸在無邊的回憶之中。

——《台灣文藝》，第九六期（一九八五年九月）

轉折

生命裡，總有幾位難以釋懷的人物。我的難以釋懷，並不一定能夠清晰牢記一位人物的面孔；反倒是對他的性格、精神或文字，特別感到不能遺忘。我對吳老的懷念，大約是屬於這種。在我的記憶裡，他的容顏始終都很模糊，縱然我曾見過他兩次。直到他去世之後，我才有機會從容端詳他的照片。許多複雜的記憶，也隨著他的遠逝而重視湧現。

我必須承認的一件事是，他離去當初，對我並沒有產生多少衝擊。我的冷漠，來自我的無知；而無知，卻曾經使我勇敢無比。在離開台灣之前——或更正確一點來說，在吳老生前——我對他其實是懷有偏見的。有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我以著少年時期建立起來的文學價值觀來衡量他。由於他的作品並不符合我的尺寸，我總是把他的書置放在我的視野之外。我曾經為自己擁有這樣的標尺而傲慢，而英勇，而自我膨脹。然而，也是爲了這份傲慢，竟使我對島嶼文學的認識至少遲了十年。如今回顧起來，我不能不爲如此的虛擲光陰深深感到傷

痛。傷痛使我清醒，也使我在漫漫十年之後，對吳老的告別人世開始有了悲意。年少時期的倨傲與輕狂，是多麼不可原諒。

我以偏見看待吳老，一如我以高度的鄙夷蔑視台灣文學那樣，十足反映了我昔日的幼稚和愚昧。最初接近文學時，我就被引導去瞭望島嶼以外的世界，彷彿自己的土地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情。在整個亢奮的求學過程中，我已習慣這樣的說法：台灣是一片文化沙漠。既然是沙漠，這塊土地豈非一無所有？我不會覺悟，台灣竟有歷史；至於台灣文學，我竟覺得這是一個可怪且駭異的名詞。這塊被視為荒蕪寂寥的島嶼，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吸引我的。懷著飛揚跋扈的心情，第一次觸及吳老手創的《台灣文藝》時，我突然覺得是可笑的了。心想，世間可有這麼瘦瘠的雜誌而又可稱為文學的嗎？那粗拙的印刷與設計，果真就在證明台灣確實沒有文學。從此，我更強化自己的迷信，如果要尋找具有雄心的文學，必得到台灣以外的土地去探訪了。

我未能理解吳老是以何種心情來辦這份刊物的。在西潮和夏潮氾濫的六〇年代，台灣的高級知識分子，已懂得坐在咖啡室裡談論西方的電影、戲劇，在地下流傳的，則是一些漏網的中國三〇年代文學。這些如今看來是多麼虛矯的風尚，當年竟是我膜拜追逐的目標。我刻意學習使用一些精緻的語言，來表達絲毫沒有切膚之痛的苦難。到咖啡室飲茶，嘗試以著憂愁的心情去關切我頗為陌生的事物。有時，在對話中，也夾雜一些英文詞句，那是必要的。有時，在討論存在主義之後，還得熱起心腸談人道主義。最後，為了表示自己還未失去批

判的精神，總是不忘回到「中國立場」來觀察問題。

我的六〇年代，可以說過得非常充實而滿足，至少在心靈上如此。但是，對我的土地而言，我其實是缺席的、逃學的。在咖啡室外的不知什麼地方，吳老正未曾倦怠扶植他的刊物。他沒有雄心，他忍得住寂寞。後來我才在一篇他的文字發現，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台灣文藝》的存在。吳老也不發出任何惡語，卻只是說：「我們的文學運動還須更加一層努力，更希望青年作家大力支持才有效吧。」在那迷離的時代，他就已有見識要把一份刊物當做文學運動來推廣，他仍自我檢討還不夠努力。然而，當時的青年作家呢？他們正挺著胸膛，遠眺太平洋彼岸吧。他們披著批判的外衣，卻飢不擇食汲取西方文學的養分。他們也戴著人道主義的面具，來發洩個人的苦悶情緒。他們有世界的立場，有中國的立場，就是沒有台灣的立場。吳老注定是要孤獨的，他需要青年作家來協助，卻不知道他們正在遠方旅行。他們眼中看不到台灣文學，他們的文章裡沒有隻字片語提到台灣文學。吳老，一位落在時代後面的文人，只能獨立於蒼茫的曠野裡。

吳老文學之受到注意，是相當晚近的事了。第一次細讀他的作品時，我已在島嶼的千里之外。那時，台灣鄉土文學正起步扭轉它的劣勢，向遠方瞭望的人，無論身在異域或在島上，都開始把焦點投在本土之上。手捧他的《亞細亞的孤兒》，我特別能體會台灣人在現代歷史中的遭遇。僅就這冊小說本身而言，它的命運就極為曲折了。這本書完成於太平洋戰爭中最激烈的時刻，吳老埋首撰寫之際，並不能預告台灣有一天能夠脫離帝國主義者的殖民統

治。此書之可貴，便是在非常的時代裡表現出台灣人的個性與迷失，把台灣人內心最徬徨的情緒發抒出來。沒有處在那樣的時代，就不可能寫出這麼深刻的文字。

讀完他的書，我始了然悽苦的台灣人是如何奮鬥、掙扎，而又如何挫折、失落。我似乎看到，我的父輩在扭曲的日子中活過來。深陷於錯綜複雜的歷史逆流裡，台灣知識分子只為了一個渺茫遙遠的原鄉，竟然失去判斷是非的能力，也長期失去確立自己方向的努力。他們不知道，原鄉並非是永遠不變的，更不知道他們所立足的新土地也已重新塑造了他們的命運。後來，一些有識之士就把台灣知識分子的這種徬徨心情，概括為「孤兒意識」。創用此一名詞者，想必也是在描述自身的境況吧。

戰後的台灣書生，很少有機會去了解自己的島嶼的歷史，我自亦不能例外。我初次接觸史書，是從中國先秦史開始的。雖然我專攻歷史，但我也與一般學子沒有兩樣，依照規定，必須沿著漢唐宋元明清一路讀下來。台灣歷史，往往輕易被拭去了。稍後，終於獲讀一些中國現代史的書。非常離奇的，所有台灣歷史書籍都毫不例外的止於「光復」，彷彿歷史演變至此便不再發展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歷史的真實，正如我從來沒有迷惑於我的中國立場。我的動搖，始於三十歲那年，讀完一冊關於一九四七年事變的紀錄之後。我的整個世界崩潰了，那種瓦解之勢，較諸初春的雪融更加不可抵擋。直到讀了吳老的作品，我才發現我的先人已有同樣的經驗；而他們的體驗，是蝕骨的，痛心的，不是任何文字可以替代的。

寫《亞細亞的孤兒》時的吳老，豈非是我三十歲以前的寫照？到了寫《無花果》時，吳老的世界觀已有巨大的轉變。從憧憬到幻滅，豈非是島嶼加速遠航的動力？吳老的經驗是主觀而具體的，而我的領悟則是來自客觀的事實。我更能夠想像出他的心情之挫折，從而體會了他日後奮發自主的精神之背後原因。讀完他的全部著作，我終於徹底覺悟了。原來台灣知識分子的內心，曾經存在著兩個中國：一個已經是死滅了的，另一個則從未誕生過。在現實裡，他們精心構築出來的中國並不存在。

死滅了的中國，是輝煌、榮耀而宏偉的。在古老的世界裡，那塊龐大的土地擁有七彩的寶塔、幽靜的庭園、豐饒的經典。多少動人的詩篇，多少哀豔感人的故事，在那苦澀的土地上孕育過、釀造過。但無論這些是何等燦爛，畢竟已成一段惘然的歷史。誕生在台灣的書生，只由於一個腐朽的權力者為了疼惜自身的利益，而被迫接受制式的教育，且必須緬懷一個不曾觸探過的天地。他們未能看到七彩的寶塔已經傾塌，幽靜的庭園已經損害，豐饒的經典已經泛黃。他們仍然在風漬漫漶的文字裡，隨著權力者的引導，追索一個死透了的盛唐。吳老在《無花果》裡便反映了這樣的心情：「台灣人的腦子裡，有自己的國家。那就是明、漢族之國，這就是台灣人的祖國。」這些話摻雜了吳老的悲痛，卻也是最真切的告白。無論他的慕情有多迫切、有多飢渴，他的倚靠終究要落空了。

在死滅了的中國的另一邊，也有一些讀書人掙脫了統治者的陰影，揚棄了古老腐朽的世界，那確實需要勇壯的心懷，只是，他們仍幻想著中國能夠依照他們的意志去改造，以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屬於人民的版圖。他們總是寄望海峽兩岸的被壓迫者，能夠攜手共同建立一塊

樂土。他們以著感性的字句，飛揚的辭彙，為台灣子弟描繪一幅藍圖。彷彿那遠景，已近在眼前。他們並不知道，那幅遠景僅是一塊布景，既不符合現實的台灣，也不符合現實的中國。他們也不會意識到，生活在台灣的知識分子，與誕生在中國的讀書人，對於樂土的要求並沒有相通的内容。台灣的命運，將依賴島上所擁有的智慧、思考與能力來解決。島嶼的願望，不是外人能夠體會的。同樣的，海峽對岸的知識分子，也將依照他們自己的願望，付出他們自己的血與淚，去追求他們自己構思的國度。倘若他們有著傷痛，那絕對不是台灣知識分子能夠分擔與療癒的。吳老的作品為我們指出，台灣知識分子想像裡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是全然不同的。

吳老毅然放棄這種幻想。他深知，他一度眷戀過的原鄉，很早就已消失在時光的長流。他依戀的書香，他擁抱的漢詩，他崇尚的禮儀，確實存在過——存在於遙遠的、文字記載裡的古國。他的憧憬，其實是一種神遊。一旦夢醒時，他只有喟嘆自己是歷史的孤兒。他走過的迂迴道路，恰恰是今日部分台灣書生正在重複行走。然而，吳老畢竟是幸運的；他所處的時代，把他搖醒。當他寫下〈南京雜感〉和〈黎明前的台灣〉，也正是他向陰暗的生命告別的時刻。在〈南京雜感〉中，他對死去的古國使用了一些稍嫌苛責的字眼，但那也意味著他幻滅之後所產生的悲憤。他的親身經驗，不能不使他表現了那樣的反應。沒有與他一起走過同樣道路的台灣子弟，是難以寫出那樣的文字的。在〈黎明前的台灣〉中，他以著溫厚的語言說，他能夠珍惜的、重建的，乃是他立足的土地。捧讀這些文字時，我彷彿望見吳老的碩

壯身影向我走來，彷彿要攜我走向再生的土地。

我對於從知識中、書籍裡接受而來的中國，並不具任何輕蔑。我仍如年少時期那樣懷著敬意，那畢竟是我先人所來自的地方。那文化古國綻放出來的花朵，也標示著人類智慧的崇高成就，我將全心擁抱。但是，這樣的擁抱並不一定表示，我在道德上有義務為不存在的中國負有責任；更不表示在感情上我必須與它結合。如果我不能為我的島嶼帶來絲毫溫暖，而卻只宣稱要改造中國，我是可恥的、卑鄙的、虛偽的。通過吳老走過的道路，我終於了解應該如何拭去那一份輕狂。

我自然也知道，那一份輕狂仍然瀰漫在島上一些角落。就在吳老離去之後不久，便立即引來一些遲到的、具有先見之明的議論。在六〇年代一度流浪且迷失於西方文學世界的青年，突然回過頭來對吳老進行缺席裁判。他們使用著比孤兒心情還孤絕的語言，指控吳老對中國的誤解。在那些貌似冷靜客觀的審判書中，他們選擇一些磅礴的、夢寐的文字來鏤刻空想的中國。循著他們的語氣，彷彿一個驕傲的中國已巍然塑造成形。然而，他們以這份驕傲為標準，來論斷吳老作品的得失。他們寧可從吳老的作品中選取一字一句，來證明吳老文學具有「中國的性格」。他們竟疏懶得不願去翻閱他的全部作品，來肯定吳老的台灣意識。他們善於借用吳老的文字，來為他們自身的政治立場辯護，就偏偏不肯站在吳老的時代來理解吳老的心情。

知識的惡用與歷史的濫用，恰如其分顯現在這樣台灣書生的議論中，他們憑著勇氣去詮

釋先人，猶如他們持著偏見去詮釋台灣農村。受到曲解的吳老，總是以「無花果」默默開花的精神自我期許，更以「台灣連翹」的堅韌生命來鞭策自己。在《亞細亞的孤兒》書裡，他第一次把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並放在一起，從容表達他的心境。每次讀到那裡，我就怦然心動：

「他一面玩賞無花果，一面漫步踱到籬邊，那兒的台灣連翹修剪得非常整齊，初生的嫩葉築成一道青蔥的花牆，他向樹根邊看看，粗壯的樹枝正穿過籬笆的縫隙，舒暢地伸展在外面。他不禁用驚奇的目光，呆呆地望著那樹枝，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邊伸展的樹枝都已經被剪去，唯獨這一枝能避免被剪去的厄運，而依然照她自己的意志發展她的生命。」

像這種高度象徵的寫法，在吳濁流文學中是極為難得的。他以台灣連翹這樣的圍籬植物來比喻台灣人的命運，求生的欲望不僅旺盛，不屈的意志也特別強烈。吳老以微言大義的勸告訴後人：「連草木也知道應該不違背自己的個性去求生存。」他對文學的追求，對歷史的探究，誠然都是懷抱如此的心情去撰寫、去糾正。

吳老離開人間已經十年。埋藏在灰塵裡的許多作品，至今才陸續見到陽光。這並不是說，從此台灣子弟就可完全瞻仰他全部的精神面貌。《無花果》一書仍然是統治者的禁忌，

仍然在隱蔽的地方遮掩了它的果實。縱然如此，在台灣文學中，吳老的作品是一塊重要的磐石，牢不可動。各種歪曲的言論，各種離奇的詮釋，都不能使他的精神受到污損。我這樣的感受，在漫漫十年之後，捧讀《台灣連翹》全稿時，益加強烈。

我懷念他從前的身影，懷念他緩緩消失在台北街頭人群中的蒼蒼白髮。也就在懷念加深之際，我對自己年少時的孟浪分外覺得後悔。然則，許多年輕的台灣子弟不都是這樣成長起來的嗎？像我們的島嶼那樣，方位被弄歪了，歷史也傾斜了。但是，經過幾番轉折，又終於認清了方向，迎濤前進。倘若我們注定要穿越多重的轉折，這也無妨。撥雲見日後的那份快意，當如北半球的海洋，那麼壯闊，那麼雄偉。

——《台灣新文化》，第五期（一九八七年一月）

一片冰心在玉壺 ——序陳永興《柏克萊沉思》

與永興訂交，始於他接辦《台灣文藝》之後不久。這份友誼是珍貴的，尤其是發生在我生命一段孤寂的時光裡。當許多舊識日漸向權勢靠攏，當一些朋友畏懼或訝異於我思想的轉變，當昔日的夢幻開始退潮，我與永興在加州見面了，那是一九八三年初夏。初次捧住他的手，便已覺得肝膽相照，無需更多的語言來詮釋。

《台灣文藝》的成長，有其辛酸的歷程。猶如我們島嶼的命運那樣，只因為叫做「台灣」，便不斷受到阻撓、歪曲和誤解。從荒涼的吳濁流時代開始，再經過鍾肇政的艱苦經營，《台灣文藝》交到永興手上時，已卓然成爲一份不可輕侮的文學刊物。它代表了台灣文人的抵抗精神——抗拒了權力，抗拒了外來文化，抗拒了物質的腐化。今日的台灣子弟，似乎難以想像刊物創辦之初的寂寞與蕭瑟。倘若當年這份雜誌掛上「華夏」之類的商品招牌，它也許能夠源源獲得權力人物的資助也未可知。然而，《台灣文藝》終究延續了一定的歷史

傳統。它的命名，強烈沾染了這塊島嶼的性格：質樸、堅毅，且帶了一份孤高的傲慢。

永興決定接下《台灣文藝》的棒子時，想必有他的膽識與信念。一個雄渾的民主政治運動，如果要埋下牢固的磐石，就必須要有一個相應的文化運動來配合。缺乏人文背景的政治運動，最後都無可避免要流於吶喊，並且也要全然淪亡消失。「藝術發展乃是每一時代生命力的最高測驗」，這是一位俄國政治家說的。槍桿、標語、暴力，是不可能播種收割的。五十年的日據殖民史，四十年的戰後政治史，已經確切證明了這點。只有在歷史種子——一粒有根鬚的種子埋進土壤之後，才有可能開花，進而長出茁壯的本幹。任何外來強權在一塊土地上宣稱勝利，都注定是徒然的。

《台灣文藝》正是這樣一粒種子。對台灣社會運動極爲熟悉的永興，必然也瞭解《台灣文藝》所具有的歷史象徵。當這份台灣文人精神所寄託的雜誌需要注入新血時，永興慨然承諾接辦任務。然而，他之所以要延續《台灣文藝》的命脈，並非只是要爲政治運動搖旗聲援。文學，畢竟也有它更高層次的莊嚴意義。在新舊世代的文化傳承上，在精神與物質的結合上，在人民靈魂的提升上，文學刊物擔任了比政治運動還更吃重的使命。永興在接辦後，就立即提出了「台灣文藝復興」的主張，豈非就是基於這樣的認識？

後來我才聽說，在接辦之初，一位導師級的文學家不惜親自過訪，力勸永興放棄對此刊物的支持。這位向以帶著人道主義表情著稱的導師，自然不忘使用溫厚誠摯的語言來疏導永興的「閉塞」。但是，永興不爲所動。稍後，被推許爲「海岸兩岸第一人」的這位作家，便

不辭辛勞，四處數落《台灣文藝》的不是。再過不久，導師更加熱情洋溢，勸告文學前輩楊逵先生退出雜誌的贊助行列。

我寧可不相信有這樣的故事發生，這位一度讓我尊敬的作家，不會不知道《台灣文藝》是如何辛苦創辦出來的。無論以第三世界文學的理論來檢驗，或是以弱小民族的眼光來看待，《台灣文藝》是應該值得鼓勵扶植下去的。在台灣民間的草根文學裡，或因時代的變換而使一些前行代作家凋萎消失，或因權力的壓制而使新生代作家難以成長，《台灣文藝》的出現，適足為台灣文學的重新出發建立一個據點。協助它已唯恐不及，又何忍扯它後腿？

那位導師的心情，原是可以理解的。只為了一份年少時期被灌輸塑造出來的「父祖之國」的情懷，而使他對未嘗觸及的遙遠土地總帶著一份浪漫的、傷感的夢幻。待他年長以後，也只為了發現那份夢幻之日漸縹緲，遂無端對任何強調以台灣為主體的見解產生莫名的仇視；從而對具有本土意識的《台灣文藝》釀造出一股敵意。彷彿只要能矮化台灣意識，就能獲得一絲快感，並且也獲得一些心理的補償。他十年如一日疼惜著那份孺慕之情，原是值得同情的。縱然那始終是一股青澀的、稚嫩的情緒，但畢竟是昔日「亞細亞的孤兒」殘留下來的傷口，畢竟代表了台灣歷史上的一個錯誤。然而，也正是為了這個傷口所反映出來的稚嫩，就更加使得全體台灣子弟有責任來包容、分擔且治療了。

在苦撐雜誌的期間，永興面對了許多流言與壓力，不僅是來自帶有敵意的作家，而且也來自酷嗜製造神話的權力者。永興從未性急而陷於挫折，也從未悲觀而輕言放棄。他把一份訂戶只有五百的文學刊物，發展成為島內外一致矚目的雜誌。在本土意識仍受當權者壓制的今天，永興投下的心血是極為可觀的。因為有《台灣文藝》的存在，使得流浪在海外的許多台灣人，對本土文化的繼承、重建與發揚，有著更大的信心。也因為有《台灣文藝》的存在，使台灣人能夠在關心政治運動的同時，也進一步注意到文化的問題。

距離一份理想的、高水準目標的刊物，《台灣文藝》自然還是很遙遠的。不過，在一九七九年我們的島嶼受創之後，這份刊物給予不少人心靈的慰藉。這曾經是一個以淚洗臉的時代，但振作的心不容淚水淹沒。永興主持《台灣文藝》時，便是鼓勵更多文人加入行列，讓沉默無語的台灣再度發出聲音，讓傷痕縱橫的土地重新長出新芽。在他全心奉獻的背後，可能沒有一個龐大的理論在支持，他也沒有興趣去建構一些貌似雄厚實則空虛的理論，他具備的只是一顆關切的、奮發的心。對文學理論陌生的他，從未夸夸然談一些創作的道理，但他知道如何去鼓勵作家介入社會、關心社會。

我與永興相處較久的時候，是他到柏克萊進修攻讀的一年。幾乎每週都可以與他見面，也因此對他的待人處事有更深刻的瞭解。身為一位醫師，他對美國社會的觀察，往往有獨到之處。一般人習以為常的事，例如校園裡反核、反南非種族歧視的示威，對永興來說，都具有不平凡的意義。因為，他能夠立刻聯想到台灣人權的問題。又如美國公共汽車對殘障人士的照顧，也能引發他對台灣社會福利的評論。在加州大學一年，他充分嘗到了什麼是思想自由的滋味，但也使他認識到，台灣過分依賴美國會產生怎樣的後遺症。遠在千里之外，他的

思考與談話，都很少離開過我們的島嶼。

有幾次，我與他曾經沿著舊金山海灣的公路驅車奔馳。如果是在夜晚，他會很沉默望著窗外的燈光。他一語不發時，我就知道他陷入沉思，思量著懸在北回歸線上的那塊島嶼。他有時也會告訴我台北的人與事。談到人物時，他絕少議論朋友的長短。他寬宏的心胸，包容了各種不同性格的朋友，而他往往強調他們的優點，推崇他們的人格。我與島嶼隔絕十餘年之後，仍然能夠認識那麼多朋友，無疑都是透過他的介紹。談到事件時，他往往懷著反省的心情。他關心的層面極為廣泛，作為一位醫生，他觀察的並非只是醫療問題；他也注意到政治、社會、文化等等方面的演變。我發現，他特別突出人的尊嚴的問題。因此，每當論及人權時，他並不窄化在政治的層面，他同時也落實在經濟人權、醫療人權的實踐上。

他的政治立場是很鮮明的。討論到台灣意識時，他從不通融讓步。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成為台灣沙文主義者。他不會盲目尊崇台灣的一切；他不像中國意識論者那樣，錯誤都是別人的，唯有自己才是崇高的、潔身的。永興常常以沉痛的心情來檢討台灣人的民族性格，在公開場合，在私人聚會，他的批判總是比任何人深刻。他的語言，有時令人痛徹心肺，而他自己也痛得淌出眼淚；而往往就在那時刻，他最清醒，衆人也最清醒。

今天夏天，我與他從洛杉磯開車回到柏克萊。進入灣區時已是夜晚，而暴雨驟降。他突然興起，爲我唱了台灣民歌。他的聲音低沉，一如他往常的心情。到現在，我仍然忘不了他的歌聲，也忘不了車外的雨聲，因爲那時我覺得是多麼靠近台灣，彷彿長期壓抑的思念，都

在他的放懷中抒發出來。我特別懷念中的永興，是他感性的一面，那才是他的真性情。

他離美返台之後，我記得在給他的第一封信說：「我們畢竟不能在感傷與感動的情緒中過日子。」我所指的，是與他的別離。回到台北以後的永興，仍然辛勤工作，仍然辛勤寫稿，他是我所看過的，少有的患了「工作狂熱症」的人。也因為他的埋首，我才看到了台灣年輕一代的信心與希望。他走時，我做了承諾，明年夏天我將與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見面。我知道，我一定會實現返鄉的願望。現在我已預見到，在炎炎夏日，我將遇見一顆冰潔的心。

——《台灣公論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傷痕書 ——致宋澤萊

1

別後三年，雖未嘗互通音信，但是從友人處，我仍可斷斷續續獲知你的消息。我確曾為你憂慮過一陣子；就在完成《福爾摩莎頌歌》之後，你突然閉門沉默了。關心你的朋友之中，有的說你已經開始消極，有的說你準備再出發。眾說紛紜，惟關切之情則一。我當然知道你正進入修禪的階段，而並未全然超凡入聖。我只是擔心，縱然你鬥志如昔，會不會從此就放棄以文學形式來表現你的生命？

去年夏天，我正在美國東岸旅行，在新英格蘭與巫永福先生相遇。友人特地託他攜來一冊你的新作《廢墟台灣》。經過漫漫三年的沉寂，你又恢復撰寫小說，於我自是一番驚喜。

巫老交給我之後，我立即忘了旅途的疲憊，漏夜捧讀你的新作。我才發現，我的憂慮是多餘的。令我訝異的是，你的筆鋒並未因兩三年的閉門而稍減銳氣。我甚至以為，這冊「虛構」的作品比起你過去的小說，還更具人間性。我不能不承認：你的面壁，證明不是自我放逐，而是「思想改造」去了。

其實，在閱讀《廢墟台灣》之前，我就看到你為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所寫的序：《人權文學巡禮》。那時，我已感知你正在確立一個方向，一個跨越禁區的新方向。後來，《島上愛與死》被權力人物打入禁林之列，這對我已不是意外的事。你提出「人權文學」一詞，可以說為一九七九年以降的台灣文學，找到了一個明晰的性格。台灣新文學的傳統，本來就是追求人的尊嚴的傳統。在進入八〇年代的關頭，這種追求的欲望更加強烈升高。

在幾次公開演講中，我曾經把這段時期所產生的一些抗議文學作品，稱之為「美麗島傷痕文學」。我的意思是，一九七九年冬天，對台灣的政治運動與文學運動，都是一個轉捩點。歷史的腳步，猶如人類的道德，確實演進得相當緩慢。在歷史長流裡，要找出一些重大的轉折事件並不是容易的。然而，當那事件發生之後，我強烈感受到一陣洶湧的潮流已然襲來。這種震撼在我過去三十餘年的生命中並未發生過。我也知道，這樣的經驗並不是我才有的；在我同輩的以及前後輩的朋友中，都承受了同等的震撼。歷史中沉默的台灣，終於因這次震撼而發出了聲音。我第一次聽到我內心的獨白：「我的土地醒過來了，振作起來了。」

那股潮流，改變了不少人的命運，也接來了不少新的希望。我看到許多作家開始有了焦

慮，因為他們終於警覺到島嶼的危機。這種情況在十年前是罕見的，至少在過去很難看見文學作品那麼迫切、果敢而直接去觸探島嶼的命運。能夠鼓起勇氣去面對危機，就會產生希望，縱然那危機是長期不公不義累積下來的結果。在不公不義的土地上，有人代替受難的山河去坐牢，也應該有人代替坐牢的人繼續發出聲音。一九七九年之後的文學方面，大致是這樣確立的。航向太平洋的台灣，漸漸在迷霧裡尋找自己的方位。我並不會因為這樣的急遽轉向而欣喜，但我確實感到樂觀，並且使我對島嶼的信心更加牢固。

我把這時期的作品界定為「美麗島傷痕文學」，似嫌消極；我寧可使用你所說的「人權文學」。因為它的涵蓋面比較廣泛縱深，它暗示了台灣文學抗爭的、落實的、積極的精神。要談一九七九年之後的人權文學，年輕世代的文學作品是不能輕易忽視的。像陳列、劉克襄、林文義、阿盛的散文，林或、楊渡、廖莫白、苦苓、向陽的詩，吳錦發、林雙不的小說；他們以平實的文字，為台灣文學開拓新的版圖。讀他們的作品，我隱隱約約可以感覺到他們正在領航，航向一片開闊的天地。我認為這些作品的最大特色，便是沒有夢幻；而更重要的，他們的文字都懷抱了一份深沉的關心。他們並不迴避流淌在島嶼上的眼淚與血汗，他們也勇於記錄台灣社會裡的冤屈、抗議與憤怒。在贏回台灣人的尊嚴上，在塑造台灣人的形象上，他們的作品代表了一個起點。

2

我讀你的〈廢墟台灣〉，是在盛夏，而我的背脊卻是涼涼的，暗自滲了不少冷汗。在這冊小說中，我看到的不僅是物質腐蝕的台灣，而且也是精神死亡的台灣。我不免自問：台灣人果真要在滿足的狀態下自我消滅嗎？我深深吶喊著。後來我在我編輯的〈台灣文化〉上，寫了一篇社論，題為〈廢墟台灣〉的震撼。我不能不這樣提醒旅居在海外的台灣人：「多少年來，我們已習慣於在海外表達強烈的懷鄉欲望，習慣於在異域回憶甜美的島嶼時光。如果說，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在海外堅強活下去，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島鄉的倚靠在支撐；那麼，若是把這塊島嶼奪走或毀滅，海外台灣人是不是還這般果敢而堅強？」我懷著一份恐懼：一旦台灣在人為的災難中淪亡，在歷史上被稱為亞細亞孤兒的台灣人，在未來的世界恐怕繼續要被迫扮演世界流民的角色。這樣的恐懼，你自然感受得比我實際真切。

有時，我覺得文字的力量是多麼微弱，微弱得使我陷於困惑，產生懷疑。知識分子使用多少文字去呼籲吶喊，只為維護一塊清潔的土地；但是，一個工廠排洩一次污水，就可毀掉文字工作者的許多努力。作家耗費了多少心血去爭取人權，即使只是為了獲得微不足道的發言權；但是，有力人物下達的一次監禁令，就可奪走多少尊嚴與思考。在另一方面，我卻又看到新生代作家在頓挫中辛勤不懈，逆風挺進，他們的勇氣與毅力，使得文字又變得巨大如磐石，也使得權力者看來是那麼渺小、那麼猥瑣不堪。

在你進入《福爾摩莎頌歌》時期之後，我就知道你已開始遭逢無數看不見的壓力。我喜歡那些歌謠，在海外有不少人在傳誦宣揚。我認為這些作品有的可以流傳久遠，有的則失諸粗糙；但總的看來，還是豐收的。這需要更多的篇幅來討論。我要說的是，無論有人是如何不喜歡你的作品，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些歌謠有其一定的時代意義。對於那些值得傳播的詩，我希望有一天能夠予以從容解析；對於那些失手之作，我仍然承認它所表現的時代價值。讀這些詩，必須先探索產生的背景，在那黯淡淒苦的日子裡，在草木皆兵的境遇中，你悠然唱出的歌聲，不知撫慰了多少受創的心靈。對權力人物來說，他們並不在乎你詩藝的成敗；他們感到難以忘懷的，是你對美麗島的歡呼與頌讚。在他們眼中，美麗島是多麼可懼，因為他們從來不屬於美麗島。詩人對自己土地的謳歌，原是尋常的事。不尋常的，是你選擇在最不恰當的時候譜出最不適當的調子。問題就出在這裡。

知識分子在權力之前低頭，是可恥的；而這種可恥的事，已成為我們土地上的一種傳染病。這幾年來，有太多的讀書人在權力人物的眼色之下，靠攏或靠邊，幫忙或幫閒。你有資格鄙視這種人物，因為你與他們一起呼吸同樣污染的空氣，一起馱負等量的畸形體制。我遠在海外，只能暗自喟嘆。縱然我也身受一些長臂的壓力，但那種壓力與你親身經歷的相較之下，已不足掛齒了。

你正選擇走一條艱難的道路。你要把可恥的、羞辱的、受害的都記載下來，而那需要兩倍的勇氣。你也要把芬芳的、不朽的、奮鬥的都保留下來，而那需要兩倍的愛心。我必須承認，你的頌歌曾經幫助我度過許多寒流的時光。彷彿在腐朽的邊緣，我嗅到薔薇的幽香；在絕望的谷底，我看到迎風的陽光。一如捧讀其他年輕詩人的作品，有一種顫慄，把我的心靈搖醒。

3

你曾經說，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對年輕人是一個很重要的再啓蒙。這是我承認的，跨過那一道分水嶺，我們終於認識了什麼是神話，什麼是現實。我常常把那一年當做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經過那次巨大的衝擊，我對台灣文學抱持了更大的信心。

許多分歧的路，就在我們面前等待選擇。有時我們很焦慮，走到分水嶺之後，應該繼續走怎樣的路。我深知，你不停從事著思考，這點從你在一九八〇年以後所寫的文論就可看出。只是我們需要以更從容的心情去探索，探索什麼是落實的、什麼是落空的。這正是我要與你討論的。

今天讀了你的〈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心情頗不平靜。此刻，北美洲仍然滯留在冰雪的嚴冬，而我內心卻有一陣燥熱。在我讀過你所有的文論中，寫得最好的是K君的〈文學體驗〉，然後是〈文學十日談〉。現在這篇文章，竟然使我的思考展開激辯。我之所以感到燥熱，甚至近乎心焦，原因在此。

你一方面評介林雙不的小說，一方面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我應該坦白說，你的評

介是成功的，而檢討則不免失誤。整篇文章的結構，好像是由兩種文體結合而成；一邊是狂風暴雨，一邊是行雲流水，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我第一次看到你使用這麼多生氣的文字，我寧可說，那是一種義憤；但我不能不指出，義憤並不能代替批評。如果你能夠冷靜解說林雙不的小說，那麼你何不也平心討論你心目中的老弱文學？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勸你回家去喝你的稀飯。我只是想提醒你，在你檢討的字句中，有些是事實，有些不是事實；有些是文學批評，有些不是文學批評。因此，在讀完全文之後，有些是我同意的，有些我不能同意。

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基本上完成了一個重要的任務，那就是把官方文學與民間文學清楚區別出來。這種劃分，乃是長期「文藝政策」執行之後的一個自然結果。論戰之後，台灣文學的發展有了新氣象，最顯著的一個趨勢，便是作家與土地有了密切的結合。曾經有過這樣一種說法，鄉土文學論戰是屬於特定某些人的私有物，若是有人在那段時間不說話而今才出來討論，那就是「攘竊果實」了。這種聲音，使我首度認識了什麼叫做「島氣」，雖然他們自稱有著寬廣的視野。

在鄉土文學的陣營裡，也開始產生一些變化。遲至一九八二年，我才聽到有關南北分派的說法。後來有關宗派分立的傳聞逐漸明朗化，原來就是圍繞著「本土文學論」與「第三世界文學論」的紛爭。到今天，對於這項紛爭的起因，我仍不甚了了。對我而言，談第三世界文學，一定是包括了本土文學；而討論台灣本土文學，也必然難以脫離第三世界文學的範疇。思索這些問題，原就無需援引太多的理論；只要對台灣文學的性格與特質稍有瞭解，兩

種說法應該是並行不悖的。

但是，強調第三世界文學論的作家，卻有一種可怕的基本假設；他們認為，如果有人主張台灣文學有其本土性與自主性，那就是站在與中國文學對立的立場。他們甚至進一步發揮想像力說，提出台灣文學本土論的作家，具有「反華」的傾向。在這種虛構的假設與想像的支持下，他們很滿意的獲得一個結論：台灣本土文學是一種「分離主義文學」。緊接著，他們又不辭辛勞去演繹：分離主義者與美日帝國主義有著「複雜而細緻的關係」。

這樣的推理，大約就是台灣的馬克思少爺所能指控的全部內容。誠如你說的：「他們自詡的左派思考是假的。」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公開宣稱自己是左派，他們只是酷嗜使用一些擬似科學分析的字眼，在必要時夾雜一些「階級」、「矛盾」的術語。如果考察他們的生括模式與思考方法，他們只不過是「左言右行」罷了；一如他們自稱的，是非常非常「小知識分子」的。

把「分離主義」一詞引入文學批評的領域，不僅是惡意的，而且也是可鄙的。更不客氣一點來說，「分離主義」一詞之所以能夠在文學批評裡蠻橫使用，甚而使得被批評者因顧忌而未能辯駁，無疑是藉助了統治者構築的閉塞政治氣候。他們鑄造「第三世界文學」的名詞，從來並沒有虛心認真去認識研究第三世界的文學內容，而只是爲了迂迴曲折證明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這本來也沒有什麼可以爭吵的；設若他們有足夠信心的話，其實把台灣文學逕稱爲中國文學即可，而不必如此吞吞吐吐。但是，在他們內心卻始終有一魔障，那

就是在台灣文學之外必然還有一個正統的中國文學。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文學是正朔，台灣文學是庶子，於是他們不得不擬出這樣的字眼：「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把台灣文學叫做「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爭辯的，只是這樣的命名非常誤導，彷彿除了「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之外，還有「在台灣的英國文學」、「在台灣的日本文學」……。

誠然，他們如此辛苦命名也是有其理論根據的。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文學有其特別，例如東北有東北文學、上海有上海文學。這種說法當然也可以成立，但為什麼他們沒有把這些文學稱為「在東北的中國文學」、「在上海的中國文學」？為什麼談到台灣文學時，他們就變得如此繁瑣複雜？事實上，他們也很清楚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的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在性格與精神上有所同，也有所不同。相同的地方，乃在於台灣與中國都同樣遭到帝國主義的侵害；不同的地方，則在於雙方各自發展出歧異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這種歧異，正是台灣文學的特質。

台灣本土文學論者，從來沒有要在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製造對立，而只是指出，台灣文學與島嶼的命運有著休戚相關的連帶感。倘然台灣文學意識因根植於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而與其他地區反帝反封建的立場恰巧一致，台灣文學家不必因此感到心虛，而以為受到其他地區的領導，或是附庸於別人的政治運動陰影之下。倘然這種意識因建基於本土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上，而恰巧不同於統治者長期刻意灌輸的政治意識，台灣文學家也不必感到心慌，更不必因此有不潔不德之感。從史實來看，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原是平行發展的。從經

濟學、政治學來考察，兩地從未密切結合過。既未結合，何來分離？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這些擬似左派思考的讀書人，基本上沒有離開過「只有中國問題而沒有台灣問題」的格局。如果你專注於討論台灣史，他們就雍容發言了：我們應該還得從全中國史，從亞洲史，從世界史的關聯上面作好台灣史的定位來考察問題，才不至於陷入自己的小「框框」。這種說法本來就是顛撲不破的，但問題出在這些人從來就沒有把他們研究中國史、亞洲史、世界史的成績公佈出來，始終都只停留在作文比賽的階級。他們勇於說這種話，原因無他，只不過爲了指控研究台灣史的人是陷於小框框罷了。

今天台灣史研究面臨的問題，不在於所謂中國史的觀點或是世界史的立場，而在於不是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來談歷史。在台灣，研究台灣史者始終在高壓之下爭取發言權，他們企圖打破各種禁忌神話，希望能看到台灣史的真相。但是，第三世界文學論者對於爭取歷史發言權並不感到興趣，他們寧可採取中原本位史觀來模糊台灣歷史或台灣文學的特性。

如果說，他們堅稱台灣史必須放在中國史的脈絡來考察，那麼他們應該有足夠的能力從社會學、經濟學的觀點來證明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是一體的。令人抱歉的是，他們也從未在這方面表現他們的能力，他們理解的程度往往只停留在這樣的史實上：「鄭成功收復台灣」，「滿清在台灣建省」，「一九四五年後台灣變成中國的一省」。這種粗糙的理解，絕對不是政治學的，也不是經濟學的，更不是社會學的，而是不折不扣的帝王學。

所謂鄭成功收復台灣，或所謂滿清在台灣建省，從統治者眼光來看，誠屬美事。然而，這

種帝王史觀往往忽視了台灣人民在鄭氏王朝與滿清政權下被壓迫的真相。在中原本位史觀的支配下，似乎只要強調台灣土地與中國是結合在一起的，則開拓者的痛苦與折磨都變成次要的了。至於鄭氏王朝與滿清如何在台灣留下殖民體制，帝王史觀者就興趣索然了，因為這不是他們討論的重點。

爲了維護其帝王史觀的完整，他們更使用一種惡意且近乎輕佻的語言說，台灣文學本土論者是主張「台灣文學的分離運動」，又說分離主義者與美日帝國主義者有著「複雜而細緻的關係」。至於如何複雜，又如何細緻，他們無論如何是不肯說清楚的。他們竟然忘記，在近代史上擔任帝國主義代理人，出賣台灣人民利益的，恰恰是一些販賣中國意識論的統治者。這種公然的史實，既不複雜，也不細緻，他們不但視而不見，卻反而回頭羅織不斷在爭取發言權的台灣意識論者。有什麼批評會比這樣的指控還更殘酷、還更虛偽的？

4

與你提起這些，主要是因爲你的文字使我有聯想；聯想到台灣讀書界流行的一些迷惑的現象。這些年來，我常常聽到年輕的知識分子被指爲陷於「思想的貧困」，說這樣的話的人當然是以導師自居了。使人納罕的是，這樣的導師在思想的表達上，卻總是貧困的，苦澀的，甚至零落得很。相對於思想的貧困，當然就是暗示自己思想的豐饒與富有。但是，他們卻又那麼吝於施捨，以致讓人們要一窺他們的思考，竟感到困難異常。我也不只一次聽到，

台灣作家被指控「使用方言」、「中文不通」；但很不幸的，這樣的指控者卻往往寫出日文式的，甚至是洋文式的字句。這種惡化的情況，於今爲烈。我當然也看到有人在努力批判「消費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的行動卻又在證明他們是「消費社會」的中流砥柱。諸種矛盾現象，自然使我不能不陷於迷惘。我的大惑不解，無以名之；也許以「思想的貧困」來概括，庶幾近之。

貧困，是這個時代的象徵吧。大家都在尋找出路，卻又困頓於政治的悶局。在尋找的過程中，就不免出現一些空想的理論。你對假左派思考的失望，我是可以理解的。你說，「他們最特殊的一點恐怕是在統一思想上做功夫。」在這方面，他們所下的功夫不可謂不大。他們往往毫不疲倦地用雙重標準來談台灣與中國。離奇的是，他們對這套雙軌式的「方法論」卻怡然自得。例如，他們對台灣意識的剖析，使用的就是這樣的說法：中壠鄉下客家村莊，或外省退伍軍人下層窮苦人家，不會同意台灣的經濟生活和他們是共同體。他們的意思是，台灣意識是中產階級的福佬人提出來的，根本得不到下層人家的認同。然而，一旦提到中國意識時，他們的社會經濟學又有了新的原理，而使用另一種口氣說：台灣農村是磅礴的中國意識的據點。換句話說，中壠農家並不認爲自己是屬於台灣經濟生活的共同體，卻反而認爲與台灣海峽對岸的經濟生活是一體的。

類似這種空想的分析，確實足夠反映台灣思想界的貧困。這些人之所以這麼容易暴露弱點，主要是他們過於緊張要把政治信仰當做客觀知識的代用品。信仰，是至誠的事，是不容

輕侮的。對他們的信仰，我始終懷有高度的敬意。只是，這幾年來，我目睹了他們一方面無限膨脹虛構的中國意識，一方面卻又勤勞地矮化甚至分化台灣意識論者。這使我對他們的信仰與知識不能不產生疑惑。

台灣問題，或縮小一點來說，台灣文學問題，誠然需要一個更寬闊的視野去探討。這是行動實踐的問題，而不是作文比賽的問題。十幾年來，我在中國歷史與中國新詩上嘗試做一些研究的工作，自然也是爲了採取一個較爲超越的立場來看台灣。事實上，我也花了部分時間，在俄國史、英國史與美國史方面探索。我不敢說這就是朝向寬廣的視野；但是，我越來越感覺到，當我把思考的觸鬚伸展出去之後，我的台灣意識就更加牢固遼闊。

我常常比較台灣新詩與中國新詩的發展，就可發現雙方歷史演進的軌跡是不同的，台灣新詩從開始就與政治運動結合在一起了。在反帝反封建的覺悟上，台灣詩人起步得相當早。中國新詩的起點雖然定位於抗議的五四，但考察詩的內容，他們在反帝反封建的實踐工作上，並沒有台灣新詩那麼強烈。在二〇年代，台灣的謝春木、賴和、楊華、楊守愚、王白淵，都具備了抗日的精神。但是，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如朱自清、徐志摩、李金髮、周作人、冰心、馮至，他們的詩大多停留在個人的抒情。無論他們是屬於浪漫詩派或象徵詩派，以至屬於自由詩或格律詩，顯現的精神不大同於台灣的新詩。到了三〇年代，特別是戰爭來臨的前後，雙方發展的情況就完全倒置過來。台灣新詩突然趨於纖細精緻，這點在風車詩社的作品中表現得最爲徹底。然而，在中國方面，詩風不變，詩人集中於反映現實，至此反帝

反封建的聲音才大大提升。從艾青、田間，以至何其芳、卞之琳的詩，都呈現了這樣的色彩。

舉這個實例，我想說的是，台灣與中國新詩的發展，不是誰領導誰的問題，也不是誰是主流誰是支流的問題；而是雙方的發展是平行的、並存的。雙方之所以有歧異，主要是因爲台灣的環境使台灣詩人不得不走那樣的路線；同樣的，中國詩人的感受來自他們所處環境的引導。今天，在台灣討論文學史，出現的一種現象，便是離開事實與內容而專談意識形態。好作議論的結果，當然就只強調輸贏，而不辦真僞了。

5

文學事業，不在得失勝負，而在成敗優劣，這點你當然認識得比我清楚。不過，在心情上，你似乎顯得比較急切，你恨不得使台灣文學能夠振作起來，表現出雄美粗獷之氣。你在這篇評介林雙不的長文，就很清楚透露出這種心情。

林雙不的小說與詩，在一九八〇年之後有了劇烈的變化。他在《台灣新樂府》就提出這樣的觀點：「我以爲真正的詩，要與廣大同胞的生活緊密結合，通過對同胞疾苦的反映，讓同胞有所紓解與安慰，讓權力當局有所警惕與啓發，讓社會更合理更公平、更正義更美好。」使我注意的是，他希望真正的詩能夠使權力人物有所警惕與啓發。提出這一個論點，自然是爲了恢復台灣新詩的抗議傳統。印證於林雙不的詩，以及他的小說，我們可以清楚看

到他在這方面的勢力，而且是極其豐收的。他的作品之可貴，便是風聲鶴唳的時刻，呈露他的憤懣與抗議。更可貴的是，他相當能夠節制自己的情緒；即使在表達他的激情時，他仍然顯得從容不迫。

但是，我不認為林雙不已寫出了最好的作品。我相信，還有足夠的空間供他探索；我也認為，真正的林雙不還未出現，而這正是我所期待的。基於這樣的認識，我並不同意你那麼急於肯定林雙不的成就，我更不同意你以壓低別人作品的方式來突出林雙不。我不以為這就是在鼓勵他，也不以為對他的文學有所幫助。對於文學的前進，我們都必須有耐性。林雙不正好是我看好的作家之一，我熱切希望他開創新的境界。

你當然有足夠的理由表達你的焦慮。當台灣走到一個大轉彎的時刻，你看到一些知識分子仍然沉湎於陰柔軟化的文字，不免產生激憤。不過，你舉出的幾位作家，我覺得都不太恰當。例如，你說楊牧在一九八〇年以來不會對台灣的人權表示正面的譴責。這並不是事實。在拯救王拓與楊青矗的公開抗議信上，楊牧是海外學者中簽名的一位。林家血案發生後，他寫了首詩：〈悲歌——為林義雄而作〉，我可以抄前四節給你看：

逝去的
不只是母親和女兒
大地祥和，歲月的承諾
眼淚深深湧溢三代不冷的血

在一個猜疑黯淡的中午
告別了愛、慈善，和期待

逝去，逝去的是人和野獸
光明和黑暗，紀律和小刀
協調和暴破間可憐的
差距。風雨在宜蘭外海嚎啕
掃過我們淺淺的夢和毅力

逝去的是夢，不是毅力
在風雨驚濤中沖激翻騰
不能面對飛揚的愚昧狂妄
和殘酷，乃省視惶惶扭曲的
街市，掩面欲泣的鄉土

逝去，逝去的年代的脈絡
稀薄微芒，割裂、繃斷

童年和民歌一般拋棄在地上
上一代太苦，下一代不能
比這一代比這一代更苦

我相信，在那悲愴的時節，楊牧的心情也與你一樣沉重。你可以不喜歡他的散文與詩，但是，我並不認為他對時代的重大事件渾然不覺。對我而言，他在那血腥事件之後發表的這首詩，就足夠表達他內心的傷痛。在那時候，並沒有多少詩人寫出這樣的作品。我可以坦白說，我對這首詩是非常重視的。

你對葉石濤先生的苛責，我頗覺刺痛。我對葉老的認識，可能不如你深刻。我離開台灣之後，才知道葉老竟然住在我的家鄉左營。這對我不只是遺憾的，而且是慚愧異常。因為，這足以看出我生活在台灣時，對台灣文學的了解是多麼粗疏荒蕪。當初，我曾讀過他的〈羅桑榮和四個女人〉，那是我離開台灣時僅有的印象。我真正對葉老評論的注意，已是一九七九年他出版《台灣鄉土作家論集》之後的事；那時我對台灣文學的認識，已有了一些異於舊日的看法。他的這本論集，確實幫助我窺見台灣的文學的天地。

就我所知，葉老是一位提出「台灣鄉土文學」這一名詞來的，那是一九六五年的事。六〇年代是台灣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的關鍵年代，也正是西化與「橫的移植」的侵襲臻於高峰的年代。如果說，我那時對台灣文學是無知的，那麼我可以說我是受到那時候風氣的

蒙蔽。我的前後輩青年，有那一個不是往西方走的？即使是洋文不通的文藝青年，都可以就「存在主義」、「虛無主義」談得頭頭是道。在那樣的時代，有誰會注意台灣文學？在許多人的眼中，台灣是沒有文學的。所謂「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是事後聰明人提出的口號。在五〇年代、六〇年代，有這樣的提法嗎？

然而，在那樣蕭瑟的年頭，在鄉土文學論戰整整十年之前，葉老就已有不凡的見識，肯定台灣文學的價值。我總以為，他在一九六五年所發表的〈台灣的鄉土文學〉，將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這篇文章裡，葉老扼要概述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發展的情況，同時也對戰後新起的一代有頗多期待。不僅是期待，他充分表達了對台灣文學的信心。

我始終覺得，這個世界對台灣文學史的整理，鑽研最深的只有兩位，一位是張良澤，他著重在資料的搜集；另一位就是葉老了，他專注於作品的闡釋與作家的推介。身為台灣文學的前輩，他的文章從來沒有絲毫倨傲。比起一些以過度的謙虛來掩飾內心跋扈的文學導師，葉老對文學的誠摯態度是足以讓人欽服的。他從來沒有過早預言年輕的作家，他也從來沒有過遲評估成名的作家。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在台灣文學批評輕易褒貶的風氣中，葉老總是恰如其分對待每一位作家。我很少看到他失手過，也很少看到他搖旗吶喊過。他的批評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

你說：「他的致命傷在於他的藝術識別力粗而不精，而性格相當庸俗，這是藝術大忌。」這倒是我不知道的，至少我不知道你的標準訂在何處？退一步說，如果你的說法可以

成立，我不認為這是葉老的錯，而是整個時代的問題。要論文學素養，葉老絕對不在你我之下；他所涉獵的世界文學，也絕對比我寬廣。那麼，他對文學的品味，以「庸俗」給予概括，是極不公平的說法。在文學表達上，葉老有他的困難，而那種苦衷也絕對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

楊青矗來美兩次，都與我有過長談。在談話中，使我感觸最深的是，他提到當年葉老如何寫出日式的漢文，又如何吃力修改，最後又如何被退稿。葉老曾向楊青矗抱怨：「爲什麼編輯沒有耐心潤飾我的中文？」聽到這樣的話，我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悲痛。如果讓他以順暢的日文表達文學觀點，我深信他的批評造詣不會只是今天這樣的成績而已。

葉老是日據時期延續下來的最後一羣作家中的一位。即使在戰後四十年的今天，他的文字仍然還是帶有傷痕的。我在《文學回憶錄》裡，看到他寫的〈許振江二三事〉，才知道他生活困苦的一些狀況。我不知道我爲什麼特別喜歡讀那篇文章，也許是文中提到左營吧，但又不然。後來，我才發現自己是深深感動於他寫出這樣的句子：「幾乎費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我才得以真正認識原來做一個作家是捨命的奉獻，在奉獻和犧牲，血和淚交錯的生活中才能寫出表現性靈深層的作品來。」他經歷困頓的生活和變動的時代，竟始終不動搖其文學信念。這種情況只有在日據時期的作家才能找得到；在今天，葉老恐怕是少有的頑固者了。

你對他的文論頗有微詞，我也不便說什麼。讀過他的三本論文集，我覺得貫穿各篇文章

的主要精神便是厚道寬容。在這個時代，我認爲是相當難得的。他不欣賞陳映真（如果事實如此的話），但是他不訴諸文字，這就是他的厚道之處。他提出「三民主義文學」，我毋寧覺得那是一種反諷。台灣作家追求的境界，是民有、民治、民享，而這些東西在台灣是不存在的。這個名詞對國民黨文策而言，不是諷刺是什麼？你大概會說我強作解人。不過，我必須說出我心裡的話，辛辛苦苦了將近半世紀的葉老，是不能也不容以三言兩語損毀的。我倒希望你以更深入的剖析方法、更嚴肅的批評態度來對待葉老。到那時，也允許我好好寫一篇來答覆你。

最後，我也不能不與你提到《笠》。你因爲陳千武先生的評語，而引發你對整個笠詩社的不滿。我不知道你要強調什麼？如果你說《笠》反對政治詩，這不是事實。在這方面，《笠》發表得比其他詩刊還早得多。除了這點之外，你對《笠》的評語，有許多已離開文學的範圍去談了。

我與《笠》的因緣，有點奇異。在服役那年，我曾申請加入這個詩社。當申請表寄到軍中時，卻遭檢查。我被申斥不得加入軍隊以外的社團，同時還寫了一份切結書。那次經驗，使我首度認識了什麼是「政治」，至於「詩」是什麼，我仍然在摸索。從那以後，我就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退伍之後，倒與原屬笠詩社的林煥彰、施善繼另組了「龍族詩社」。我對《笠》的注意，也是在「龍族」時期才開始的。他們的敬業精神，是所有的詩社所不及的。我說的「敬業」，指的是把詩當做一種文學事業。這在台灣文學中，可以說極爲難得的現

象。

我自然有時也覺得《笠》的得失之心稍微強烈。我並不認為他們值得與《創世紀》、《藍星》去爭詩壇地位，因為《笠》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種草根的主流。回到六〇年代去觀察，《笠》打出的旗幟，正是對文學西化的一種反動。它的歷史意義就在這裡。

我不能同意你以「皇民意識」來指控笠詩社，我更不能同意你以病態的自憐來概括他們的作品。這些都是很嚴重的字眼，而且我也不相信你使用它們時是經過慎重斟酌的。你如果對《笠》有興趣，何不另撰專文來討論？

6

這是我寫過的最長的，也是構思最久的一封信。一九八二年與你相遇時，我便向你承諾說，我將重新出發。我自信我遵守了這個承諾，把詩、散文與評論陸續寄回台灣發表。每當我的作品刊出時，我就覺得彷彿在台灣與你相遇。這樣做，我也覺得島嶼特別靠近我。

我確實離鄉太久了。我對台灣的認識，都是透過口傳與文字，來自信件，來自親友，來自陌生的過客。有時，我真的不知道應把握如何的分寸對台灣發言。在很多時候，我不得不保持沉默，因為我已是局外人。不過，這次我決定不沉默了，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有必要回應。在你所有的文字中，我最不喜歡你寫的這一篇。你以激憤代替熱情，使得許多文字失去了準確性。倘然你不承認你這次是失手了，我會感到很奇怪。據說，你已寫好兩三篇文

章，將陸續發表。不知道是不是還充滿了拳聲？我有點擔心。

這封信就當做我們交換意見的開始。

——《台灣文藝》，第九九期（一九八六年三月）

鮭魚還鄉

——台灣，我的母土

1

寧靜的太平洋海裡，想必潛藏一股母性的聲音。每到秋後，就會召喚遠離家鄉的鮭魚回到出生地。往往那個時節，總會有浪濤般的魚群，回航到北美洲的西北水域。鮭魚回歸時，奮勇翻騰，波濤壯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長空下的海洋，展現了生物中最強悍、最不可理喻的還鄉意志。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說清楚鮭魚的秘密。

我寧可假想，鮭魚是有聽覺的，而且充滿了靈性。無論有多麼遙遠的長征遨遊，也無論經過多麼長久的流浪放逐，這神秘的水族，最後都能辨認故鄉的方向，找到最初出海的河口。從哪一條河流離去，就從哪一條河流回歸。從淡水涉向鹹水，從海水渡回河水，鮭魚始

終能夠保持對故鄉水性的警覺。憑藉天賦的本能，最後都能找到通往出生地的河流。

然而，最能震懾人類的，便是進入河口以後鮭魚的逆水洄游。遇到急湍或激流，牠們總是能夠跳躍而上；遭逢淺灘或頑石，牠們竟也能以毫不設防的魚腹，磨擦粗礪的河床，奮力穿過。距離故鄉越近，航道的水流更加艱難。牠們到達終點時，無不遍體鱗傷，甚或疲憊至死。在牠們生命裡，似乎沒有任何畏懼。牠們望鄉的勇氣，足以征服一切。

鮭魚畢竟是幸福的，因為在生命裡，有目標可以追求；而死亡時，也可以選擇在故鄉殉身。傲慢的、自負的人類，能夠擁有這樣的幸福嗎？看到鮭魚驚心動魄的還鄉場面，人類能夠不謙卑嗎？

2

瞭望茫茫的海水，我是多麼希望化成一尾鮭魚，縱身海上，朝向嘉南平原奮力泅泳。這樣的假想，成爲一種焦渴，一股願望，一縷夢幻。我只是天涯海角的一尾魚，只懷最細小、最卑微的憧憬。台灣，成爲我十五年來的精神故鄉。

在離開台灣以前，我在精神上也有過遠行遨遊。猶記得在大學即將畢業那年，還會立志要以全心寫出一部中國史學史與一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那種志氣，近乎狂妄。來美最初幾年，我仍然專注於收集中國三十、四十年代的新詩史料。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一書，於我可謂神聖無比。我後來也陸陸續續寫了幾篇有關中國新詩作品的評介。

中國新詩之所以令我著迷，與其說是作品本身有一份魅力，倒不如說是產生中國新詩的那個時代使我嚮往。以詩與政治結合，是中國三、四十年代新詩的特色。

在那些詩人中，我獨鍾於何其芳。他可能是那個年代裡寫出新詩最佳的詩人，深受西方浪漫主義影響的他，把大時代裡一位脆弱知識分子的脆弱情感準確表達出來。中國新詩史的發展，由於有何其芳的出現，而進入精緻成熟的階段。魯迅生前，只推荐馮至的作品，曾經嘉許為中國新詩第一人。倘然他活得久些，看到後來詩風轉變的何其芳作品，恐怕也會推崇吧。

何其芳新詩風格的改變，是以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的爆發為轉捩點。這位蒼白的詩人，棄擲了文學的聲名，與卞之琳、方敬等人，攜手前往延安參加革命。在整個中國抗戰期間，何其芳寫了無數令人擊節讚嘆的作品，他歌頌反帝戰爭，他鼓舞青年學子。詩歌裡傳出的聲音，大異於他早期文弱的詩風。戰爭前後的作品色調，幾乎像極出自二人之手。何其芳的劇烈轉變，使我怦然心動。

只是，何其芳的革命文學，發展到末期，卻只見革命，而不見文學，這又令我感到心悸。在中共建國成功以後，何其芳就去出任文藝官了，忠實執行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的政策。甚至到了末流，何其芳也頻頻去整肅胡風。文學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不能不使我感到驚懼。

倘然，何其芳是被革命犧牲的文人，那麼他並不是那個時代裡的唯一受害者。中國三

十、四十年代出現的重要作家，除了沈從文、巴金等人之外，幾乎都毫不例外，都淪為中共的統治工具。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的時間裡，中國新文學近乎荒蕪。曾經發生過洶湧澎湃的新文學運動的中國土地，成為一片空曠的荒原。在那蒼白的土地上，充滿了野性的呼喊。

使我神遊嚮往的中國，竟然變成我內心的巨大噩夢。對於從事戰鬥的魯迅，我總是假想，如果他不那麼早死的話，大概有三個結局：一是被國民黨特務謀害，一如左聯五烈士那般；一是變成御用文人，就像曹禺、艾青的模樣；一是繼續批判統治者，正如後來他的徒弟胡風對中共的反抗。

以硬骨頭著稱的魯迅，應該是會走最後一條反抗的道路。他後來被中共神化，那絕不是他的錯。魯迅在生前就說過，一個先知被人神化時，就成為傀儡了。在中國大地上，很不幸的，竟然行走著難計其數的傀儡。

中國成為我的災難。

這個災難，蒙蔽了我對故鄉的認識。在中國從事精神旅行將近二十年後，我才回首瞭望台灣，產生這樣的覺悟，並非在貶低何其芳及其同輩作家的文學生涯。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心，並且以具體的行動與現實結合，在每個時代，每個地方都出現過。我傾向於支持一切知識必須為現實服務；但是，決然反對知識為任何政權服役。中國今天會發生反民主的天安門流血事件，知識分子的屈服與縱容，必須承擔一部分責任。如果作家竟然是以支領國家薪水

維生的，則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文化，其前景必定是黯淡的。

我回首瞭望台灣，並非純然由於我對中國的幻滅。在海上起伏前進的那島嶼，自來就是育我哺我的土地。離開台灣後，我幾乎無一日不是在望鄉的。鮭魚尚且在遠海長征後，記取還航回鄉。況且那島嶼，釀造過我最初的夢，塑造過我最大的野心。

在我長期流浪的道路上，我的精神是最先回航的，我回歸到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我的心志，似乎也經歷過險灘與頑石的考驗，也泅泳過急湍與激流。我的肉體固然受到放逐，但是，我早已回歸到我的精神故鄉。

3

台灣正進入一個大解體、大重整的時期。大解體的原因，乃是國民黨挾帶而來的中國體制，已在最近幾年次第崩壞。隨著強人政治的瓦解，台灣社會正處在一個「誰也不怕誰」的過渡階段。大重整的方向，則是一個符合台灣社會規格的新秩序尚未建立起來，各種有形、無形的力量，都在調整轉變之中。

我越來越相信，在一個大轉彎的時代，每一種運動都是互相影響、互相牽制的，只有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諸種運動，匯成同一方向的巨流時，才能使舊體制獲得全新的改造。

台灣，正是處在巨大改造的前夜。蓬勃的政治運動、亢奮的經濟運動、活潑的社會運

動，以及飛躍的文化運動，都在預告一個新時代即將來臨。這些運動都在暗示一個共同的方向，那就是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社會就要誕生。

身為一個人文工作者，我近年來的思考，便是如何在歷史與文學方面建立一個台灣社會主體性的解釋。傷痕累累的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從來就一直受到政治既得利益者的肆意扭曲。在折斷的鏡象裡，我們總是找不到台灣命運的答案。受到鞭傷的台灣人，往往必須流浪到島嶼以外的地方，去尋找方法，尋找答案。

二十世紀以來，有多少台灣人流落於海外。他們的遠行，為的是回歸。然而，他們最後都找不到島嶼的前途方向，甚且也找不到為他們自己埋葬的土地。歷史上台灣人的悲劇，有時比鮭魚的命運還淒涼。台灣知識分子的雄心，不能說不夠宏大。正因為是過於龐大，最後竟然都忘記台灣命運的答案早就存在於島嶼之上。

一九八九年夏季，我突然獲得權力人物的放行。離台十五年，首度能夠還鄉，至今仍疑似在夢中。權力者無端把我囚禁海外，讓我四處流浪，在還鄉前夕，我是難以原諒的。流亡，是台灣歷史的苦悶象徵，無論是精神流亡也好，或肉體流亡也好，都足以顯示台灣問題亟待合理解決。

台灣，我的母土，我這浪子就要回來了。容許我以顫抖的手撫觸，以顫抖的心擁抱，那受傷而又溫暖的土地。

都留在雪地裡

面對一九八〇年之前的台灣，我總有著恍如隔世的感覺。回首前塵，島上彷彿還殘留一些舊夢讓我眷戀，讓我在異鄉深夜的星空下，幾度深陷於難言且難解的感傷情緒裡。然而，我終於克服了這樣脆弱的情感。在我的意志日益粗壯的過程中，最後總要把濕霉的記憶遺棄。

一九八〇年，是多麼乾淨俐落的一年。它把我的少年與壯年整齊切開，不偏也不倚。驟然站在生命的另一個海岸，我強烈感受到切割的痛楚。這樣的劇痛，有時不免使我感到愕然；但冷靜思考時，卻又覺得是一必然。我的島嶼畢竟是順著歷史的潮流航行著，在時代分合的切口，無可避免要迎接激盪的怒潮。做為台灣的子民，縱然身在千里之外，我仍能聽到土地跳動的脈搏。在歷史的長河裡，有多少人爲了最低的要求而付出最高的代價；有多少人爲了尋求島嶼命運的答案而被誣被捕被殺。很少有一塊土地像台灣那樣，它所哺育的人民是

那麼溫和，但是他們所換來的暴力竟是那麼激烈。坐在一九七九年與一九八〇年交錯的雪夜窗口，我第一次嘗到大地的冷酷無情。從遠方，我聽到一些離奇失蹤的故事。雪地的寒光，彷彿讓我看到冷血事件中匕首的鋒芒。一切都變得寂冷；寂冷得只要說出一句話都感到顫慄。如果那場大雪是一個預言，大概就是在宣告我此後生命的轉向吧。

跨過一片寒漠的雪地。我默唸著每一位失蹤者的名字，也默禱著一位祖母以及一對孿生女孩的靈魂。我隱約可以體會，我就要跨過一道巨大的傷口。我也知道，我不能繼續依賴感動或感傷過日子，更不可能僅僅依賴知識與學養來縫合傷口。有人在地球的另一面爲鄉土的理想而坐牢，是不可能把自己監禁在學院的圍牆裡編織另一抽象的夢。把平面的文字化爲具體的思考，把靜態的想像化爲行動的投入，豈非就是我的抉擇？

就在那年的暮春，我匆匆收拾行囊，不告而別，離開了旅居將近六年的邊城，到達一個擁擠的陽光城市。經過了那次揮別，我才正式進入我的壯年。我克服了從未克服過的感情弱點，發揮了從未發揮過的肉體潛能，開拓了從未開拓過的思想荒地。在一幢斑駁的舊屋裡，我埋首細讀每一份來自台灣的報紙與書刊，全心爲一份被權力者視爲叛逆的雜誌撰稿。我緊鎖自己，彷彿與坐牢的朋友一般，把自己囚禁在最狹小的活動空間。但是，在思考上，我把自己解放到一塊全新的、無垠的原野，嘗試解開多年來制式教育加諸於我的韁繩。

這是一次全面的自我整頓與自我改造。一度落入灰色深淵的思想，以及一度陷於頹廢谷底的意志，都因我的埋首而再度抬起了頭。我會以爲已經遠逝的島嶼，又以最清晰的面貌臨

近了我。有生以來，我第一次領悟到，我的靈魂是多麼依賴著我的土地。我重新調整了歷史視野，也改變了一些價值觀念。經過這一場自我改造，從此我不必再使用曖昧的語言來掩飾我對島嶼命運的關切。也恰恰是因為我露骨表達了對台灣的熱愛，而終於無可避免被當權者歸類為叛逆者。在畸形的時代，酷嗜權力的人物往往把鄉土之愛詮釋為罪惡。在楊逵的時代，在吳濁流的時代，台灣先輩就已有過如此的經驗。我的時代，又何嘗能夠例外。對於這點，我體會得特別深刻，深刻得直入骨髓。

我對台灣歷史的瞭解，以及對台灣文學的觀察，一向就是零散的、斷續的。在自囚長達四年的時光中，我終於獲得機會面對島嶼的過去。把隱晦的、切斷的史實重新銜接起來，是一項艱鉅的工作。我嘗試在苦澀的紀錄中，去尋找、去了解、去重組歷史的真貌。有一個深夜，我突然徹底領悟吳濁流先生所說的話：「歷史是有漏洞的」。在迷霧的時代裡，吳濁流親身目睹台灣歷史是如何遭到刪改、捏造或縮水。善於製造歷史漏洞的統治者，依照他們事先設計的手法去過濾資料，使得許多事實輕易被篩落、被清除。無怪乎台灣子弟捧接過來的教科書，文字總是那麼簡約、潔淨。許多文字敘述，一如剪輯影片，可以使不相干的史實跳接在一起，也可以使一些不潔不德的畫面無端消失。他們歌頌權力，粉飾劊子手。果然，一些沾滿鮮血的人物，出現在歷史課本時，雙手竟然都是乾乾淨淨，一塵不染。

他們也善於製造歷史斷層。我恍然發現，在台灣是如此進行歷史教育的。談到政治史時，他們辛勤描繪一九四五年以前的豐功偉業，利用各式各樣的演繹與推理，無非是為了引導走向一個結論：這個天下是他們開創出來的。於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史觀，就成為歷史解釋的唯一根據。奇怪的是，教科書的敘述總是寫到一九四五年，便戛然而止。「台灣光復」往往變成歷史的終點，從此就像每一冊童話的結局那樣，王國內的人們快樂樂活下去。這種依賴設計寫出來的歷史，只不過是要誘使台灣子弟去相信，島上的先民自始就在等候，等待祖國來拯救解放。至於先民為何離鄉背井，以及如何反抗從前祖國的高壓統治，歷史教科書都予以一一擦拭。同樣的，一九四五年以後在台灣發生的血腥事件與白色恐怖，更是隻字不提，因為台灣已經「光復」了，歷史已經圓滿結束。

至於文學史的撰寫，恰恰與政治史相反。在他們主觀意願的指導下，台灣文學史往往是戰後才開始的，彷彿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就是一片荒蕪空白。他們不僅懼於提到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而且也粗暴抹殺三十年代的台灣文學。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島上，跋扈告訴台灣子弟，文學是他們攜帶過來的。如果沒有他們渡海而來，現代詩的火種並不可能在台灣點燃；如果沒有他們實施教育，台灣文化不可能如此蓬勃發達。在他們刻意塑造出來的文學史中，戰前的台灣簡直就是蠻荒化外之地。在一九五〇年代，他們膽敢宣稱台灣是「文化沙漠」的地帶，豈非就是這一份傲慢引發出來的？令人駭異的是，七〇年代台灣本土文學洶湧崛起時，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傳統在島上重新又普受肯定。這時，擁有歷史撰寫權的人士，也厚顏出面接收了，而開始發展出另一套理論：「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從此，一些奇談怪論也在文學界流傳，諸如：「台灣新文學是受中國五四運動的衝擊而產生

的」，「台灣文學具有強烈的中國意識」，「台灣文學在戰後便消失於中國文學之中」，「台灣文學是邊疆文學」……彷彿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現了衣錦還鄉的浪子，人人都倒屣相迎，爭搶認親。他們生動表現了可歌可泣的情感，生動得忘記了他們的這份情感是遲來的，是虛矯的，是事後聰明的。這些熱情洋溢的先知，可曾在孤寂的六〇年代為台灣文學說過一句正義的話？可曾為扭曲的台灣文學史做過一些糾正的工作？可曾以謙遜的態度去認識豐碩的台灣文學遺產？

以教條的理論、機械的方法去解釋台灣史——不管是政治的或文學的，我已徹底領教過了。我冷眼觀看他們的表演，而終於歸納出他們的表演模式。在政治史方面，他們也學會旁徵博引，鋪陳一些片段的證據；無論是探討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最後他們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台灣與中國的反抗運動，在立場上是一致的；所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文學史方面，他們更是發揮過人的智慧。在期艾艾的詮釋中，他們沒有興趣去了解文學前輩的心情與背景，而只是專心一致引用某些情節與段落，來為他們的政治立場辯護，從而導出這樣的結論：「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這種模式，我確實領教過了，而且一如台灣人所說的，已到了「飽且醉」的地步。

我與其他台灣子弟那樣，曾經陷在眾多駁雜的議論之中，時時感到疑惑或茫然。那種倉皇的心情，一度貫穿了我青色的年少時光。然而，跨越了一九八〇年，我跟隨我的土地走完驚濤拍岸的路程，而邁入重新自我觀照的階段。我再也沒有理由責怪別人竄改島嶼的歷史，世界史，都不足為訓。回歸到台灣的立場，乃是建立台灣歷史解釋的第一步。

對於台灣文學的解釋，也是同樣的道理。有些知識分子總是畏懼被指控具備了島國心態；在討論台灣經驗時，就必須不忘提到中國，以免陷於「狹狹的地域主義」。這種心虛，只能說明台灣讀書人的心靈是如何受到扭曲。在地圖上，台灣島嶼也許看來是多麼渺小，但那並不意味它對外界是孤立的、絕緣的。在島上發生的任何事件，都是人類活動網絡的一個環節。它不必依附於中國，或依附於亞洲，就已具備完整的歷史意義。如果那意義帶有共通的性格，就不一定只屬於中國，或只屬於亞洲，而是屬於全世界的。一個寫《朱熹著述考》的知識分子，不能因為朱熹誕生在中國，所以就宣稱這位知識分子具有寬廣的視野。同樣的，一位從事研究余清芳反抗運動的史家，也不能因為余清芳是台灣人，這位史家就必須被指控為狹狹的地域主義者。這種簡單的劃分，如果不是思考疏懶，就是別有用心。台灣史與中國史的發展，都只是世界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只強調中國立場，就傲然以為已經擁有全局的觀念，都不免引來嗤笑。

一個健康的文學家，必然是專注於對他周遭環境的觀察。他為他所見證的不義發出聲音；只要不畏權勢提出抗議，他就表達了做為一位作家的良心。一位台灣作家，不能因為他

沒有選擇中國立場，從而他的抗議就應被認為視野過於狹窄。寫《湖濱散記》的梭羅，把他一生的愛都獻給新英格蘭區。不，應該縮小一點來說，梭羅只把他的關心集中在他的出生地坎珂鎮（Concord）。他不只一次在散文與日記裡說，坎珂鎮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沒有一個地方的風情人物能夠超越他的家鄉。他一生最遠的旅行，就只是加拿大與明尼蘇達州。然而，也僅憑這樣短程的遠行，他就下結論說坎珂鎮是萬物齊備的地方。他留下的全部作品，沒有一處不在描寫故鄉周圍的人與事。當他死時，也選擇埋葬在坎珂鎮的沉睡谷（Sleepy Hollow）。如果梭羅生在台灣，無疑是中國意識論者眼中的偏狹地域主義者。這樣一位具有島國心態的作家，只爲了向當地的稅吏拒絕納稅，而被監禁一個夜晚。梭羅爲此寫下一篇不合作主義的文字，指控官方對民權的干預。他是反奴隸運動的支持者，他知道他繳的稅有一部分將用來壓迫黑奴。他毅然表達對政府的蔑視，終於失去一個晚上的自由。但是，一次小小的監禁，卻換來了全世界的認同，二十世紀的甘地與馬丁路德·金恩，在行動上都直接受到梭羅的暗示與啓發。梭羅爲維護人權尊嚴所做的努力，並沒有因爲他是地域主義者而受到貶損。他的生活是卑微的，他的視野是侷限的，但是他有一顆與天地等高同寬的心。這顆心使他爲美國文學建立了新的地點，一個有根鬚的、以家鄉爲基礎的起點。

我以四年的時光，克服了一些心理上的障礙。台灣雖小，我竟不了解它，這豈非是可恥的事？就在那一座木造的舊屋裡，我在英文、日文的官方檔案中摸索，在中文的資料中進行解析推敲。也坐在同樣朝著陽光的桌前，我翻開台灣先人留下的文學作品，去領會他們的哀傷與歡愉。在暮色裡，在深夜中，彷彿有一些可貴的靈魂向我低語，娓娓訴說曾經有過的悲痛發生在遙遠的島嶼上。我有時不能避免有挫折感，因爲我認識自己的土地是那樣少，又那樣遲。加諸於我思考上的一些過時的價值觀念，一直是我追求事實真相的主要羈絆。直到我完成了一篇長文〈永遠的望鄉人：蘇新的生平與思想初論〉，才初步建立了我的台灣史觀。這對我是一個重要的基點，沒有史觀，或是虛構的史觀，都不可能掌握歷史發展的動向。像台灣這塊土地，經歷多災多難的不同朝代，站在任何一個朝代的立場來講話，都只能創造更多的誤解與錯覺。台灣歷史發展的動力，絕對不是來自荷蘭皇帝，也不是來自國姓爺鄭成功，更不是來自日本天皇。推動台灣歷史前進的，不是別人，而是以血汗與島嶼結合的開拓者。離開島嶼人民的立場，而空談台灣歷史視野，絕對是不得人心的。

在文學探討上，我也在寫完〈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一文之後，才正式擺脫了許多枷鎖。自七〇年代以後，台灣在政治經濟上面臨了多重危機，文學發展也相應產生認同的問題。因此，偶爾有幾位知識分子開始利用他們的想像力與幻覺，吃力爲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做銜接的工作。這種工作自然令人感佩，不過企圖把台灣文學的多重源流單元化，只會混淆對台灣文學性格的觀察。就像當權者那樣，寧可不稱台灣，而叫做「Chinese Taipei」。這些知識分子也硬要把台灣文學加上一層新包裝，而成爲「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Chinese Taipei」絕對不代表台灣，也不代表中國，這無須繁複的思考就可一目了然。同樣的道理，「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一詞，便是此類政治思考孕育出來的奇

怪產物。文學家只重視包裝，竟不願正視內容，實令人難以理解。只爲了妥協，只爲了不願前進，他們就是不肯老老實實承認，島嶼子民是推動歷史的力量。

台灣文學，概括來說，不是一種從容的文學。在一個需要與自然壓力及人爲壓力抗爭的土地上，台灣作家抱持一份超乎常人的緊張，急欲表達他們的願望。無論是二〇年代的賴和、三〇年代的楊逵，或是四〇年代的吳濁流、五〇年代的鍾肇政，他們的胸腔都緊繃著一股心聲。彷彿只要能夠吶喊出來，他們的文學使命就幾乎完成了。基於這迫切的意志，台灣作家往往較其他地區的文人還更注重修辭與技巧，總是在粗糙的文字裡顯現真情。也就是因爲台灣文學是粗糙的，才更要求後人必須更具耐心去咀嚼、去包容。欲以迅捷而簡單的名詞來界定台灣文學的內容，是不可能找到真髓。面對遺留下來的作品時，我們不能不懷著謙遜去瞭解他們撰寫的心情。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野心沒有那麼雄偉，不可能時時據案苦思祖國；他們埋首時浮現腦海的形象，一定是島上的人民。這一點從他們的作品就可得到印證，而不必作任何口舌之爭。對我而言，空想的年齡早已一去不復返。離開作品去演述或推論台灣作家的精神，對我已成不可思議的事。當我寫完那篇長文，確切感覺到我已失去枷鎖，重獲新生；而那是一個白霜湧路的清晨。

在那未明的晨間，我驅車駛入霧裡，我的心卻是一片明朗。濃濁的霧氣遮住遠景，我望見陽光若隱若現投射在車前。憑藉那稀薄的光線，我就可保持一定的速度前進。在那寂寥的晨曦中，我爲自己能夠找到方向感到興奮。就像我一度陷於迷惑的思考那樣，又重新出發了，從此不必再爲歷史撰寫或文學論述設限。我深知，回歸到島嶼的方位，以台灣做爲思考的據點，就沒有什麼可以再擾亂我了。

回望一九八〇年之前的台灣，我確實有著恍如隔世的感覺。然而，走過那道巨大的傷口之後，我在北地時的怔忡猶疑，都隨著霧氣的消散而遠逝。我畢竟重建了自己，也重現了信心；而信心來自那波濤推湧的島鄉。我慶幸自己生而爲台灣人，也慶幸自己有機會認識台灣史，更慶幸能夠接受台灣文學遺產的滋潤。如果只因爲我以台灣爲傲，而必須受到當權者的騷擾恐嚇，甚且必須被迫放逐流亡，我萬無後悔。今日的我，是台灣的歷史、土地、文化將我塑造的；我的命運自然也是島嶼賜給我的。做爲台灣人，是無可選擇的事，我只有向前迎接。在我跨入中年之際，生命的自我改造也宣告完成；我的怯懦、恐懼，還有那些濕霉的記憶，都讓我留棄在北國的雪地裡。

——《南方》，第六期（一九八七年四月）

聯合文叢 149

風中蘆葦

作者／陳芳明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編／江一鯉
編輯／余淑宜
美術編輯／戴榮芝
校對／陳芳明 余淑宜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郵撥帳號／17623526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印刷廠／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出版日期／1998年9月 初版
1998年11月10日 初版二刷
定價／200元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522-216-4 (平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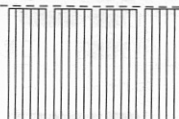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打開它 就進入文學的殿堂

來自心底的聲音
一段故事，幾句感懷
或者
滿腹牢騷
文學
與我們如此親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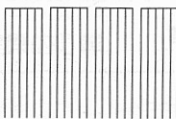
聯合文學雜誌社 服務專線：(02)27666759



廣告回郵
北區郵政管理局登
記證北台字7476號
免貼郵票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服務專線：(02)27666759



請填妥後對折裝訂，直接投郵即可，免貼郵票。